

致我們的朋友：資本主義反抗宣言
A nos amis

隱形委員會 Comité Invisible 鄧逸晴 譯



ISBN 978-986-92539-1-8



00320

9 789869 253918



À nos amis

致我們的朋友：資本主義反抗宣言

隱形委員會 Comité Invisible 鄧逸晴 譯

隱形委員會

本書是由一群匿名作者組成的「隱形委員會」(Comité Invisible)所撰，法國政府曾花了4小時審訊法國出版社負責人，仍然無法得知作者真實身分。「隱形」、「匿名」正是這本書最令當權者恐懼之處。它表示有一群反對派，就在某個地方策劃著陰謀，而當權者卻不知道他們是誰。這正是現代統治最無法容忍的部分，紐約客雜誌稱之為「造反風格」。

無論如何，法國政府還是於2008年11月11日在Tarnac這個地方強行逮捕了9名年輕人(農夫)，指控他們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特別是2008年11月在法國將近160起的火車破壞案件。最後提出的證據只有法國國營鐵路公司時刻表、一副梯子以及隱形委員會的上一本著作《革命將至》(*L'insurrection qui vient*)。此事引起歐洲各國文化界與學術界抗議，被捕的9人被稱為Tarnac 9。

9人之中，眾人皆懷疑獨立叛逆者，朱力安·顧巴(Julien Coupat)最有可能是作者。這位精通多國語言的哲學系學生，畢業於法國高等社科院。他在被監禁半年後，接受法國世界報的採訪時表示：「反恐……是一種積極製作恐怖分子的方法。」

鄧逸晴 翻譯

致我們的朋友

隱形委員會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le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À nos amis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前言 起義終於到來

起義已經來臨，但不是革命。然而各地的革命似乎在暴亂階段便已經熄滅，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目標，而是因為我們已與作為過程的革命脫節。而所有的起義，無論有多在地，其意義必定遠遠超過它自身，裡面有些東西是世界性的，因此我們需要國際間的討論，要從世界性高度的視角才能闡明革命的意涵。

第一章 慶祝危機 歡度新恐懼

無論是微管理還是國家統治，官方都主動製造混亂或製造混亂的氛圍，透過將居民保持在震驚狀態、維持暈厥又無依無靠的感覺、不會結束的恐懼，來防止可能威脅到他們的危機發生。

第二章 他們想逼我們服從治理 我們將不會向這種挑釁讓步

西方的修辭是沒有驚喜的，所有反對運動的出現原因都是人民「憧憬民主」。但起義從來就不是民主的，所有的民主主義者都被麻醉了、都對「決策」患有強迫症，但「決策」從一開始便是個假議題。民主的對立並不是獨裁，而是真理；法律也不是民主的最終成果，而只是一種過渡形式。

第三章 權力是物流 讓我們堵塞一切！

當代的權力不再是代表性和個人化的，而是物質的、技術的、物理的，它已滲透在生活

裡，靠著技術以及貿易組織起來。想反抗這個世界的人必須知道，治理不再是在政府裡，而是在基礎建設中。

99

第四章 Fuck off Google

當我們在應對災難時都聯想到一些相同的字眼：連結、網絡、自我組織，當臉書檔案比本人更可信，表示新的通訊技術已被大量應用，某種思考及治理的方式正逐漸取得主導。而且，這種新的治理科學都是由同一批工程師和科學家建立起來的。

125

第五章 讓我們消失吧！

激進主義者開始與自己的論述和實踐、目標與自我隔離脫節，他們並不是在建立真正的革命力量，而只是在維持良好的自我感覺。這種讓他們僵化的恐懼，讓他們害怕不夠激進就跟不上潮流。但這種姿態不足以創造策略——一個姿態是否具革命性，在於它所產生的影響。真正締造革命者才是革命主義者。

157

第六章 我們唯一的故土：童年

「社會」這個概念奸詐的地方在於，它幫助政府「自然化」其行動及成果；資本不再以國家而是地域作為單位來思考，將不同地域依不同價值和功能區分開來。但我們的假設不同：既沒有什麼「自然」的東西，也沒有什麼「社會」，但是有各種世界。建立一個世界，是闡釋一個秩序以及思考這個位置，並在必要時改變它。

第七章 一切歸於所有人

成立公社就是互相連結，它自身的力量便是自由的來源。經濟社群在公社之間彼此流通，公社也克制著這些社群自我中心化的傾向。公社注定無法與外部切割，它必須透過內化周遭的東西成長，關心與它者的關係便能增強自身的力量。

第八章 今日利比亞 明日華爾街

當人類否定自我組織的能力，便會發現自發性，但我們不能依賴自發性，而是必須維持注意力和紀律。我們不可混淆自由放任和隨心而為，也要留意不能以分享當作藉口。唯有確保所有革命力量都同時在各個方位前進，力量才會增長，如果停留在攻擊的層面，將無法充分利用資源。我們也不能停止理論的前進，否則將會被資本捕獲，同時失去思考生命的能力。

結語

訓導故事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A nos amis

二〇〇八年，隱形委員會出版了《將臨的起義》(L'insurrection qui vient, 台譯《革命將至》)一年之後，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開始爆發，整個金融市場幾乎瓦解，而最終為其付出代價的人對這個機制毫無所知。二〇〇八年起，我們見到了全球一波又一波的暴動、示威、遊行。起義已經來臨！從二〇〇八年雅典的暴亂起，到多事的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占領運動、倫敦的暴亂，以至最後的高潮二〇一一年十月發起的全球「占領運動」。說那是最後的高潮一點也不過份，雖然有點令人感傷。在此之前，有見於處境的險峻，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預言著末日的來臨(apocalypse)，其實他們才是最虔誠的基督徒——雖然滿口嘮叨著宗教是「精神鴉片」，但內裡卻渴望著基督的再次來臨。基督教的末日論(Eschatologie)裡，一個大災難會來臨，然後是最後審判，以及新的生活的開始。Eschaton，希臘文的意是「最後留下的東西」。我們清楚地見到最後留下的只是被遺棄的、失去希望的我們，還有在緊縮政策下越發陰暗的未來。那些製造了災難的政客、投資銀行家，卻照常拿著豐厚的花紅，對占領者冷嘲熱諷。「占領華爾街」之後，我們見到美其名曰「遍地開花」的微型抗爭運動，如城市耕種、手

工作坊、合作社等等。我們或者可以自我安慰，這些運動將會影響下一代人；然而，條件是在此期間，資本主義將無法消化這些潛在的抵抗。

七載之後，《致我們的朋友》總結了過去幾年來發生的運動，同時清算了自反全球化運動十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並不是去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因為它們會接踵而來，而且那只是用來響應政客們掛在嘴邊的偽善的口號：「讓我們共渡難關」。事實上，所謂「難關」只是一種用來欺騙和麻醉中產階級的「創作」。在這些災難背後是一個更大的災難：一個存在的災難。真正的危機是「形而上的」：人們忘記了什麼是生活。或者，如作者說的，西方文明已走到了盡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西方文明是可以死亡的，現在卻已成真實。或者，在《將臨的起義》以及《致我們的朋友》裡，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想要瓦解西方（défaire l'occident）的願景，以擁有一種新的希望以及生活形式（forme de vie）。但瓦解西方，並不是意味著東方是可取的，在過去幾百年的殖民化和全球化之後，所謂「東方」的存在本身已是問題。

* * *

瓦解西方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它的「民主」。如作者所說的，所謂的民主來自古希臘。而古希臘的議會的原型便是戰場——戰場上死屍堆中毫無生氣的手，跟議會上那些踴躍舉起的手同出一徹。雖然我們可以懷疑這個橫跨二千五百年的聯繫，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和平的政治只是戰爭的另一種方式而已。最後，我們將民主雙手捧給了那些代議者。這些代議者，不只出現在國會、議會、大廈管理委員會，而且出現在占領運動、抗爭運動的大會裡。這些是經由二十世紀末反全球化運動傳下來的陋習。我們都耳熟能詳：在每一次運動之後，總有幾名自稱為領袖的人出現，他們成為了運動的代言人，而由他們組成的官僚委員會變成了運動的「決策委員會」，將和政客的磋商以及內部的討論吹捧成整個運動的策略。無論那是「太陽花運動」還是「雨傘運動」都沒有例外。最後，總有一些政客等待最好的「收割時機」來發表由他們的助手代筆的激昂的演講；最後，那些代言人總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下一屆議會的候選人——原因可能是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議會以外的政治。我們也必須留意到，這些被媒體標籤出來的運動，以及被吹捧出來的政治明星等，最後都只是用來平息運動的手段而已，因為只有將運動

標籤為它所不是的東西，才可以徹底地消滅他們。這些不是犬儒、不是刻薄，而是從反全球化運動十幾年來得出來的教訓。當然，在運動的某些轉折期，這些陋習被抑制了，例如在開羅的「解放廣場」、香港的「雨傘運動」期間，在某些占領的地方，大會消失了，代表也不見了，那一刻人們終於感受到一起抗爭的美好和快樂。

國家的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一直都在進化。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放棄了權力的集中化，相反地，它將權力以基礎建設的形式物質化、去中心化——誰控制了基建便控制了國家；另一方面，它放棄了同一性，放棄了「社會」這個用來將人口捆綁在一起的概念，相反地，它宣布社會已死，它標榜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企業。這些個人主義在數碼基建裡找到了最佳的表達方式：他們將自己的存在——無論那是法律上的身分認證還是日常生活——都寄放在平面電腦、iPhone、臉書裡面。這進一步允許一種基於「控制論」的治理術。什麼是控制論(cybernetics)? 控制論是在上世紀由一班計算機科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一起發展出來的理論，其中的佼佼者著名的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控制論背後有一

套本體的 (onologique) 理解。雖然這些科學家們並沒有直接用到本體論這個字，但我們卻可以作出這樣的閱讀：任何存在物都可以被視為反饋機制 (Feed-back loop)，也就是說活動的結果可以反饋到系統來改進它的機制。維納將控制論的概念應用到飛彈、動物、人類。

控制論治理在美國情報局合約員工愛德華·史諾登事件 (Snowdon affair) 之後變得十分清晰，全球頓時生活在監視的恐慌中。無論那是商業機構還是政府機構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它們通過個人資訊的收集，再加上演算法的分析，決定了誰最需要什麼，誰最像是恐怖分子。而最後，那些不使用行動電話，沒有臉書帳戶的，便是最有嫌疑的人。在《將臨的起義》出版不久之後，法國警方在中部的一個小村裡拘捕了九名據稱是這本書的作者，原因是他們涉嫌破壞基建，以圖阻止將核廢料從法國運往德國的火車。雖然警方沒有任何表面證據，但其中一個以「恐怖分子」將他們拘捕的原因是：他們沒有行動電話，而且行事祕密。

* * *

只有對當前治理術有詳細的分析，我們才能找到打擊它的相應方法，而

不是只做對稱性的對抗。作者指出要以封鎖和占領的方式來阻止基建的運作，因為國家和資本主義都依賴著這些流通。同時，抗爭者也要理解各種科技的運作，從而改變占領的基建的用途（無論那是發電廠還是其他工廠），以圖和其他的運動可以產生共鳴。作者並沒有因為批判控制論治理術而敵視科技，或者將它貶為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是提出發展一種新的技術倫理，以及利用技術來對抗矽谷的創新科技。最重要的是，作者提出的「共同」的概念：我們怎樣在新自由主義的陰霾中繪製出一幅新的地圖，由此我們可以重新找到與地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的連結？

與「共同」相違的不是「國際」，而是「本土」。本土只是全球化空間規劃的分泌物而已。在此之前，那只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並不叫它本土。以本土之名來抵抗只是一種被動的、反射性的反抗，最後變成為法西斯的溫床。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開放的，多語言的連結，重新組織起一個大型的運動。翻譯這本書的目的，如作者已指出，「革命的工作已部分地成為翻譯的工作。沒有起義的世界語。反抗者不是要學會無政府主義者的語言，而是無政府主義者要通曉多種語言。」



致 Billy、Guccio、Alexis 以及 Jeremy Hammond。



另一個世界並不存在。只有另一種生活的方式。

——賈克·梅斯麟 (Jacques Mesrine)



Les insurrections,
finalement,
sont venues

前言
起義終於到來

起義已經來臨，但不是革命。然而各地的革命似乎在暴亂階段便已經熄滅，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目標，而是因為我們已與作為過程的革命脫節。而所有的起義，無論有多在地，其意義必定遠超過它自身，裡面有些東西是世界性的，因此我們需要國際間的討論，要從世界性高度的視角才能闡明革命的意涵。

起義終於來臨了。以如此的速度，在這麼多國家，二〇〇八年以來，這個世界的結構正在逐步瓦解。十年前，如果您預言一場暴動，只會惹來在位者冷笑；今天，那些嚷著要有秩序的人卻宛如小丑。他們對我們說，沒有什麼是比本·阿里(Ben Ali)的突尼西亞，埃爾多安(Erdogan)的土耳其，社會民主的瑞典，復興黨的叙利亞，被鎮壓下來的魁北克，或者以沙灘、*boka familia* (家庭補助計畫)和鎮壓警察而享譽的巴西等等更加確定、更加可靠的東西了。我們已經見到後果了。穩定已經完蛋。政治上也是如此，從今以後在授與AAA信用評級之前，他們都要三思。

一場暴亂可以隨時爆發，可以為了任何理由，在任何國家，並將傳到任何地方。領導者如臨深淵。就連自己的身影看來都充滿威脅。「Que se vayan todos (全給我滾！)」曾是一個口號，現在已變成人民的智慧——這個時代持續不絕的低音，從每個人口中低語傳遞，為了在最沒有人期待之時直起身來，屹立如板斧。政客當中最狡猾的那些人承諾結伴而行，因為他們沒有選擇。我們當前看得到的政治力量，只有無可救藥的反胃，純粹的消極，以及堅決地拒絕。

起義已經來臨，但不是革命。我們將難得一見像過去幾年這樣，從希臘到冰島，在如此密集的時間間隔中，有這麼多官方權力機構遭到衝擊。人們占領城市正中心的廣場，在那裡扎營，設立路障、食堂以及臨時木屋，舉行決議集會，很快地建立政治反思，如往昔的罷工。這個時代似乎正在生產屬於自己的共識，一開始是「All cops are Bastards」(ACAB，所有警察都是混蛋)，自此之後，每次有反抗暴發，從開羅到伊斯坦堡，從羅馬到巴黎，或者里約，都有某種奇異的國際連結，在這些多如繁星的城市的牆上留下這句話。

然而無論這些失序有多混亂，各地的革命似乎在暴亂階段便已經熄滅。說得好聽一點，政權的改變，只是一時滿足了改變世界的需求，以便立刻重回相同的不滿足狀態。說得難聽一點，革命成為某些人的踏腳石，就是同樣這些人，他們談論革命之名，只為了消滅革命。在一些地方，如法國，由於對自身充滿信心的革命力量並不存在，這便為一些人開了路，這些人的專業正是假裝對自己充滿信心，並登台演出這種信心：這些人就是法西斯主義者。無力感加劇。

到了這份上，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其他這些革命主義者都被瓦解了。這並不是因為自從二〇〇八年，我們沒有達到作為目標的革命，而是因為我們持續地與作為過程的革命脫節。因為我們失敗，我們可以責怪整個世界，透過千萬種感受設想各式各樣的解釋，甚至科學的解釋；或者我們可以質疑敵人部署在我們身上的著力點，決定了我們的失敗中既不令人意外但又重覆的特性。或者，我們可以質疑革命者當中，還剩下什麼左派的东西，不只讓他們遭受失敗，而且還遭受到一種幾近普遍的憎恨。倡導某種他們沒法做到的道德霸權，便是他們身上由左派繼承的怪脾氣。正如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自命不凡，企圖規範生活的正確方式——進步的，啟蒙的，摩登的，正確的，解構的，非骯髒的。這種自命不凡，對任何被認為站在改良主義者——保守主義者——蒙昧主義者——知識不足者——老土——過氣者一邊的人，都充滿了無預警排除的謀殺欲望。革命主義者與左派之間激烈的對峙，絲毫沒有令他們分開，只是將他們扣留在左派的陣地。放手吧！

打從《革命將至》，我們便處於一個狂熱的時代。我們閱讀，抗爭，與來自各個國家、持不同理念的朋友討論，我們和他們一起迎頭撞上這個時

代隱形的障礙。我們當中有些朋友去世了，有些飽嘗監獄之苦。我們堅持著。我們既沒有否認要建立各種世界，也沒有否認要攻擊這個世界。我們從旅行中帶著這樣的確信回來了：我們的抗爭並非游離的、分散的，彼此忽視的，我們深信各種反抗必須進一步互相連結。我們以為彼此之間是分散的，只是媒體對我們感知的操弄。這是反起義（*Contre-insurrection*）的工作，這種工作正是由微不足道的規模開始。我們不是分散的抗爭的同時代人，而是同一個世界性造反浪潮的同時代人，這些造反行動以微妙的方式彼此溝通。我們因為普遍的隔離，而有要走在在一起的普遍饑渴。我們清醒地拒絕被警察當成分離的原子來對待，從而對他們有著憎恨。到處都流露著同樣的不安，同樣的恐慌，這回應出於同樣的尊嚴的爆發，而非憤怒的爆發。二〇〇八年起發生在世界上事，並不是在隱晦的國家空間裡一系列突如其來的荒唐的而毫不相干的爆發性事件。這是從希臘到智利，在一個嚴格的特定時空統一體當中展開的同一個單獨的歷史性程序。只有某種顯然具有世界性高度的視角，才能闡明其意涵。我們不能將這個程序在應用上的意義只留給資本的智庫們（*think tanks*）。

所有的起義，無論有多本土，所顯示的意義遠超於它自身，裡面有些東西是世界性的。在其中，我們一起上昇到時代的高度。然而，時代就是我們在自己內在深處所看到的，當我們接受走下來，當我們潛入我們的經歷、我們所見、所感覺與感知的一切之中。那裡有求知的方法，以及行動的法則；那裡也有關於街頭鬥爭的純粹的政治強度與毫不掩飾的孤獨之間祕密連結的解釋。我們必須在每個處境及每個人的深處尋找時代。在那裡，「我們」找到自己；在那裡真正的朋友攜手互相支持，縱然散布四方，但一起前進。

陰謀論者都是反革命主義者，因為至少他們預留密謀的優先權給權貴們。如果權貴們很明顯地密謀著要保持及加強他們的地位，那麼我們也不能否認陰謀其實無所不在，發生在大廈的大堂、咖啡店、串燒店後方、在夜裡、在戀愛中、在監獄。而這些連結，這些討論，這些由毛細作用生成的友誼，以世界性的規模形成一個歷史性的黨派，如馬克思所說的「我們的黨」。相對於事物秩序的客觀的陰謀，確實存在著一個我們屬於其中的事實上的陰謀也在擴散中。但在這個陰謀的內裡受到最大的混淆所支配。我們的

黨在各方面都跟它繼承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它在失敗以及死去的革命傳統的提綱裡踉蹌而行，但這些傳統還強求人們的尊敬。然而，策略的才智來自心而不是腦，意識形態之錯在於將思想和心靈隔開。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強行打開我們身上的這道門。我們要建立的黨已在我們跟前。我們必須理清思想的雜物，它們阻礙我們清楚掌握我們共同的處境，以及如葛蘭西（Gramsci）所說的「世俗的共同」（*commune terrestre*）。我們所繼承的並不自任何遺囑。

如所有廣告一般的口號，「我們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重點並不在於它說出來的，而在於它沒說出來的。它沒說出來的，是百分之一的權貴的身分。這百分之一的特點並不是只說他們富有——在美國富有的人遠多於百分之一，也不是說他們知名——他們其實不管在哪都相當低調，況且今天誰沒有權利享有十五分鐘的成名時間？標誌著百分之一的是，他們是有組織的。他們自我組織以支配其他人的生活。這個口號的真相相當殘酷，而數字也無關重點：我們可以是百分之九十九同時也完全被支配。相反地，倫敦托特罕區（Tottenham）的集體搶劫（二〇一一年夏）足以顯示：我們只要開始自

我組織便不會貧窮。「貧苦大眾」和「決心一同行動的貧苦大眾」有很大的分別。

自我組織從來不表示要加入某團體。自我組織是在不同程度上，根據共同的感知而行動。但是，這些處境所缺乏的並不是「人們憤怒了」（或是缺乏憤怒），也不是反抗者的良好意志，也不是批判意識的擴散，甚至也不是無政府主義姿態的劇增；我們所缺乏的，是對於處境的共同感知。如沒有這樣的連結，這些行動只會在虛無中不留痕跡地消失，生活的質地便會跟做夢無異，而起義只存在於學校的教科書裡。

日常生活裡充斥的大量資訊，無論是震撼新聞，或是純粹醜聞，都讓我們以為這個世界總地來說是難以了解的。這混亂就好像戰爭中用來使後方不受攻擊的煙幕。正是因為它看起來不可治理，使它實際上可以被治理。這便是狡猾之處。通過採取危機管理作為治理技術，資本不只以災難作為勒索來取代亟欲發展的狂熱，它還想保留可以全面操控局勢的策略和能力。這才是我們需要爭奪的。策略方面，我們需要預先掌握全球治理的發展。我們面臨的並不是一場需要擺脫的「危機」，而是面臨一場必須取得勝利的戰爭。

要對形勢有共同理解不能只依賴單一文本，而是需要國際間的討論。我們先拋磚引玉。其中一個想法是，我們要把革命主義者的傳統和主張放到歷史形勢的試金石上，切斷網綁革命的理想的千絲萬縷（如被綁到地上的格列佛一樣），我們摸索著什麼樣的過程、什麼樣的行動，以及什麼樣的想法可以讓我們擺脫眼前的困境。如果沒有可以同時闡釋我們所處的形勢以及尋找缺口的語言，便不會有革命運動。這本書接下來會詳細解釋這點。為此目標，這本書同時在四大洲以八種語言出現。如果我們無所不在，如果我們是大多數¹，我們從現在開始就要全球性地自我組織起來！

¹ 編註：這句話是網路駭客行動集體「匿名者」(Anonymous)的口號的一部分。



Merry crisis and happy
new fear

第一章
慶祝危機
歡度新恐懼

無論是微管理還是國家統治，官方都主動製造混亂或製造混亂的氛圍，透過將居民保持在震驚狀態、維持暈厥又無依無靠的感覺、不會結束的恐懼，來防止可能威脅到他們的危機發生。

1. 危機是一種治理模式

2. 真正的災難是存在以及形而上的

3. 末世論是騙人的

1.

我們這些革命主義者讓現代史戴了綠帽，而我們都以某種方式，成了不貞的共犯。現實是痛苦的，所以常被否認。在危機中我們有著盲目的信仰。這個信仰是如此盲目以及古老，以致我們看不到新自由主義的秩序如何打造出其軍火庫中的主力武器。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結束的翌日寫道：「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危機，新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但前者與後者一樣肯定會到來。」他花了餘生的時間，在全球經濟毫無危象之下，預告資本的最後大危機——當然他等不到最後。現在仍然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向我們銷售說當前的危機是一個「大危機」，以囑咐我們繼續等待他們可笑的最後審判。

米爾頓·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忠告他的芝加哥男孩們：「如果你想要進行改變，先發起一場危機。」資本不單毫不畏懼危機，而且從此試

圖實驗性地炮製它們。一如為了控制發生時間以及範圍而刻意引發雪崩。

一如人們燃燒平原來保證火災不會來臨，因為沒有東西可燒了。「哪裡以及什麼時候」是一個機會或者策略必要性的問題。最知名的是二〇一〇年，希臘統計局的主任不斷散布假數字來惡化國家的債務情況，以合理化三頭馬車²的介入。因此確立了一個事實：這個「主權債券危機」由一個正式受薪

於世界銀行的官員引起，而世銀的功能則是「幫」這些國家脫離危機。這是一個歐洲國家的大規模實驗，也是一個新自由主義完全改寫社會的計畫，

「結構性調節」的好政策的後果。

從醫學角度來說，危機在整個現代性中都好像是自然的東西，它突然而來或周期發生，為某個決定設定期限，一個終止危機處境所造成的普遍不安全感的決定。結局是快樂還是痛苦視乎如何對症下藥。危急之際也是批判性的時刻——一個關於病症以及醫治的討論被短暫開啟了。現況已經什麼都不剩了。解救危機的藥已不復在。相反地，危機的展開正是為了引進解藥。從今以後，他們談論「危機」，是為了（我們理解中的）重建，好像當他們準備好打人時都會稱被打的是「恐怖主義者」。二〇〇五年在法國的「市郊

2

譯註：Troika，歐盟執委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代表團。

危機」同時也宣告了對於內政部長在過去三十幾年親自策畫的上述「市郊」所發動的最大規模的都市計畫攻擊。

危機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是一個雙重的論述，他們之間更喜歡稱之為「雙層真相」。一方面，危機也是「創造性毀滅」的活躍時刻。所謂創造性包括機會、創新、企業主，而其中只有最優秀的、最有動力、最有競爭力的會生存下來。「這可能是資本主義實際上的訊息：『創造性毀滅』，拋棄過時的科技以及舊式生產方法，以便從新的來謀利，是唯一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資本主義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製造了糾紛。我們既是好鬥的企業家，也是喜歡懶懶散散過活的人，其實在內心裡我們都想要較少競爭性以及較少壓力的經濟，那裡所有人賺的都一樣多。「說這一段話的是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他在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六年期間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局局長。另一方面，危機論述像人口管理的政治方法一樣介入。不斷的重建一切，如社會援助的流程圖、如各個社區的企業，這是唯一的組織辦法，即通過存在條件的持續動盪，來消滅敵對派別。改變的修辭為的是粉碎所有的習慣，摧毀所有的連結，阻止所有的團結，使所有可靠的都搖搖欲墜，

以及維持對存在的長期不安全感。這對應著一種策略，我們可以這樣說，它「通過持續的危機來防止一切真正有效的危機」。在日常生活的層次上，它類似於著名的反革命實踐，「以動搖來實現穩定」，由官方主動製造混亂來建造比革命更想要的秩序。由微管理到整個國家的統治，將居民保持在某種持續的震驚狀態，維持暈厥以及無依無靠的感覺，由此讓每個人與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成為他們想要的樣子。現時在希臘所出現的大蕭條並不是副作用，反而是三頭馬車的政策想要的。

人們不明白「危機」並不是一個經濟事件，而是治理的政治技術；因此有些人在次級債謊言被戳破之際，急著宣稱「新自由主義已死」來讓自己出醜。我們不是生活在資本主義危機之中，而是相反，我們生活在危機資本主義的勝利之中。「危機」意味著：政府的力量正在增強。危機變成了統治者的手段。現化性根據過時的想法來量度所有東西；而現在它則是根據它將臨的崩潰來量度一切。在將希臘公務員的薪水減半之後，接著就推論，其實也可以不用付錢給公務員。每次要延長法國受薪者預付退休金的期限時，政府所用的藉口都是「保護退休系統」。當前永久的、單邊的危機，不再是古典

意義上的危機（也就是說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之後會有轉變）。相反地，它是沒有結局的結局、持久的末日、不確定的中止、不同程度的崩潰、永久的例外狀態。目前的危機什麼也沒有承諾，它只想讓統治者擺脫所有手段部署的限制。

2.

時代是傲慢的。每個人都希望獨特。人類的傲慢是要實現一個歷史性的碰撞，即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一個民主政治的總危機，以及一種殘酷的能源危機，這一切都為「一個世紀來不曾有如此規模的」猖獗的世界經濟危機加冕。因為生活在前所未有的世代讓我們的快感急劇上昇。我們只要翻開上世紀七〇年代的刊物，讀一下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部報告《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控制論(Cybernetics)專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一九七〇年二月發表關於「生態危機的根源」(*The Roots of Ecological Crisis*)的文章，或者由三邊委員會(Commission Trilaterale)在一九七五年發表的《民主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我們便會發現至少從

七〇年代開始我們便已生活在整體危機幽暗的星雲之下。在一篇一九七二年的文章〈末日與革命〉(Apocalypse and Revolution)裡，喬治歐·西薩蘭諾(Giorgio Cesarano)已經很清醒地分析了這個情況。如果第七封印曾在某個時刻被揭開，絕不是昨天。

二〇一二年底，美國非常官方的「疾病控制中心」為了改變，發佈了一本漫畫，書名為《基礎課程：喪屍末日》(101:Zombie Apocalypse)。它的大意很簡單：人們需要隨時準備應付各種突發事件，無論是核災、自然災害、系統出錯，或是一場暴動。這本書的結論是：「如果你已經準備好面對喪屍末日，這意味著你也已準備好應對其他災難。」喪屍來自海地的巫毒文化，在美國電影裡面，喪屍的暴動通常背後寓意著黑人普羅大眾的總體起義的威脅。也是因為這個，人們要準備好。現在已不能再用蘇維埃的威脅作為理由來確保人民向精神病一般的團結，所以人民最好自己準備好自我防衛，也就是保衛這個系統。維持一個不會結束的恐懼來防止一個恐怖的結局。西方的所有虛假意識都總結在這個官方的漫畫裡頭。很明顯的，真正的活死人是生活在美國市郊的小資產階級。很明顯的，他們膚淺地擔心生存，憂慮在經

濟上會錯失機會，感覺到無法好好維持某種形式的生活，這些都不是災難的後果，而是從今以後每個在新自由主義體制底下的個體活生生地演出絕望的奮力求生³的理由。產生威脅的並不是墮落的生活，而是已經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每個人都看得到，都知道，都感受得到。那些行屍⁴，也都是上班族⁵。如果這個時代迷戀末日式劇場（占電影作品很大一部分），那不只是因为這種娛樂在美學上給人的快感。另外，〈約翰啟示錄〉裡那些暴躁天使的襲擊，難以形容的暴雨，以及驚人的瘟疫早已有好萊塢電影的效果。只有宇宙的毀滅和所有人的死亡才能輕微地讓有屋子住的受僱者有活著的感覺，因為他們活著的氣息是最弱的。「完結吧！」以及「希望它持續！」是同一文明化的苦惱交替的兩種嘆息。一種加爾文主義的苦修味道滲了進來：生命是個延緩期，從不是完整的。我們談「歐洲虛無主義」並不是徒勞。它很成功地被對外輸出，直至現在已經蔓延到世界各處。與其說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不如說我們將會有虛無主義的全球化。

我們在二〇〇七年寫道：「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社會危機，而是一個文明的毀滅」。這種推斷在當時來說可能被當成光明會（Illuminati）的陰謀。

3 譯註：原文同電影 *Struggle for Life*。

4 譯註：原文同美國影集 *The Walking Dead*，台譯《陰屍路》。

5 譯註：原文同電影 *Salary Men*。

但「危機」也真的這樣發生了。甚至ATTAC⁶察覺到一種所謂的「文明的危機」。更尖銳的是，一名在伊拉克回來的老兵，後來成為「策略」顧問，二〇

6 譯註：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

一三年秋天他在《紐約時報》寫道：「現在，當我仔細思考未來，我看到大海使曼哈頓南部化為一片荒蕪。我看到因飢餓、暴風雨、氣候逃難引起的暴亂。我看到82nd團空軍射擊搶掠者。我看到供電系統無法運作，荒廢的碼頭，福島的廢物以及瘟疫。我看到巴格達(Baghdad)。我看到沉沒的跑車。我看到一個奇怪的以及不穩定的世界。〔……〕氣候轉變所提出來的問題，並不是要知道國防部長如何為爭奪原材料發起戰爭作準備，或者我們必須如何建堤防來保衛紐約字母城(Alphabet City)，或者我們將怎樣撤離霍博肯(Hoboken)。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只是買一架油電混合汽車，簽定協議，或者關掉冷氣機。最大的問題是哲學性的，是要明白我們的文明已經死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翌日，它(文明)只是被稱為會死的(morrelle)；而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在這個詞的各種意義上都是。

事實上，現在距離西方文明被診斷以及被各種事件公認終結，已有一個世紀，以下所談的不過是種消遣而已。但是這主要是一種抽離的方式，從已

經存在那裡很久的災難，我們這種災難，西方這種災難中抽離。這個災難首先是存在性的、情感性的、形而上的。這個災難寓居於西方人世界裡的一種難以置信的怪異當中，例如他們需要成為自然的主宰以及擁有者——人類要想法設法控制的只會是令他們畏懼的東西。他在自己 and 世界之間放置這麼多的螢幕不是沒有理由的。通過將自己與存在物分離，西方人創造了這個荒蕪的疆域，這個死氣沉沉的、滿懷敵意的、機械的、荒謬的虛無，而他必須通過工作，通過致癆的活動，通過表面歇斯底里的煩躁不安來不斷顛倒一切。不斷地從愜意到遲鈍，從遲鈍到愜意，企圖通過專家、義肢、關係等的累積，以及最終令人失望的科技產品來彌補自己在這個世界的缺席。越來越明顯的是，這個過度裝備的存在主義者，他不斷地想方設法，不斷地重新創造，他不能忍受一個在各方面超過他的現實。卡繆這個笨蛋不兜圈子地承認「人理解世界，是要將世界簡化為人類，然後蓋上他的印章。」因為跟存在，自己，以及「他者」——這個地獄！——的分離，除了憂鬱的節慶，愚蠢的消遣，或者大量地使用毒品，西方人卑躬屈膝地企圖通過他們稱之為的自由來重新振作自己。他身上確實缺乏對生活的感覺，因為生活令他感

到厭煩；事實上，生活讓他噁心。現實裡的事物是不穩定、不可簡化、可感觸的、身體性的、有重量、有熱度以及讓人疲勞的，而他卻投射在一個理想化的、視覺的、遠距離的數位螢幕上來保護自己，因為那裡既沒有磨擦也沒有眼淚，沒有死亡也甚至沒有網際網路的味道。

所有關於西方末日的謊言都是要讓我們悲哀地以為對此無能為力。這不是世界迷失了，是我們失去了世界，並且不斷失去；不是世界即將終結，而是我們已經被終結，被截肢，被分解，我們迷失地拒絕與現實產生生活的接觸。危機不是經濟的，生態的，或政治的，危機首先指的是在場的 (presence) 危機。在這一點，必要的商品 (典型的例子 iPhone 以及悍馬) 由讓人類缺席於世界的複雜設備所構成。一方面 iPhone 將通往這個世界以及其他人的所有可能的管道集中在一個物件上；它既是燈也是相機，是水平儀也是錄音機，是電視也是指南針，是導遊也是通訊設備；另一方面，它是一個操控我們時間的義肢，將我們置於一個恆常的、方便的「半在場」狀態，它身上無時不刻地保留著我部分的存在。最近甚至有人為智能手機發布了一個應用程式，用來針對「我們的二十四小時上網使我們跟真實世界脫

鈎」。它有一個好聽的名字：靈魂的GPS。至於悍馬，則是用來運載自我中心的氣泡，運載我對一切的無動于衷，直至在「自然」最難以接觸的隱蔽角落，然後絲毫無損地回來。而谷歌展示它的「對抗死亡」項目作為新的工業前景，足以說明人們如何誤解什麼是生命。

在精神錯亂的最後階段，人類甚至宣稱自己是「地質力量」；他用自己的物種來命名地球的生命；他開始談「人類紀」(Anthropocene)。最終，他自認為主角，不再自責蹂躪了海洋、天空、地面上的、地下的生命，不再遣責自己導致前所為有的植物與動物的滅絕。但是那裡也有一些值得留意的東西，他對於自己與世界之間災難性的關係所造成的災難，所採取的態度也是總是災難性的。他計算兩極大浮冰消失的速度。他測量非人類的生命形式的滅絕。他不再由自己的感性經驗出發來談氣候轉變——這種鳥不再跟以往一樣在同一季節回來，我們不再聽到這種昆蟲鳴叫，這類植物不再於同一時候開花。他們談的是科學性的數字以及工具。他們以為只要說得出溫度將會上昇多少度，降水量將減少多少公釐，便等於說了很多。他們甚至說「生物多樣性」。他們從太空觀察到地球生命的減少。他們傲慢地以為自己現在

是在像父親一般地「保衛環境」，雖然環境從沒有要求過他們。他們以為那是最終的出口，卻不知道越來越深陷泥沼。

客觀的災難首先讓我們遮掩了另一個災難，一個更明顯而且更大型的災難。自然資源的消耗大概比我們的同時代人深受衝擊的主觀的消耗以及生命資源的消耗慢。如果我們樂於詳列環境所遭受的破壞，這也是為了替自己內在的驚人的崩壞蒙上面紗。每個海上漏油事件，每個貧瘠的原野，每次物種的滅絕都是我們靈魂破碎的影像，反映著我們在世界裡的缺席，我們生活在其中的內在無力感。福島讓我們看到了人類及其淫威徹底破產了，那只造成了廢墟——這些日本平原看起來如此平靜，但是將來幾十年人類不能在那裡居住。無止境的分解成功將這個世界變得無法居住：西方人將用自己最畏懼的東西——輻射廢料——作為存在模式來終結自己。

左派的左派，當被問到革命是什麼，急著回答：「將人放到中心」。這種左派不明白的是，這個世界對人類是感到如何疲累——人類這個物種相信創造的快感，以為自己可以任意破壞，因為一切都會回來。「將人放到中心」，是西方的計畫。我們知道後果。離開方舟，背叛這個物種的時刻到

了。沒有人類可以獨立於世界、宇宙以及遍布地球的其他生命形式。沒有人性，只有地球人和他們的敵人——無論哪種膚色的西方人。我們這些革命主義者，背著隔代遺傳的人道主義，留意到過去二十幾年，中美以及南美土著不間歇的起義。他們的口號是「將土地放到中心」。這是對人類的宣戰。向他們宣戰可能是讓他們重新回到地上的好方法——如果他們不再像平時一樣裝聾的話。

3.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來自十八個國家的至少三百名記者占駐了法國奧德省(Aude)比加拉什(Bugarach)的一個小村。至今為止，馬雅日曆從來沒說過這一天是世界末日。說這個村子可以避開這個不存在的預言其實是個惡作劇。全球的電視台派去了大批記者。人們好奇地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會相信世界末日——我們根本就不相信世界末日，也不再相信所愛的人。那天在比加拉什，除了官方派來的大批觀察員，一個人也沒有。這些記者最後在自己身上找樂趣：他們沒有目的地等待，無聊、什麼事也沒有發

生。他們上當了，但也讓我們看到了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景象：記者、等待、拒絕發生的事件。

我們不能小看末日的狂熱，和這個時代所經歷的對大決戰的飢渴這種狂熱的存在性的色情電影，是和預言式紀錄片交合，片中展示的影像混合了蔽日如雲的蝗蟲將於二〇七五年猛撲向波爾多的葡萄園，以及成群的「氣候移民」將攻取南歐的海岸——這是歐洲對外國境管理機構(FRONTEX)定下的肅清人口任務。世界末日是最古老的東西。從最古老的時代起，無力者對末日的熱情從來沒有減少。在我們這個年代的新東西是，末日被資本完整吸收，並為其服務。災難的基準線正是現在治理著我們的東西。如果有東西註定要保持不完成狀態，那就是末日預言，無論是經濟的、氣候的、恐怖主義的、還是是核能的。說出這些預言只是為了提出避免它出現的某些方法，而最常見的是強調治理的必要性。沒有一個組織，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宗教的，會因為有證據推翻它們的預言而承認失敗。因為預言的目的從不是為了未來著想，而是操縱現在：在此時此地強迫等待、被動以及屈從。

事實上不單只除了當前的災難之外就沒有其他的，而且很明顯大部分真

實的災難是為了解除我們日常的災難。很多例子顯示真實的災難舒緩了存在性的末日危機，例如從一九〇六年舊金山的地震到二〇〇二年癱瘓了一部分紐約的暴風雨桑迪(Sandy)。我們通常假定在危急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揭露人類深遠和永恆的獸性。我們期望由所有破壞性的災難、所有經濟危機或者所有「恐怖襲擊」中看到名為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怪物(chimère)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控的掠奪。當文明單薄的堤壩剛崩塌，人們想見到令帕斯卡(Pascal)著迷的「人類的醜陋的內在」與邪惡的激情的湧現。這種狂熱、嫉妒的、殘忍以及可憎的人性，至少自從修昔底德(Thucydide)起便被有權勢的人利用，一種不幸地被大部分歷史知名的災難所推翻的幻覺。

文明的毀滅一般不會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混亂戰爭(tous contre tous)的形式發生。在嚴重的大災難時刻，這個充滿敵意的論述只是被警察、軍隊或者臨時組成的民兵用來作為理由，去優先保衛財產免於受搶劫。它也可以用來掩蓋官方盜用公款，就好像意大利在拉奎拉(L'Aquila)地震之後的公民保衛部門一樣。另一方面，類似這樣的世界的瓦解，反而讓我們看到其他生活方式，包括在「緊急狀況」期間。一九八五年墨西哥一次嚴重地震之

後，人們在瓦礫中重新發明了革命性的嘉年華以及為人民服務的超級英雄（以一名傳奇摔跤運動員超級巴里奧〔Super Barrio〕為原型）。在日常生活暫時中斷的片刻，他們順勢重獲令他們感到滿足的存在，他們將建議物的崩塌和政治系統的崩塌連在一起，盡可能地將城市生活從政府的手中釋放出來，重新建立被粉碎了的居所。在二〇〇三年的暴風雨之後，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一名熱心人也描述了同樣的情況「一個早上全世界都被叫醒了，然後全變了。沒電了，所有商店都關門了，人們跟傳媒隔絕了。所有人走到街上跟其他人說話，看發生了什麼事。這並不真的是街頭慶祝，而是所有人同一時間都在外面看到大家都不認識的人——這可以說是一種幸福。」在颶風卡崔娜（Katrina）之後的幾天，面對政府的忽視以及安全部門的恐慌，這些小社區在紐奧良自發地出現了。他們每天自我組織食物、保健、衣物，雖然有時也要冒險在商店裡拿東西。

重新思考一種革命的概念，便是要在災難中找到突破，也就是要從將革命所包含的末日意識踢走開始。在這點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末世論跟美國根本的帝國憧憬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仍可以在一元美鈔上見到：

Annuitcoepit. Novus ordoseclorum⁷。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聖西門主義者，冷戰時期的俄羅斯人和美國人，所有人都表現出同樣的神經衰弱的憧憬，要建立和平的時代以及貧瘠的富有，在那裡人們不再有害怕，所有矛盾會被消除，所有負面的會被吸掉。根據科學和工業建立一個富有的、全面自動化、最後變得和諧的社會，就好像以精神病院或者療養院為原型建立的天堂。這種理想只能出自於深遠的病痛，它甚至不再期求寬恕。好像歌詞裡說的「天堂是個什麼也沒發生的地方（Heaven is a place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s）」

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原創性以及所有醜聞在於以為要到達千禧，必須經歷經濟的大災難（雖然其他人都覺得這很多餘）。我們將不再等待千禧，也不等末日，這個地球上將不會有和平。放棄和平的想法是唯一真正的和平。面對西方的災難，左派通常只會採取唉嘆的立場、宣告什麼都沒用，以致在他們想要捍衛的人面前也表現得虛弱無力。我們不應該推翻我們置身其中的例外狀態，而是利用它們來反抗權力本身。在這些狀態下，輪到我們變得輕鬆了，因為我們創造的力量遠超於法律的處分。我們有絕對自由的空間去做

7 譯註：中譯為「神領導我們。新時代秩序。」

決定，發展策略，如果這些都是對於處境的認真回應的話。對我們來說只有歷史戰場以及遍布在其中的力量。我們的行動沒有界線。歷史生命環抱著我們。如果有理由要拒絕，那也只是神經官能的作用。一名前聯合國的官員就最近的一部關於喪屍末日的電影做出清楚的評論說：「那不是末日，還遠著呢。如果你能戰鬥，那就戰鬥吧。你們要互相幫助。戰爭才剛開始。」



Ils veulent nous obliger
à gouverner, nous ne
céderons pas à cette
provocation

第二章

他們想逼我們服從治理
我們將不會向這種挑釁讓步

西方的修辭是沒有驚喜的，所有反對運動的出現原因都是人民「憧憬民主」。但起義從來就不是民主的，所有的民主主義者都被麻醉了、都對「決策」患有強迫症，但「決策」從一開始便是個假議題。民主的對立並不是獨裁，而是真理；法律也不是民主的最終成果，而只是一種過渡形式。

1. 當代起義的面貌
2. 沒有所謂民主的起義
3. 民主只是純粹的統治
4. 廢黜權力理論

1.

有人死了。直接地，或者間接地，被警察殺死。他是無名氏、失業者、這種或那種的「毒品販子」、中學生，他在倫敦、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雅典或者克利希叢林(Clichy-sous-Bois)。人們說那是一個「年輕人」，十六或者三十歲。說他年青因為他在社會裡毫不起眼，當他們成為「某人」才算成年，但年青人還什麼也不是。

有人死了，國家暴動。它們不是互相因果，前者只是導火線而已。格里戈羅普洛斯(Alexandros Grigoropoulos)、馬克·達根(Mark Duggan)、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馬辛尼沙·格爾馬(Massinissa Guermah)——死者的名字在這些日子這幾個星期成為普遍的無

8 譯註：「Tayyip，土耳其總統的名字。」

名氏、共同剝削的名字。起義，首先是那些什麼都不是的人們的事情。他們流連在咖啡店、在街上、在生活裡、在學院裡、在網際網路上。起義集合了社會持續瓦解所分泌的過剩浮游元素，平民，還有小資產階級。所有曾被視為邊緣的、被淘汰的或者沒有未來的人，重新回到中心。在西迪布濟德，在凱塞林(Kassine)，在塔萊(Thala)，這些「瘋子」、「可憐蟲」、「一無是處的人」、「怪物」，是這些人最先傳開了他們不幸的同伴死去的消息。他們站到椅子上、桌子上、紀念碑上，在所有的公共空間，在城市各處。他們高談闊論鼓動準備好聽他們的人起義。在他們的背後，是已在行動的，對於事業沒有什麼期望的中學生。

暴動持續了幾天或者幾個月，導致了政權的倒台，或者摧毀了任何對社會和平的幻想。它本身是匿名的：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訴求、沒有計畫。如果有口號的話，那是對現存秩序否定的吶喊：「下台吧！」、「人民想要系統崩潰！」、「我管他媽的！」、「塔伊普⁸，冬天來了。」在電視，在電波裡，負責人一個一個音節地說出他們慣常的修辭：這些是寄生蟲、搞麻煩鬼、不知在那裡冒出來的恐怖分子，肯定是受外國勢力收買。反抗的

人並不想取代某人登上寶座，最多只是置之以問號而已。造反的不是貧民階級，不是工人階級，不是小資產階級，也不是什麼群眾。沒有足夠的同質性可以歸納出一個代表性的東西出來。至此為止，沒有冒出任何新的革命主體能逃脫觀察者的眼睛。如果我們說「人民」在街上，這並不是一早已存在的人民，相反的，是一直都不存在的人民。並不是「人民」創造了暴亂，而是暴亂通過激發共同的經歷以及智慧，以及早已消失的人類的組織以及真實生活的語言，創造了自己的「人民」。過去的革命承諾人民新的生活，而今天的起義則交出了鑰匙。開羅的極端分子的轉變並不是因為他們在革命之前便已是革命組織，他們只是一些能夠自我組織來對付警察的群體；只是因為在「革命」期間，他們的突出角色逼使他們要面對這些原本屬於革命主義者的問題。事件並不是因媒體炒作而產生（媒體炒作只是用來僵化運動），而是在邂逅中自我產生。「邂逅」並不像「運動」或者「革命」這些詞那麼壯觀，但更具決定性，沒人曉得一場邂逅可以成就什麼。

再者，起義像粒子般無法被察覺，它在地區、集體、占屋者、「社會中心」，孤立個體等的生活中延伸，在巴西如在西班牙，在智利如在希臘。這

並不是它們建立了一個政治性計畫，而是因為它們促使了革命的生成。因為在那裡發出的亮光，使那些曾經歷過的人希望對它中誠，不想與它分離，要建立他們之前的生活缺乏的東西。如果一度消失在媒體的雷達下的西班牙空間占領運動，沒有巴塞隆納以及其它地方的共同分擔以及自我組織的接力，那政府清除康比也斯(Car Vies)社會中心占屋的計畫就不會因為桑茲(Sanz)郊區持續二天的騷亂而被迫取消，人們也不會見到整個城市都投入了受襲地區的重建，那裡最多只有幾個占屋者冷漠地面對清場。在這裡所建立的，不是萌芽中的「新社會」，也不是最終顛覆權力來重建新的權力的組織，而是集體的力量，它的堅固以及智慧使權力變得無力，並且逐一地挫敗了每個陰謀。

革命對於革命主義者來說常是最出其不意的。但在當前的起義中，有些東西特別令他們目瞪口呆：起義不再是出於政治意識形態，而是出於倫理的真理。這兩個字放在一起對於所有現代精神來說像是矛盾修辭法。證實什麼是「真」是科學的責任，不是嗎？它只是使我們的道德規範以及其他的價值變得偶然。對現代人來說，一邊是世界，另一邊是現代人自己，而語言則

跨越兩者之間的鴻溝。真理，如我們所學的，是深淵底下的結實的橋樑——關於世界的正確描述。我們輕易忘記在漫長的學習當中，我們經由語言發展出與世界的關係。語言，遠不只是描述世界，而且幫助我們建構一個世界。倫理的真理，不只是關於世界的真理，也是我們讓自己能生活在世界中的真理。這些是真理，是肯定，是語話或者沉默，都是可以經歷但不能被證明的。沉默而堅決的眼神，緊握的拳頭，盯著老闖幾近一分鐘，然後大聲地告訴他「造反有理」。這些是連結我們自身的真理，也彼此之間連結了我們周遭的人。它們帶我們進入一個共同的生活，一個無法分開，沒有「我」這個虛幻的內壁的存在。如果地球人準備好，要為了不讓一個地方（如西班牙的加蒙納爾〔Gamonal〕）被改建成停車場而冒險，或不讓一個公園（類似土耳其的蓋齊〔Gezi〕）變成購物中心，或者田地（如蘭德斯聖母鎮〔Nordre-Dame-des-Landes〕）被建成飛機場——這些我們所愛的，我們所依附的存在物、地方或者想法都是構成我們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就不能再將生命簡化為由皮膚包著的「我」，或者由「我」所占有的財產。所以當世界被侵犯時，其實就是我們被襲擊。

吊詭的是，當一個倫理的真理被陳述為一種拒絕，說「不」讓我們立足於存在。另一個同樣吊詭之處是，我們見到的個體其實很「非個體」，一個人自殺已經可以粉碎由社會謊言所建立的堡壘。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西迪布濟德的警察局前自焚的姿態已足夠證明。他自焚的力量來自於他強烈的肯定。他說：「我們被弄成這樣的生命並不值得活下去」，「我們不是生來讓警察侮辱的」，「你們可以將我們當成什麼也不是，你們卻永遠不能將屬於活人的主權拿走」，甚至「看我們，這些低下的、不值得活的、被侮辱的，我們超越你們用來維持病態權力的悲哀手段」。我們要清楚理解這個姿態。如果說威爾·戈寧(Wael Ghonim)在受非法禁錮之後的電視訪問中有改變埃及局勢的效果，那是因為在他的眼淚底下，一個真理同時在每個人心中發揮了力量。同樣在占領華爾街的頭幾個星期，在那些常見的社運經理建立了他們負責做決定的「工作小組」，而大會只能投票贊成或反對之前，在一千五百人面前做出的典範的是，有一天一個傢伙拿起麥克風說：「嗨！大家還好嗎？我的名字叫邁克。我只是一個來自哈林區(Harlem)的小混混。我討厭我的生活。操我的老闆！操我的女朋友！操警察！我只是想說，我很高興

和你們一起在這裡。」這些話由被警察禁止的麥克風之後成立的合唱團「人肉麥克風」傳了七遍。

占領華爾街的真正內容並不在於它的訴求，那是運動之後才被標籤，就好像貼在河馬身上的便條紙。它不是要更好的工資、舒適的住所或者更慷慨的社會保險，而是對於我們被迫接受的生活的憎恨。憎恨這種生活，在那裡我們是孤獨的，獨自面對生活的必需：每個人要賺錢、居住、糊口、自娛以及自療。憎恨大都市裡個體可憐的生活形式——多慮的不信任／聰明但過度懷疑／短暫而且表面的愛，將所有邂逅都性慾化，之後定期回到一個舒適而絕望的分隔／永遠神不守舍，所以對自己無知，所以害怕自己，所以恐懼他者。在祖科蒂（Zuccotti）公園所描述的共同生活，帳篷、寒冷、雨天、被警察包圍在曼哈頓最昏暗的廣場，並不是完全展開的 *Vita Nuova*，而只是都市生存的可悲開始變得明顯。人們最後一起明白了共同的境況：我們都被視為自己的企業家。占領這種存在性的動盪正是占領華爾街的心跳，只要占領華爾街維持其新鮮與強健的生命力。

起義在今天面對的問題是：怎樣知道那是生活想要的形式，而不是和它

所反抗的制度一樣？然而，認識到這點，便立即會導致對西方倫理之無力的認識，也表示拒絕將某一場暴動後某個伊斯蘭黨派的勝利歸為當地人民精神狀態的落後。相反，我們必須認識到伊斯蘭主義者的力量在於，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首先是一個倫理規範的系統。換句話說，如果他們比其他的政客更成功，這正是因為他們不將自己置於政治陣地的中心。當一個誠懇的年青人情願參與「聖戰」，也不願加入第三產業的受薪自殺部隊，我們可以停止唉嘆或者大喊狼來了。作為成年人，我們要接受我們在不帶諂媚的鏡子裡的臉孔。

二〇一二年，在斯洛維尼亞的馬里博爾(Maribor)這個平靜的城市發生了一場街頭暴亂，最後漫延至全國。在一個類似瑞士的國家發生一場這樣的暴亂已經很難得。但是更令人吃驚的是，它的起源是因為人們得知國內公路的鏡頭倍增，獲取絕大部分罰款的單位則是一家與當權者親近的私營公司。有什麼比因為公路鏡頭引起的暴亂更少「政治性的」？但又有什麼比拒絕任意宰割更有「倫理性的」？那是二十一世紀的米歇爾·科哈斯(Michael Kohlhaas)。在幾乎所有當代的暴動中，執政者的腐敗這個主題的重要性

證明：這些暴動的倫理性先於政治性，或者它們是政治性因為它們藐視政治，包括激進政治。而左派在做的是：否定倫理真相的存在，然後以比巧合還要脆弱的道德取而代之，讓法西斯主義者——唯一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感到抱歉的人，可以繼續作為唯一肯定的政治力量。法西斯主義者將繼續成功，繼續讓新生的反對力量扭轉過來對抗反抗本身。

或者這也是所有「反緊縮運動」失敗的原因，否則難以理解，因為在當前的條件下它們本應如星火燎原，而不是還在歐洲做第n次嘗試。因為人們並沒有正確地定位緊縮問題：它是一個殘酷的倫理分歧，一個關於什麼是生活、什麼是好生活的分歧。總結來說：緊縮在清教徒文化的國家裡被視為美德；而在大部分南歐地區來說，則是貧困與不堪。當前發生的，不只是有些人想在另一些人身上強施緊縮政策，而他們不同意。而是有些人覺得緊縮絕對是一個好東西，而另一些人不覺得，但又沒有勇氣說那絕對不幸。若是局限在反緊縮的鬥爭，並不只加強了誤會，而且含糊地承認了一個不適合我們的生活，因此注定失敗。我們不需要在它處尋找原因去解釋為何這麼少人參與一場還沒開始就已經失敗的戰爭。我們需要的是了解衝突的真正問

題：有人想將某種特定的清教徒的幸福的概念——工作、節約、清醒、誠實、專心、虛心、謹慎強加到歐洲各處。我們必須以另一種生活的概念來反緊縮計畫，舉例來說，它包括分享而不是節約，對話而不是一言不發，戰鬥而不是屈服，慶祝我們的勝利而不僅是捍衛，與他人接觸而不是瑟縮一角。我們無法量度美洲次大陸土著運動中「美好生活」(*buen vivir*)作為政治性肯定所賦予的力量。一方面，它清楚地描述了人們為了什麼，以及為了反對什麼而鬥爭；另一方面，這呈現了千百種不同理解「美好生活」的方法，不同並不意味著要敵對，至少不是必須的。

2.

西方的修辭是沒有驚喜的。每次當昨天還被所有領事館擁戴的暴君的反對運動出現，原因都是人民「憧憬民主」。這個計謀跟雅典一樣舊，它仍很有效，甚至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占領華爾街大會支付了二萬九千美元給二十多名國際觀察員去巡察埃及選舉。在解放廣場的同志們，也就是被協助的人回應：「在埃及，我們的街頭鬥爭不僅是為了有一個議會。我們想跟你

們分享的鬥爭，遠不只是為了一個運作順暢的議會民主。」

這不是要為了反對暴君而戰鬥，為了民主而戰鬥——我們也可以為了另一個暴君、哈里發，或者純粹為戰鬥而戰鬥。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個東西不能被大多數原則歸類，那便是起義。它的勝利依靠質性的準則，如決心、勇氣、自信、策略、集體能量。如果繼軍隊之後，選舉是兩世紀來鎮壓暴亂最常用的工具，那是因為起義者從不佔大多數。至於為何人們習慣於將民主與和平主義聯繫在一起？我們可以讓開羅的同志們來回答：「那些說埃及革命是和平的人，沒有看到警察鎮壓我們的恐怖，他們也看不到那些革命者為了捍衛他們的占領以及空間，用來對付警察的反抗和力量。政府也承認：九十九名警察被燒死，過千輛警車被毀壞，所有執政黨的辦公室遭焚毀。」起義不遵從任何形式主義，任何民主程序。如在所有大規模的遊行，它執行對公共空間的使用。如所有堅決的罷工，它是既成事實的政治。它包括創議、實踐、姿態；決定，是在街道上，提醒人們 *populaire*（大眾）來自拉丁文的 *popularis*，也即是「破壞、蹂躪」。它在所有語言的表達裡，在歌曲、牆上、在講話裡，在戰爭裡，但不在磋商裡。或者起義的奇蹟在於：在

同一時間，起義既解除了做為問題的民主，同時創造出一個彼岸的世界。

這顯然並不缺少觀念論者——如內格里(Toni Negri)以及夏德(Michael Hardt)，將過去幾年的運動簡化為「民主社會的建設是必要的議程」，以及主張教導我們「實踐、才智，以及必要的知識來自自我管理」，好「讓我們有能力行使民主」。對於他們來說，正如一個西班牙的內格里主義者不太精確地歸納：「從解放廣場到太陽門(Puerta del sol)，從憲法廣場(Square Syntagma)到加泰羅尼亞廣場(Place Catalunya)，一個呼聲從此到彼重複：『民主』。這是今天在世界巡演的節目的名字。」事實上這並沒有錯，如果民主修辭只是從天上來的，以及從外加進運動裡的聲音，來自政府或者它的繼承者。我們虔誠地聽著，好像聽牧師講道，然後捧腹大笑。但這是要說明這個修辭對於精神、人心、鬥爭有相當的影響，好像我們已經談了很多的「憤怒者」的運動所見證著的。我們寫「憤怒者」時用了引號，因為在太陽門廣場第一個星期的占領中，人們聯想的是解放廣場，而不是由社會主義者史蒂芬·黑塞爾(Stéphane Hessel)所寫的無攻擊力的小冊子，他只是呼籲一場「有醒覺」的市民運動，以防止真正的起義的威脅。只是在第二個星期因為一份與社會主

義黨相關的報紙《國家報》(El País)的報導，運動才獲得這個唉聲嘆氣的名稱，亦即大部分的迴響及其限制的本質。這同樣出現在希臘，那些占領憲法廣場的人否認媒體貼上去的標籤如「惱怒者(aganaktismenoi)」、「憤怒者」，而自稱為「廣場運動」。「廣場運動」這個聽起來相對中立而不帶評論，更能代表這些奇異的聚集的複雜性，乃至混亂性(confusion)，那裡馬克思主義者和藏傳佛教徒一起居住，而激進左派聯盟(Syriza)的擁護者和愛國的資產階級一起相處。這種戲劇性的操作對許多人來說都不陌生，它通過符號性地操控運動，將它慶祝成它不是的東西，以求適當時將其埋葬。尼采說：「沒有人比憤怒的人撒更多的謊」。他向激怒他的東西說謊以掩蓋不妥之處，假裝動搖他的事物並沒什麼大不了。他假設了自己的無力以便隨時可以撒手不負責任，然後將它轉代為道德、有道德高度的情感。不幸的人相信自己有權利。我們曾見到一些生氣的人搞革命，但憤怒的群眾，除了無力地反抗之外，我們不曾見過他們幹別的事。資產階級者抱怨，然後進行報復；小資產階級憤怒，然後鑽到壁龕裡。

「廣場運動」與這個口號「democracia real ya!」相關，因為太陽門的占領運

動由十五個「駭客行動者」在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五日(Le 15 mai)在平台上用這個名字呼籲，西班牙人稱之為「15 M」。這不是工人聯會的直接民主，也不是古代真正的(vraie)民主，而是真實的(réelle)民主。「廣場運動」出現在雅典，出現在國會的形式民主的所在地的石雨中一點也不奇怪。在此之前，我們以為真實的民主已經存在，如我們一向所知的那些從不實現的選舉承諾，叫「國會」的有錄音的大廳，以及用來製造煙霧以方便向院外遊說集團輸送利益的協商。但對於15 M的「駭客行動者」來說，民主的真實其實背叛了「真實的民主」。發動這場運動的所謂網軍對其中的差別並非毫無所感。「真實民主」的要點在於：技術上來說，你們每五年一次的選舉，你們那個連電腦也不會用的胖子代表，你們像差勁的劇場或者像雜亂的市集的大會，所有這些都被淘汰了。今天有賴於新的通訊技術、網際網路、生物認證、智慧型手機、社群網絡，你們全都被淘汰了。今天我們在技術上可以實現真實的民主，也就是說一個即時又持續的民調來了解人們的意見，以及通過它來做決定。有一個作家在上世紀二〇年代已預見了這點：「我們可以想像一天有這樣的一個發明，人們不再需要離開家裡就可以隨時表達自己

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有一個機器可以在某個中心紀錄這些意見，這個中心只供人查詢結果。「他看到」一個政治以及公共生活的絕對私人化」。儘管聚首在廣場上，這個永恆的民意測驗在不斷的發言中，由「憤怒者」以舉手的形式沉默地進行。甚至連古老的喝采或喝倒采的力量也在人群中消失了。

「廣場運動」一方面是普世公民身分的數碼幻覺在現實中的投射或者碰撞，另一方面也是邂逅、行動、慶祝以及重奪共同生活的例外時刻。這是那些以「大會定位」來行使其意識形態怪僻的小官僚無法看到的，他們認為所有的行動、姿態、聲明都必須由大會同意才有存在的權利。對於所有其他人來說，這個運動徹底地粉碎了全體大會的神話，也即是說其中心性的神話。在第一晚，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巴塞隆納的加泰羅尼亞廣場有一百人，第二天有一千，第三天有一萬，而頭兩個週末有三萬人。因為人數眾多，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不再存在著直接民主以及代表民主的差異。大會是每個人都被迫要聽但不能反駁的地方，就好像看電視一樣；它也是令人疲乏不堪的充滿戲劇性的場所，它裝扮出來的真誠、悲傷或熱忱讓它更具欺騙性。委員會極端的官僚化將持續，它需要兩個星期才擠出一份難啃而又

無趣的兩頁文件，來解釋「我們相信什麼」。在這點上，針對這個境況的可笑，無政府主義者想要以投票來同意大會只成為一個討論以及分享資訊的地方，而不是決策的單位。滑稽之處在於：以投票來決定不投票。而更滑稽的是：投票被三十多名托派主義者粉碎。這類的小政客流露著無聊以及對權力的飢渴，最後每個人都背離這些令人厭煩的大會。一點也不奇怪的是，不少的占領都有相同的經歷以及相同的結論。在奧克蘭如在教堂山（Chapel Hill），人們覺得大會沒有任何權利批准任何團體可以或想要做什麼，它只是一個交流而不是決策的地方。當有人在大會提出意見然後被接納，只是因為足夠的人認為不錯而且可以實行，而不是因為要服從大多數。人們採取決定，而不是去決定。二〇一一年六月，憲法廣場的幾千個個體採用大會決策的方法決定要在地鐵內行動；而當天，採取行動的只有二十多人。「決策」問題，是全世界所有麻醉了的民主主義者的強迫症，其實從一開始便是個假議題。

在「廣場運動」，雖然對全體大會的戀物情結被粉碎，大會的運作卻絲毫無損。我們只須知道所有能從大會走出來的東西都是早就已經存在的。

如果我們聚集了數千個除了共同在這個地方之外毫無共通之處的無名氏，那我們就不能期待這產生的結果，會比任何比他們各自為政時所同意的更多。我們不應想像，例如，單是透過大會本身就能取得互信，一起承擔危險去做一些違法的事。像大廈房東大會這樣令人厭倦的東西都可能存在這個事實，已足以防礙我們對大會的熱情。一個大會所能實現的，只是既存的共享的程度。一個學生大會不是一個街坊大會，而街坊大會也不是一個反「重建」的街坊大會。一個工人大會從開始到結束不同於罷工。它肯定跟一個瓦哈卡州(Oaxaca)的人民大會沒有多少共同的地方。任何大會都能生產出來的東西(如果它真的有嘗試的話)只有一個，是共同的語言。但是在那裡人們僅有的共同經歷是分隔，人們只聽到分隔的生命的語言。憤怒因此就成為如同原子一般的個體在政治上能夠觸及的最高強度，它混淆了世界和世界之間的螢幕，如混淆了感覺和思考。所有由原子組成的全體大會，除了一起感動之外，只能體現一種對於政治的錯誤理解而造成的麻痺，始於一種無法改變世界的無力感。這就好像無數緊貼在玻璃容器內壁的臉孔，只能吃驚地看著機械般的宇宙持續運作，卻不能介入。緊隨邂逅以及被點數的快感之後的

集體無力感，和警棍和胡椒噴霧一樣穩穩地將那些帶著克丘亞（Quechua）帳篷¹⁰的人驅散。

在這些占領之中，有一些東西超越了這種無力的感覺，這正是大會的戲劇性時刻裡沒有地位的東西，那是人們棲息的神奇能力，棲息在不能居住的環境下：在大都市的中心。在被占領的廣場上，那些自古希臘來被政治棄置在備受輕視的「經濟」、「家務」、「生存」、「再生產」、「日常」、「工作」等領域的東西，在這裡被肯定為集體政治力量，而不是私人事務。在不同的地點，人們日常自我組織的能力足以應付三千人的餐食，在幾天內建好一個村子讓受傷的行動者可以休養，這可能是「廣場運動」的真正政治性的勝利。而塔克辛廣場（Taksim）以及烏克蘭獨立廣場（Maidan）的占領添加上的，是製造屏障以及以工業規模配制莫洛托夫雞尾酒¹¹的能力。

像大會這樣平凡以及沒有驚喜的組織能得到狂熱的崇拜，這足以說明民主情感（affect）的性質。如果起義首先是因為生氣而起，然後欣喜，那麼形式主義的直接民主則是一開始便焦慮不安。沒有東西不是由已製定的程序決定。沒有任何事件超出我們的意料。情況總停留在我們的高度。沒有人會感

10 譯註：Quechua為一平價運動用品品牌。

11 譯註：cocktail Molotov，汽油彈。

到受騙，或者會和大多數人有公開的衝突。沒有人必須靠力量來讓人聽他說話，沒有人迫使其他人做什麼。最後，大會的設置——從演講到無聲的鼓掌——就像組織一個綿軟無力的空間，除了一個接一個的獨白之外沒有爭議，也沒有必要為自己的想法與跟其他人辯論。如果民主主義者必須將這個處境變得如此結構化，那是因為對它沒有信心。他們對這個處境沒有信心，最根本是因為他們沒有自信。因為害怕被處境凌駕，他們必須付出任何代價去控制它，最後經常是摧毀它。民主首先是一系列的程序，只要跟從它們人們就可以讓這種不安形式化以及結構化。我們不會控訴民主：我們不會控訴不安。

只有全方位的注意力的展開，才能讓我們對民主程序的眷戀中解放出來，不只注意所說的，最重要的是沒有被說的，注意事情是怎麼被說的，注意在臉上以及在沉默中讀得到的。我們需要對彼此有充分的注意力，我們對共同的世界的新的注意力，填滿民主在原子個體中間生產出來的空隔。我們要做的是去除機械式的討論機制，取而代之一種真理、開放、對在場事物感性的機制。在十二世紀，特里斯坦(Tristan)和伊索爾德(Yseult)¹²需

12 譯註：十二世紀的詩體小說，後成被里查·瓦格納(Richard Wagner)改為歌劇而著稱。

要在黑夜相聚，那是「議會」；而當有些人偶然在街上或者其他地方碰到，聚集在一起討論，那是「大會」。我們需要將大會的「主權」和議會的閒聊對立：重新發掘與語話、與真正的語話連結的情感。民主的對立並不是獨裁，而是真理。因為只有在真理的時刻，權力才會變得赤裸，起義從來就不是民主的。

3.

「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在不受爭議的情況下全球性圍獵他們的一名情報人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因為他打著壞主意要揭露通訊監視計畫。事實上，我們西方大部分美麗的民主國家都成了毫無顧忌的警察政體，而當前大部分警察政體都炫耀自己是民主的。我們大有理由不爽，像帕潘德里歐(Giorgos Papandréou)¹³這樣的首相因為想由選民來決定國家政治(也就是三頭馬車)，而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被撤職。歐洲人習慣了當感到事情失控時就叫停選舉，當歐盟委員會不滿投票結果時，選舉就要重新來過。二十年前那些神氣十足的「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不再趾高氣揚。我們是否

13 譯註：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一年希臘首相。

知道，谷歌因為面對參與稜鏡計畫¹⁴這個醜聞，而需要邀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來解釋給他們的僱員知道，為何他們必須這樣做，為何我們的「安全」值得這個代價？同樣滑稽的是當我們想像，這個一九七〇年代在北美所有法西斯主義者政變背後的人，在矽谷谷歌總部面對這些如此酷、如此「無辜」、如此「非政治化」的僱員面前長篇大論何謂民主。

我們記得盧梭在《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裡說的「如果有屬神的民族的話，那它會民主地自治。但這樣一個如此完美的治理並不適合於人類」。李伐洛（Rivaroli）說得更刻薄：「這個世界有兩個真理不能被分開：

一、主權在於人民。二、人民不應該實行主權。」公共關係的奠基人愛德華·伯內斯（Edward Bernays）在他的《宣傳》（*Propaganda*）的第一章〈組織混亂〉中這樣寫：「自覺、聰明地操縱群眾的意見以及組織習慣對於民主社會尤其重要。那些操控這個不被覺察的社會機制的人，組成了一個真正治理這個國家的無形政府」。那是一九二八年。當我們談到民主時，民主最終的目標是治理者以及被治理者的同一性，無論使用什麼手段來實現這個同一性。那是折騰我們的偽善以及歇斯底里的瘟疫來源。在民主政體裡，人們口

14 譯註：PRISM，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全球性監聽計畫。

是心非；主人用奴隸來裝飾自己，而奴隸以為自己是主人。前者，這些以群眾幸福之名來實施權力的人，被不斷地指責為偽善；後者，那些想要擁有「購買能力」、「權利」或「意見」，卻因長年停滯不前，結果變得歇斯底里。因為偽善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美德，它總是會將一些資產階級的無可救藥的東西加在民主身上。在這一點上，民粹的感覺是沒錯的。

無論那是歐巴馬式的民主主義者或者工人議會的狂熱擁護者，無論以什麼方法設想「民有民治政府」，民主的問題所兌換的永遠是治理的問題。這是民主問題的公設，其不證自明之處，即非得有個政府不可。治理是一種實施權力的特別方法。治理，不是將紀律加諸於身體，也不是像舊制度以施刑來使違禁的人遵從一片領地上的法律。國王統治。軍官命令。法官裁決。治理是另一回事。治理是領導人民的、多重性的行為，像牧羊人看管羊群一樣來優化被治理者的潛力和引導他們的自由。這是管理以及模式化他們的欲望，他們行動以及思考的方式，他們的習慣，他們的恐懼，他們的情緒和環境。它發展一系列的策略，如言語、警察、物質，以細微的注意力對民粹情緒以及它們神祕的共振；從對情感以及政治形勢持續的敏感開始，它

都在施力以防止暴動和叛亂。它在環境上著力，不斷地修改變數，在個體上努力影響其他人的行為，以掌握對羊群的控制。它像是在人類存在的所有平面上發動著一個沒有名字也沒有形狀的戰爭。一個有影響力的、微妙的、心理的、非直接的戰爭。

從十七世紀的西方到現在一直都在展開的，不是國家的權力，而是經由民族國家的建立（現在則是通過民族國家的消失）作為特別權力形式的政府。如果今天我們可以不畏懼地讓古老民族國家已生鏽的超級結構崩塌，那是因為它們需要讓位給這個著名的「治理」，它溫柔、可塑、非正式的、道家的，它作用在所有的領域中，無論是自我、關係、城市、企業的管理。我們這些革命主義者無法抵抗一直戰敗的感覺，因為這些決戰都是發生在我們沒法接近的平台，因為我們圍繞在一早就失敗的方位來集結力量，因為這些襲擊都朝向我們沒法還擊的地方。主要是因為我們還將力量歸類為國家、法律、紀律、主權，就好像治理從沒有進步過。我們還在找固態的權力，但它已進化為液態的，甚至氣態了。因為找不到原因，我們還懷疑一切還具有明確形式的事物——習慣、忠誠、根性、掌握或者邏輯，但是權力

卻在所有形式消失之中產生。

選舉不是什麼特別民主的事：國王一開始就是選出來的，很少有專制君主會因為用全民表決而感到不快。如果選舉是民主的話，不是因為它們容許人民投入治理，而是要得到讚同，讓他們以為自己有參與選擇。馬克思寫道：「民主是所有國家形式的真理」。他錯了。民主是所有治理形式的真理。治理者以及被治理者的同一性，也即是羊群成為牧羊人，而牧羊人在羊群中分解，自由和服從合一，人民與主權統一。當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互相吸收，是純粹狀態的治理，不再有任何形式或局限。這是為何今天人們理論化液態民主。因為所有固定形式都是實行純粹治理的障礙物。在普遍的液化過程裡，沒有擋塊，只有漸近線上的軸承。越液化，就越能管理；越能管理，就越民主。單一的大都市民主，比已婚夫婦更民主，而已婚夫婦比家族社群民主，家族社群比黑幫民主。

那些以為法律是民主最終的成果，而不是一種正在調節中的過渡形式的人會很失望。這些形式是民主要消滅的敵對的障礙，以及經濟持續改組的絆腳石。從七十年的意大利到歐巴馬的「骯髒戰爭」，反恐主義對於我們美好

的民主原則，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違規，也不是一個例外，而是一個當代民主持續的建構性行為。美國持有的「恐怖主義者」名單有六十八萬個名字，養有一支兩萬五千人的軍隊，所謂的美軍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在地表上祕密殺害任何人。那些無人駕駛飛機不需要確認撕碎的人的身分，關塔那摩(Guantanamo)違反訴訟程序的囚禁由違反訴訟程序的殺戮取代。那些蒙著眼的人就是不明白民主地治理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還停留在之前的階段，那時現代的國家還操著法律的語言。

巴西有一些年青人因為想組織一場反全球化的示威，而以反恐罪名被拘捕。在意大利，有四名同志因為參與的運動被指涉及襲擊高鐵(TAV)的一處工地，焚毀一座壓氣機，嚴重影響國家「形象」，也以恐怖主義罪名被監禁。例子還多著，但事實是普遍的：所有反抗政府陰謀的人都被當「恐怖主義者」處理。自由主義者可能擔心政府正在損害民主的正統性。這完全不是一回事：至少如果政府有搞清楚以及處理好局勢，而如果成功的話，它將由此重新建立民主。因為當本·阿里或穆巴拉克(Mubarak)指責那些上街的人為恐怖主義者，而又行不通時，重建的行動將轉過頭來對付他們；

他們的失敗遮住了腳下合法性的土地；他們重新發現自己在虛空上奔跑，每個人都在看；他們的垮台已近。行動只在失敗時才顯示出是什麼。

15 譯註：二〇二二至二〇二三年的埃及總統。

4.

在阿根廷，口號「Que se vayan todos！」（全給我滾！）震撼了全世界的元首們。這個渴望廢黜在位權力的口號在過去幾年不知由多少數種語言喊出來。更令人吃驚的是，在不少例子裡，我們做到了。

但是無論在這些「革命」之後的政權有多脆弱，口號的第二部分「*que no quede ni uno!*」（一個也不留！）仍十分沒力：新的懸絲傀儡佔了空位。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埃及。解放廣場推倒了穆巴拉克，而「反叛運動」（Tamarod）取下了穆爾西（Morsi）¹⁵。當街上的人民每次想要廢黜權力，但自己無力組織時，那些已有組織的力量如穆士林兄弟，或者是軍隊，立刻篡奪了這個機會然後從中謀利。一個有要求的運動總是處於行動中的力量的下風。人們驚嘆於主權和恐怖分子的角色實際上是可以互相交換的，也迅速從權力的核心被送往地牢，反之亦然。

昨日的武裝分子常控訴：「革命被出賣。我們的死不是為了讓一個臨時政府組織選舉，然後由一個制憲大會準備新憲法，宣告新的選舉方式。它所產生出來的政體跟之前的沒有兩樣。我們希望改變生活，但要麼沒有，要麼極少。」那些激進分子在這點上總有他們的解釋。人們想要自治而不是要選出代表。如果革命被系統性地出賣，那可能是宿命，也意味著在我們對革命的理解裡有一些隱藏著的短處，它們引致這個宿命。其中的一個問題在於，我們還以為革命是制憲以及法定之間的辯證關係。我們仍然相信這樣的寓言：法定的力量植根於制憲權，國家來自民族好像君主來自神一樣，在現行的憲法背後永遠會有另一個憲法，一個同時潛在而又超越的秩序，它通常是無聲的，可能如閃電般出現。我們想要相信只要「人民」團結，在議會前面大叫「你們不代表我們」，通過這簡單的顯聖活動，制憲權便可以神奇地趕走法定權。這個關於制憲權的虛構片段，事實上，只遮掩了政變作為所有權力來源的政治性以及偶然性。那些奪得權力的人從此控制了權威的來源，並將其重新投射在社會整體上，以此為名合法地消滅了反抗的聲音。所以他們常有以人民之名射殺人民的壯舉。制憲權的光鮮外表背後是權力骯髒

的來源，它的面紗起著催眠的作用，令人相信法定權有著更多的東西。

那些像安東尼·內格里等提倡「治理革命」的人，從郊區的暴動到阿拉伯世界的起義，看到的只是「制憲的鬥爭」。一個馬德里的內格里主義者，基於「廣場運動」的「制憲程序」的假設，居然呼籲創造「民主政黨」，「百分之九十九的政黨」，以「組織一個新的民主憲法，像15 M一樣『平民』」，一樣不強調代表性，一樣後意識形態。「這種迷失促使我們反思革命作為純粹的權力廢黜。

制度化或建構一個權力，就是提供一個底子，一個基礎，一種合法性。也就是說，將一個經濟、司法或警務單位的脆弱的存在固定在一個超越它的平面上，在一個遙不可及的超越上。經由這個過程，一直只是局部的、有限的、部分的東西，上昇到某個高度然後可以假裝包括一切；因為是法定的，權力成為了沒有例外的秩序，沒有非議的存在，與其對立的只能屈從或滅絕。因為制憲的以及法定的兩者之間的辯證賦予偶然的政治形式某種高超的意義：這也是為何共和國成為人類本性的某種不可非議的而永恆的普遍旗幟，或者哈里法成為共同體唯一的領袖。制憲權是這個妖術的名字，它

將國家變成這樣的東西：它不會有錯，建基於理性；沒有敵人，因為對立的都是罪犯；它無所不能，沒有榮譽。

要廢黜權力，若只在街上戰勝它、拆走它的機件、焚燒它的標誌是不夠的。要廢黜權力便是要剝奪它的基礎。那便是起義要做的。法定的權力在其無數笨拙或有效，粗糙或精緻的操作中出現。「皇帝沒有穿衣服」，人們說，因為制憲權的面紗是碎布的，每個人都看得穿。廢黜權力，是剝奪它的合法性，認識它的隨機性，揭露它偶然性的一面。這要展示它只是處境性的，它施展策略、程序、詭計都只是為了要製造形勢，好像平凡人一樣需要掙扎以及施計求存。這要迫使政府下降到起義者的平面：起義者不再是「妖怪」、「罪犯」或者「恐怖主義者」，而僅是敵人；同時警察只是一群流氓，司法只是一個黑幫組織。在起義期間，在位的權力只是如其他力量一樣同處於鬥爭中，而不是一個在背後指導、安排、譴責其它力量的力量。所有下流胚子都有地址。廢黜權力是將它扯到地面。

無論街頭的對峙結果如何，起義已粉碎了人們容許政府行使權力的信任。這是為何那些趕著要鎮壓起義的人，不浪費時間在修補過期的合法性

已破碎的根基。相反地，他們企圖在運動本身當中注入一種新的合法性的意願，它基於理性，同時建立了各種對立的力量並存的策略性平面。「人民的」、「受壓迫者的」，或者「百份之九十九的」合法性，是特洛伊木馬，讓制憲的力量偷偷潛進起義的權力廢黜裡頭。這是一個平息起義最有效的方——它根本不需要在街頭上征服它。要使權力廢黜沒有回頭的可能，我們需要從拋棄我們自己的合法性開始。我們需要放棄以某種東西之名發動革命，放棄有一種必然正義的以及純潔的東西，而革命的力量需要為這種東西作代表。我們把權力扯到地面不是要將自己抬到天上。

在這個時代要廢黜權力的特定形式首先需要的是，挑戰人們必須被治理這個假設，無論那是民主還是被其他人以等級治理。這個假設可上溯到古希臘時期，它的力量是如此巨大，連查巴達(Chaparistes)自己也在他們的「善治委員會」內部組了「自治公社」。這種人類學的理解，我們也可以在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身上找到，他們憧憬熱情以及需求的充分滿足，同時也有一些看起來更悲觀的想法，也就是他們視人為貪吃的動物，只有某種制約的權力可以防止它吞下同伴。對於馬基雅弗利(Machiavel)來說，

人類是「忘因負義的、易變的、虛假的以及愛欺騙的、膽怯以及貪婪的」，這跟美國民主的奠基人的信念一樣：如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所說的：「當我們建立一個政府，首先要明白所有人都是無賴。」在所有的例子裡，人們認為政治秩序的任務是去容納一種人類的獸性，「我」面對他者如面對世界，這些游離的身體需要以一種人工的介入將它們團結起來。如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這種以文化來容納人性的想法是西方的幻覺。它只是我們西方人自身的悲哀，而不是所有地球人的。「對於大部分的人，我們所熟悉的利己主義，就這個字眼的規範性意義上來說，並不是自然的：它被視為一種瘋癲或者著魔，需要排斥，處死，至少是一種必須接受治療的病症。貪婪不是一種前社交的人類特徵，而是人性的缺陷。」

要廢黜政府，僅批判這種人類學以及它所預設的「現實主義」是不足的。我們要從外部來理解它，同時肯定另一種思考的可能。因為我們名副其實的活動在另一個平面上。根據相對於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試圖建立的事物的外部，我們相信：治理的問題只是來自一種空虛，一種它必須常常製造的空虛。權力需要跟世界分離，必須圍繞個體或者在個體身上創造一種空

虛，在生命體之間創造一個荒蕪的空間，以使人們能夠自問如何安置這些毫無聯繫的、分散的個體，如何將被分散的作為分散重新團結。權力創造空虛。空虛呼喚權力。

從治理的範式中走出來，是走進一種持相反假設的政治裡。沒有空虛，周圍都有存在物，我們每個人都是通道和連接，包括情感、派系、歷史、意義以及超越我們的物質流。世界不圍繞著我們，而是貫穿我們。我們所棲息的也棲息在我們身上。圍繞我們的東西構成了我們。我們並不屬於自己。我們總是已經散布在我們之間相連的事物裡。問題不是要構成這種空虛，以便我們能夠重新獲得從我們身上溜走的東西，而是學習更好地在生活存在的事物，這意味著要去感受它們，相反那些滿口民主的斜視兒童卻一點也看不到。感受一個不是物件的世界，而是力量；不是主體，而是權力；不是身體，而是連結。

因為充實，這些生活形式可以廢黜權力。

這裡，減法是肯定，而肯定則是一種攻擊。



1. 權力棲身在底層結構上
2. 組織與自我組織的差異
3. 論堵塞
4. 論調查

- 1.

二〇一一年的學生運動開始，突尼西亞的卡沙巴(Kashaba)、雅典的憲法廣場、倫敦的西敏寺中心的占領，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馬德里，或者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巴塞隆納的議會圍攻，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嘗試攻入葡萄牙共和國議院，二〇一四年二月焚燒巴斯尼亞總統府：各個制度權力場所如磁石般吸引著革命主義者。但當起義者到達議會、總統府或者其他樞紐機關，如在烏克蘭、利比亞，或者在威斯康辛，發現那只是空白的場所，沒有權力，只有毫無品味的裝修。當權者努力地捍衛它免受入侵，並不是要預防「人民」奪取權力，而是為了阻止他們明白權力再也不在機關裡。那裡只有荒蕪的廟宇，用途已改變的碉堡，簡單的裝飾——但有著革命

主義者的誘餌。那些想要藉由入侵來瞭解後台發生什麼事的人無疑要失望了。甚至是那些狂熱的陰謀論者，就算他們能進入，也不會發現什麼祕密；真相是，權力並不再僅只是我們在現代性底下習以為常的那種戲劇性的真實。

權力實際的地方化(localisation)這個真相對此卻沒有隱藏；只是我們因為怕被它擾亂了讓我們感到舒適無比的確信，而拒絕看到這點。如果要證明這件事，我們只需要看看歐盟發布的鈔票。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新古典經濟學家曾承認這個鈔票，但這在考古學上是成立的：貨幣不是一個經濟工具，而是一個根本屬於政治的現實。我們從沒看過不倚靠政治秩序做為保障的貨幣。這也是為何，不同國家的貨幣總流於傳統地印有國王、偉人、國父的頭像，或者國家的象徵。歐元上有什麼？不是人像，也不是個人主權的徽章，而是橋樑、引渠、廊拱、缺乏人味的空心建築。說到權力當前本質的真相，每個歐洲人錢包裡都有個樣本。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權力棲身在這個世界的基礎建設裡。當代的權力本質上是建築性的以及非人化的，而不是代表性和個人化的。傳統的權力本質上是代表性的：教宗是基督在地上

的代表，國王是神的代表，總統是人民的代表，黨的總書記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人格化的政治已死，這也是為何那些在地球上倖存的演說家娛樂多於治理。人格化的政治需要小丑以及天才的結合；例如意大利可憐的格里羅 (Beppe Grillo)¹⁶ 以及法國險險的狄爾多厄 (Dieudonné)¹⁷。總的來說，他們至少知道如何逗我們開心。同時，指責政治家「不代表我們」只是一種懷舊，以及打開大門引狼入室。政治家不是做這個的，他們是用來引開我們的注意，因為權力在別處。在所有當代的陰謀論主義中，這個合理的直覺變得瘋狂。權力在別處，它不在機構裡，但也沒有特別隱藏。或者它是隱藏著，就像是艾倫·坡 (Alan Poe) 的「失竊的信」。沒有人看到它，因為每個人都不停地看著它——高壓線、公路、外環道、超級市場，或者電腦程式。如果說它是隱藏著的，那便是如下水道網絡，像火車一樣跑著的海底光纖，或者像森林一樣大的數據中心。權力，是這個世界的組織，這個工程性的、被程式化的、被設計的世界。這就是祕密，根本就沒有祕密。

權力滲透在生活裡，它以技術以及貿易來組織。它看起來就好像谷歌的技術以及空白的首頁一樣中立。誰決定空間的配置，誰治理環境以及氣氛，

16 譯註：意大利喜劇演員，左派政治組織五星運動的領導人。

17 譯註：脫口秀演員，被指責有反猶傾向。

誰管理行政，誰管理存取將治理人們。權力在今天是用來繼承的，一方面繼

承古老的警察科學，包括看守「保障市民的福祉與安全」，另一方面繼承軍事的物流科學，用「指揮軍隊的藝術」來保障通訊網絡的持續性以及策略的流動性。因為沉浸在我們對於公共事物、政治的語言概念裡，我們還在繼續辯論著，但決定都已經在我們眼底下執行了。今天的法律不是用字寫的，而是用鋼鐵寫的。所有市民的憤怒只是用自己愚鈍的前額去撞這個世界武裝著的混凝土。反對意大利高鐵(TAV)的抗爭最大的成就在於能夠清楚瞭解政治在一個小工地上如何把玩。與此相對稱的是，這是所有政治家都不承認的。如這個貝爾薩尼(Bersani)¹⁸有一天反駁NOTAV：「總之，這只是火車線而已，不是轟炸。」但根據赫伯特·利奧泰元帥(Hubert Lyautey)(他沒有要「平息」殖民地的對手)的估計，「一個工地值一個軍隊」。如果在全世界，從羅馬尼亞到巴西，有越來越多反抗工程項目的運動，那是因為這個直覺正在形成。

想要著手反抗當下世界的人必須先明白：權力的真正結構，是這個世界物質的、技術的、物理的組織。治理不再是在政府裡。在比利時持續了一年

18 譯註：意大利民主黨總書記。

多的「權力真空」無疑是最好的例子：國家可以沒有政府，沒有選出來的代表，沒有國會，沒有政治辯論，沒有選舉輸贏，但它的運作絲毫無損。同樣的，意大利從「技術治理」到「技術治理」講了很多年，這個口號來自一九一八年孕育首批法西斯主義者的未來主義者政黨的宣言，卻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權力，就是秩序，警察的責任就是捍衛它。要想像一種存在於基礎建設中，存在於使其運作、控制以及建立它們的媒介中的權力，是不容易的。問題是，如何去質疑一種逐步在建立，不經語言的權力。一種深入日常生活事物中的秩序，它的政治結構便是物質結構。這種秩序並不出現在總統致辭裡，而是在運轉良好的沉默中。當權力還是由法令、法律以及規定來定義的時候，人們可以批評它。但我們不會批評一堵牆，我們要麼推倒它，要麼在上面圖畫。一個以器具以及佈置來支配生命的治理，它的語言形式是兩旁滿是電線杆以及懸掛著攝影鏡頭的街道，同時這相對地只會喚來無聲的破壞。破壞日常生活的框架如褻瀆聖罪：因為侵犯了憲章。在城市的暴亂中，不分黑白地破壞一方面意味著人們對現狀的醒覺，另一方面也是一種

無力的表現。一個公共汽車候車亭所維持著的無聲的、不容置疑的秩序，當被打碎時不幸地並沒有隱藏著什麼。所有關於「環境」聖潔的、偽善的宣傳裡，所有像十字軍一樣對它的捍衛裡，只是顯示這樣的一個新的訊息：權力本身正成為環境性的，它融化在布景中。在所有的官方「保護環境」的呼籲中，要捍衛的是權力，而不是那些小魚。

2.

日常生活並不是一直都被組織的。它需要首先由城市開始摧毀生活。他們根據「社會需求」將生活和城市分解為功能。辦公室區、工廠區、住宅區、休閒區、讓人們分散精神的娛樂區，飲食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挑逗的地方，以及將這些連在一起的汽車以及巴士，都是嘗試塑造一種生活，同時將其他所有的生活形式粉碎。一班管理者，一群經理經過百多年的時間，很有方法地實現它。他們將人分割成不同的需求，然後重新綜合。這種綜合叫「社會主義規畫」或是叫「市場」都不重要；這將會是失敗的新城市，或是成功的時尚區也都不重要。結果是一樣的：存在的荒蕪和不景氣。當生

命被分解成不同器官的時候，生命形式已蕩然無存。因此，相反地我們感受到太陽門，在解放廣場，在蓋齊，或者其它運動的場所，例如占領蘭德斯聖母鎮，雖然南特(Nantes)的森林滿是泥漿，卻洋溢著一種快樂。快樂附隨著整個共同體。突然，生活不再被切成一塊塊。睡覺、打架、進食、互相照顧、派對、策謀、辯論，體現了一種有生命力的運動。所有這些都不是被組織的，而是自我組織。差別是巨大的。前者叫管理，後者叫尊重——完全不能相容。

盧爾·茲別奇(Raul Zibechi)，一名烏拉圭的行動者，在談及艾馬拉人二〇〇〇年初在波利維亞的暴動時，寫道：「在這些運動裡，組織跟日常生活沒有脫鉤，是日常生活自身在起義行動中展開。」他觀察到，二〇〇二年在奧爾托(Ei Alto)的社區裡，「一種共同體的風氣取代了以前工會的風氣。」這解釋了跟基礎建設權力的鬥爭是什麼一回事。當我們說基礎建設，其實等同說生命跟它的條件脫離，說有人將條件加諸於我們的生活。生活依賴我們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從而失去了重心。有賴這些管理者，基礎建設組織了這樣的生活，它沒有自己的世界、可以隨時被中止、被犧牲。大都市

的虛無主義只是否認它的一種虛張聲勢。相反，這解釋了全世界各個地區、村落的實驗尋找的是什麼，以及無法避免的危險。這不是回到土地，而是回到地面。起義的破壞力，以及可持續破壞敵人基礎建設的力量，恰恰是他們在共同體的生活中自我組織的能力。占領華爾街初期的一個反射動作是堵塞布魯克林大橋，或者奧克蘭的公社在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動總罷工來癱瘓港口，這些都見證著自我組織以及堵塞的關係。然而在這些占領中所出現的自我組織的脆弱性，並不容許這些計畫可以進一步擴展。相反的，解放廣場以及塔克辛廣場是開羅以及伊斯坦堡交通的樞紐。堵塞這些流動，則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占領意味著堵塞。那是能夠使維持大都市正常狀態的治理脫白的力量來源。在另一個全然不同的層次上，我們很難不將兩者連在一起，也就是說查巴達解放軍現在提倡結合在一起的二十九次還擊，包括針對礦場、道路、供電中心、影響所有墨西哥不同原住民的水壩工程，以及他們的在過去十年以各種方法自我裝備以實現有別於聯邦以及經濟權力的自治。

3.

二〇〇六年在法國反CPE¹⁹的一張海報寫道「世界的運作有賴於物流。堵塞所有東西！」這個關鍵詞，當時是由一個小眾運動的小眾群體提出，它不但「獲勝」而且有不錯的命運。在二〇〇九年，反「極端剝削」(pwofrasyon)的運動癱瘓了整個瓜德羅普島(Guadeloupe)²⁰，則大量運用這個策略的顯著性。之後二〇一〇年在法國反退休改革，我們看到堵塞變成了抗爭基本的手法，無論是在油庫、購物中心、火車站，還是生產場地。這顯示出世界的一種當前狀態。

在法國反退休金改革期間，堵塞煉油廠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政治事件。煉油廠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是所謂的「加工工業」先鋒。我們可以說煉油廠的功能從那時起是大部分工廠重組的模型。然而我們不能再叫它們工廠，而是場地，生產場地。工廠和場地的分別在於，工廠是工人、實踐知識、原料、庫存的集中地；場地只是各種生產流交集的樞紐。它們的唯一共通點是：出來跟進入之間都有一個轉化過程。煉油廠商是工作和生產關係顛倒的地方。工人，或者操作者的工作並不在於保養以及維修，因為這些工作都由中

20 19
譯註：首次雇傭契約。

譯註：運動口號為「Yannaj kont pwofrasyon」，「團結對抗各種極端的剝削」。

介代理負責；工人的責任只是對完全自動化的生產過程保持警覺：有一個不該亮的指示燈亮了；一個管道發出不正常的聲音；煙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了，或者本來就不應該有煙會冒出來。煉油廠的工人好像是機器的保安，一個全神貫注的懶人。但這個傾向已出現在西方其他的工業裡。在過往工人被歌頌為生產者：今天工作以及生產的關係被徹底顛倒了。只有當生產停止時才會有工作，因為發生故障必須檢驗。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免了：商品的價值化，用泵提取的過程，跟流通過程重迭，而後者又跟生產過程重迭，生產過程受控於市場即時的最後變動。說商品的價值是工人工時的晶體化，是一個有效的以及騙人的政治操作。在煉油廠以及所有完全自動化的工廠，這已變成一種傷人的諷刺。讓我們給中國十年的時間，十年的工人罷工以及追討，結果都將一樣。不應該忽略的是，煉油廠的工人長期以來都是行業裡面薪水較高的，至少在法國，是這個行業最先實驗被委婉地稱為「社會關係的液化」，特別是工會的關係。

在反退休金改革期間，不只是他們的員工，還有教授、學生、司機、鐵路員、郵遞員、失業人士、中學生，法國大部分的油庫都被堵塞。並不

是說工人沒有權利這樣做，而是說在這樣的一個世界，生產組織已去中心化、流通、大幅自動化，每個機器都不再只是一個大機器系統裡的一個小環節，而這個機器以及由機器生產其它機器的系統——世界，根據控制論自我組合，每個特定的「流」都是整個資本社會再生產的結果。我們不再有勞動力或者社會關係的「再生產的領域」（這與「生產領域」不同）。後者已不再只是一個領域，而是世界以及所有關係的網狀結構。物理上攻擊這些流，無論在哪一點上，都是政治性地攻擊系統的全部。如果罷工的主體是工人階級，堵塞的主體便是任何人。無論是誰，無論是誰決定堵塞都是參與反對世界當前的組織模式。

通常當文明到達某個最大複雜性時會自動崩潰。每個生產鏈延伸到如此專門化以及需要如此多中介人的地步，只要其中有一個消失，整個生產鏈都會被癱瘓，甚至被摧毀。三年前，日本豐田的工廠面臨了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最長的技術停工，因為其中一個特殊的集成電路的供應商在二〇一一年三月的地震後消失，而沒有其他人可以代為生產。有見於這個不論規模的堵塞狂熱，我們必須重新閱讀我們與時間的關係。我們看未來就好像華特·

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歷史的天使」看過去。「一系列的事件呈現在我們眼前，但他只看到一個以及唯一的災難，不斷累積著廢墟沉澱在他的腳下。」我們不再感知時間，只能將時間感知為走向可怕結局的緩慢進程。將臨的每十年可理解為一步步地走向氣候混亂，每個人都知道這是調皮的「全球暖化」的真相。每天，重金屬仍繼續累積在食物鏈上，像幅射核素，以及其他致命但隱形的污染物一樣。我們必須看到每個堵塞全球系統的嘗試，每個運動，每個暴動，每次造反，都如企圖停止時間的垂直的力量，讓它改道走向致命性稍低的方向。

4.

所有革命前景的消逝，並不能由抗爭的薄弱予以說明；而是缺乏可信的革命遠景解釋了抗爭的薄弱。我們沉迷於革命的政治理念，忽視了技術層面。革命的前景不再是關於社會的制度性重組，而是世界的技術結構。如此，它是此刻勾勒出的線，不是在未來浮動的影像。如果我們想要重新擁有願景，我們必須將世界無法持續下去這個評定，跟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的

欲望結合在一起。因為如果這個世界持續下去，人們首先需要依靠物質，以及一個社會機器的良好運作來生存。我們需要擁有組織這個世界的深厚技術知識；它容許我們將主導的結構拿走，容許我們可以保留必要的時間在物質以及政治的層面上組織脫離災難，而同時不受貧困以及生存的緊急性所煩擾。說得簡單點：當我們不知如何停止以及破壞核電廠，而又有一些人想永遠存留核電廠當作一門生意，那麼渴望粉碎國家的念頭只會引人訕笑；當群眾造反只會帶來福利、食物、能量的貧乏，那麼一場關鍵的群眾運動將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細心地調查研究，我們需要跟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中擁有策略性技術知識的人交談。只有如此運動才可以真的「堵塞一切」。只有如此，才能釋放出對另一種對生活的實驗熱情，一種對技術的熱情來改變對於科技的全面依靠。這個知識累積，以及融洽各個行業的過程，是要從大眾層面認真地回到革命問題的條件。

馬里奧·特隆迪(Mario Tronti)²¹寫道：「征服工人運動的不會是資本主義，而是民主。」它另一個被征服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成功地吸納工人力量。工人特別的地方不在於跟任何其他受薪者一樣被老闆剝削，而是他對整

21 譯註：早期意大利工人主義 (operaismo) 運動代表人物。

體的生產技術的掌握。他們擁有科學而又大眾化的技能，正是這種充滿熱情的知識構成了工人世界的富有，之後資本覺察到這個潛伏的危險，而決定將工人變成操作者、監察者以及機器維修者。儘管如此，工人的力量仍在那裡：知道系統怎樣運作的人同樣也可以摧毀這個系統。不過，沒有人可以單獨掌握現時系統再生產的所有技術，只有集體的力量才能做到。如今，欲發展革命力量就是要連接所有世界與革命性必要的技術，集合所有的技術智慧，構成一股歷史力量，而不是治理系統。

二〇一〇年秋天，法國反退休金改革失敗給我們上了一課：如果法國勞工總會（CGT）操控了整個鬥爭，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理解這個計畫。本來運動的重心只要堵塞煉油廠這個霸權的行業便足夠。然後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自行決定遊戲喊停，重新打開煉油廠的閘門，鬆緩國家的壓力。這個運動缺乏的僅僅是對這個世界物質運作最低的知識，這些知識都散布在工人手中，集中在幾個工程師的光頭裡，當然另一方面也在一些陰暗的軍事機關裡。如果人們懂得如何破壞警察催淚彈的供應源，或者如何中斷一天的電視宣傳，控制電力管理，可以肯定運動不會結束得這樣可悲。我們要明白

這個運動主要的政治失敗在於，將決定誰可以有燃料而誰不能的策略性特權，以省級徵用的方式放手給了國家。

一位美國大學教授恰當地指出：「如果今天你想要擺脫某人，那你必須瞄準他的基礎建設。」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空軍不停地發展「基礎建設戰」主意，視最普通的民用設施為最佳目標來使敵人屈膝。這解釋為什麼這個世界策略性的基礎建設變得越來越機密。對革命力量來說，如果不懂得如何在必要的時刻令對手的基礎建設為了自己的利益運作，僅知道要堵塞沒有什麼意思。知道怎樣破壞科技系統意味著要實驗以及建立同時取代它的技術。回到地面，首先便是在生活中不要再無視我們存在的條件。



第四章

Fuck off Google

當我們在應對災難時都聯想到一些相同的字眼：連結、網絡、自我組織，當臉書檔案比本人更可信，表示新的通訊技術已被大量應用，某種思考及治理的方式正逐漸取得主導。而且，這種新的治理科學都是由同一批工程師和科學家建立起來的。

1. 沒有「臉書革命」，只有新的治理科學，控制論
2. 向 smarts 宣戰！
3. 控制論的貧困
4. 技術反對科技

1.

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沒有很多人知道，但值得一提，推特(Twitter)的前身是一個名為TXTMob的程式，是在二〇〇四年反對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抗議期間，由一些美國社運者發明，利用手提電話來自我組織的工具。約五千多名示威者用這個程式來即時分享行動決定以及警察移動的資訊。兩年後推出的推特也有相似功能，例如在摩爾多瓦(Moldavie)，二〇〇九年伊朗的社會運動中，推特成了組織起義者——特別針對獨裁者——的必需工具而流行起來。二〇一一年英國出現暴亂時，一些記者僅根據邏輯便虛構說，這場暴亂靠推特從運動中心托特罕區擴散出去。事實上，這些暴亂者選中的溝通工具是銀行和跨國公司高層使用的黑莓手機和加密電話，而英國情報

機關並沒有破解的工具，因為一班駭客入侵了黑莓的網站，阻止黑莓和警方合作。如果推特這次真的幫到自我組織，那也只見於由市民自我組織的清道夫們，他們清掃以及修理因為對峙和掠奪造成的破壞。這場暴動透過 CrisisCommons 接替及協調。CrisisCommons 是「一個讓志願者可發展和使用來對付災難，以及加強應對危機衝擊的網絡工具」，當時有一群法國的左派將之與太陽門的「憤怒者」組織對比。這個組合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組織的目的方面是要加速重建秩序，另一方面是要讓幾千人在面對警察不停的騷擾下依然可以占領以及生活。這裡我們見到的是兩個即時的、連接的、市民的行動。這些西班牙的「憤怒者」當中不可忽視的一群自從 15 M 開始便堅信著連接的公民烏托邦。對於他們來說，這些資訊的社交網絡不僅加速了二〇一一年運動，而且為新類型的政治組織（抗爭及社會）建立了根基：一個連接的、投入的、透明的民主。有些「革命者」因為這和杰瑞德·科恩 (Jared Cohen) 有同樣想法感到不快。科恩是美國政府的反恐顧問，在二〇〇九年的伊朗「革命」推特面對審查時，他聯繫以及要求推特仍維持運作。科恩最近跟谷歌總裁艾立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合寫了一本冷冰冰

的政治書《新數碼時代》(The New Digital Age)，第一頁就讓我們看到令人對於新通訊技術政治功效感到困惑的句子：「網際網路意味著歷史上最豐富的無政府經驗。」

「在的黎波里(Tripoli)、托特罕或者華爾街，人們抗議現時的政治的失敗，以及選舉系統所給承諾的貧乏的可能性……他們對於政府以及其他權力中心化的機構失去了信心……將民主系統僅限制為投票不再具有說服力。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普通人可以參與維基百科；在線上或者現實裡組織示威，好像埃及和突尼西亞的革命，或者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挖掘由維基解密(WikiLeaks)洩露出來的外交機密。讓我們一起遠距工作的技術也給了我們更多自我組織的希望」。這段話不是出自一個「憤怒者」口中，就算是，那麼他／她長期扎營的地方必然是白宮辦公室。她就是貝絲·諾維克(Beth Novick)，領導著歐巴馬政府的「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計畫。該計畫視政府的功能為連結市民，以及將擱置在官僚機器內的資訊公開。所以紐約市長說：「以為政府知道什麼對你們最好的這種由上而下結構已經過時。這個世紀的新模式是基於共同創造以及合作。」

一點也不意外，「開放政府數據」的概念不是由政府而是由資訊工程師（特別是自由軟體的狂熱捍衛者）來解釋，他們引用美國國父們的目標「每個市民都有參與政府運作的份」。政府在這裡被簡化為組織者或者促進者的角色，最終則是「市民行動協調的平台」。這預設了政府跟社交網絡是平行的。紐約市長問：「城市如何可以被理解為和臉書和推特的應用程式接口（API）生態系統一樣？」這必須容許我們生產一種治理經驗，它更集中在使用者身上，因為問題不只是消費，而是公共服務以及民主的共同生產」。就算我們將這些來自矽谷、有點頭腦過熱的論述當成胡言亂語，這起碼也顯示政府運作越來越偏離國家主權。在網路時代，治理意味著確保人、物以及機器的互相連結，以使資訊自由流通，也即是說生產透明、可控制的資訊。雖然大部分的國家機器還在想方設法控制，有些活動已在外部完成。臉書遠不是治理的新模式，它在現實中早已扮演了這個角色。革命主義者使用臉書來集結群眾的事實只證明了我們可以在某些地方利用臉書對抗臉書，對抗它的警察任務。

今天資訊工程師被引進總統府以及全世界各大城市的政府，不是閒坐

而是宣告新的遊戲規則：現在行政機關要跟可以提供同樣服務的供應者競爭，但不幸的是這些供應者比它快幾步。《新數碼時代》建議用雲端服務來確保政府的服務不受革命影響，以及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來取得地籍管理服務，它評論：「在將來，人們不只儲存數據，他們儲存政府。」如果我們還不知道現在誰是老闊的話，它總結：「政府會垮臺，戰爭會摧毀基礎建設，但虛擬的機構會倖存。」谷歌在其看似「清白」的界面以及罕見的高效率搜尋器底下隱藏的是一個政治計畫。一個企業派遣團隊到每個城市的每條街上繪製地球，這不會只是單純的商業活動。人們只會繪畫自己想占有的。

「Don't be evil」²² 任你幹吧。

在覆蓋祖科蒂公園的帳篷下，以及在紐約市高空的辦公室裡，當應對災難時，所有人都想到同一些字眼：連結、網絡、自我組織。認識到這一點是很令人不安的，這意味著新的通訊技術在同一時間被應用，它們不只是在地球上編織自己的布景，而且也編織著我們生活的世界的質地，某種思考以及治理的方式正在取得主導。或者，這種新的治理科學的根基都是由同一批開發這些技術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建立。歷史如下：數學家諾伯

22 編註：谷歌企業的格言。

特·維納(Nobert Wiener)在完成美國軍方的工作後，在一九四〇年代建立了一門新的科學以及對人類的新定義，包括他跟世界及自身的關係。貝爾實驗室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程師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關於取樣和資訊測量的研究在通訊技術的發展也有很重要影響，而他也加入這個行列。意料之外的，同樣加入的有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在二戰期間於東南亞為美國情報組織工作，也是高雅的LSD²³愛好者，以及位於帕羅奧圖(Palo Alto)惠普實驗室的創始人。另外還有粗獷的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公認的資訊科學奠基文獻《EDVAC報告書第一份草案》(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編輯，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發明者(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有決定性影響)，也是反蘇聯的防核彈襲擊計畫的參與者，他在計算日本投放核彈最佳位置之後，毫不疲累地參與美國軍方以及當時還很年輕的CIA多項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人不僅對於發展新通訊技術以及資訊處理的貢獻都不可忽略，更同時建立了維納所謂的「控制論」的「科學」根基。一個世紀前，安培將這個詞定義為「治理的科學」，所以這是治理的藝術，雖然它

23 譯註：一種中樞神經迷幻劑。

的來源已差不多被遺忘，但是這些概念根深蒂固，如同人們在地面上鋪的通訊管道一樣散開了，灌溉著計算機科學、生物學、人工智能、管理或者認知科學。

自從二〇〇八年起，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突然、出乎意料的「經濟危機」，我們只見到政治經濟作為治理藝術已經破產。經濟不曾是一個現實或者一個科學；它只是在十七世紀時作為治理人口的藝術而誕生。如果要避免暴動，必須避免饑荒以及生產財富來增強君主的力量——這也是「糧食」問題的重要性。漢米爾頓(Hamilton)說：「治理最安全的途徑便是跟從人們的利益。」治理的意思是，只要確立經濟的「自然」法律，讓它和諧的機制自我運作，通過操縱利益來推動人民。和諧、操行的可預見性、明亮的未來、參與者的理性，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某種信心以及「信用」。然而正是根據永久危機的管理徹底粉碎了這些古舊的治理實踐基礎。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大型「信心危機」，而是信心的盡頭，政府已經不需要它了。通過收集以及計算分析人們的資料，以控制和透明作為主導原則，它即時預見了主體的行爲，它不再需要人們的信心，也不需要令人們有信心：有必要的只是足

夠的監視。如列寧所說的「信心，是不錯；控制，更好。」

西方對於自身以及自身的知識、語言、理性、自由主義、主體、世界的信心危機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危機圍繞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在各範疇展開，控制論就在這個現代性的傷口上發展起來，被用來作為西方存在以及治理危機的救藥。維納預測：「我們都是在注定死亡的星球上遇難的人……在沉沒中，人類規則和價值沒有完全消失，我們需要從中抽取最好的部分。我們將被吞沒，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能視之為配得上我們的偉大。」控制論的治理的性質是末日論的。它的終點是要通過資訊不受拘束、透明以及可控制性的流通，在局部防止世界自發產生的熵的(entropique)²⁴、無序的運動，以及保持秩序、隱定性，以及——誰知道呢？——系統永恆的自我調節。維納相信「通訊是社會的基石，文明的永恆或者墮落，都視乎那些保持通訊自由的人。」如所有的過渡時期，從以前的經濟治理性到控制論經過一個不穩定的階段，打開了一個治理可能被擊敗的歷史天窗。

24 譯註：在物理學上，熵值越高，系統越趨無序。

2.

在一九八〇年代，特瑞·溫諾格拉德(Terry Winograd)，谷歌的創辦者之一賴利·佩吉(Larry Page)的導師，以及費爾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前經濟部長，論及資訊的概念時寫道，它是「本體的秩序。它介入我們文化傳承的背景，將我們推出生活的慣常之外，深遠地影響我們存在的方式……它是必然的反身性以及政治性的。」我們也可以這樣描述控制論。正式來說，我們還是處於古舊的西方二元論的範式治理之下：主體與世界，個體與社會，人與機器，靈魂和身體，有生氣的和無活力的；這些都是常識還認同的差異。事實上，控制論化的資本主義基於一種本體論，以及一種人類學操作，並為它們保留革新的可能。西方的理性主體，明瞭自己的利益，渴望要操控可治理的世界，讓位給控制論的概念：沒有內在的存在，失去自己的自己，沒有自我的自我，突發而且多變，由它的外在以及各種關係所構成的存在。一個武裝著蘋果iWatch的生物，由外部環境，由它的每個行為所產生出來的數據，來明白自己。一個想要控制、測量以及絕望地最優化它的行為、情感的「量

化自我」(Quantified Self)。最先進的控制論的觀念裡，已不再有人，不再有環境，而只有一個系統存在，它是資訊化的複雜系統以及自我組織程序的中樞的一部分；人們用印度佛教的思想來解釋這個存在比用笛卡兒的更有效。維納在一九四八年進一步指出：「對於人類，生存等於投入一個世界性的通訊系統。」

如政治經濟在工業國家內生產了可管理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控制論也同樣為自己生產了一種人性。一種被穿過它的流所掏空，被資訊電子化，被數目不斷增加的裝置釘在世界裡的透明人性。一種無法與由他和他的行為所構成的科技環境分開的人性。這便是當今治理的目的：不是人，也不是利益，而是它的「社會環境」。這個環境的模型是智慧型城市(*smart city*)。智慧型是因為它靠感應器生產了其即時處理可以容許自我管理的資訊。智慧型因為它生產，同時也被智慧型的居民所生產。政治經濟根據讓人們自由地追求利益來管理，控制論則是靠讓他們自由溝通來控制。一名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最近這樣總結：「我們必須在可控制框架內重新發明社會系統。」

最令人吃驚以及最現實的未來都市不是IBM派發給市政府的宣傳冊裡所銷售的對水、電、道路流動的控制。而是它的出發點正是要「抗拒」這種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描述的城市，而要與居民(至少是那些常連線的)一起合作創造的「智慧型城市」。另一名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亞旅行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欣喜地見到它的首府正逐漸變成一個「Fabcity」²⁵：「坐在巴塞隆納的中心，我見到一個新的城市的出現，人們可以自由使用各種工具，城市變得完全自主。」市民不再只是屬下階層(subalterns)而是smart people；如其中某人說他們是「想法、服務、解決方法的接收者以及生產者」。在這個想像裡，都市並不是因為一個中央政府的決定以及行動而變得smart，而是當它的居民們「找到新的方法生產、連接以及賦予意義給他們自己的數據」，一個「自發的秩序」會出現。因此一個有彈性、抗衝擊的都市由此產生，足以抵抗任何災難。

在未來主義者關於人和物件連接的承諾背後，當汽車、冰箱、手錶、吸塵器以及假陽具都直接彼此連接並與網際網路連接，我們見到最多功能的感應器——我自己——正在運作中。「我」分享我的地理位置、我的幽默、

25 編註：Fabcity來自於自造者運動(Makers' Movement)，Fab指Fabrication和Fabulous。

我的意見、我當天的有趣的無趣的見聞。我跑完步就立刻分享了我的路線、時間、表現以及自動評估。我將我度假的照片、夜生活的照片、暴動的的照片、同事的照片、我要吃的還有我要操的照片都當成表演。我好像什麼都沒有做，但又生產了不少數據。無論我工作與否，我的日常生活就好像資訊庫存一樣還等著增值。我不斷地改善算式。

一名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充滿熱情地說：「謝謝這些散布在各處的感覺器網路，我們能擁有跟神一樣的視覺。這是我們首次可以精細描繪出人們日常生活裡的行為。」這些巨大的資料庫正是政府的食品儲藏室。通過翻查在這些由彼此相連的人類日常生活以及持續更新的資料庫，它尋找一些相關性 (correlation)。這些相關性不是要回答普遍定律的問題，也不是「為什麼的問題」，而是「何時」、「什麼」、一些特定時空的預測，以及預言。控制論所宣稱的目標是要管理不可預測的，治理不可治理的，而不是要摧毀它們。控制論式的治理不再是好像政治經濟的時代根據預測來行動，而是直接地作用在潛在性、在可能性的結構上。洛杉磯的警察在幾年前裝備了一個新的軟體叫「prepol」。它根據大量統計資料來計算每個地區、每條街可能會出

現罪案的概率。這個軟體以即時更新的概率來安排警察在城市裡的巡邏。一名控制論的先驅於一九四八年在《世界報》寫道：「我們可以夢想有一天治理機器將會——沒人知道是好是壞——彌補今天領導人以及日常的政治機關的明顯不足。」每個時代都有夢想，哪怕前者的夢想成為後者日常的噩夢。

個人資料的搜集的目的並不是要貼身跟蹤每個人。滲透進個體與他人的親密關係，是要以大量的數據來做統計，更甚於為每個人量身訂做一個檔案。更經濟的做法是根據大量個人檔案裡的共同特徵，以及概然性的發生來做相關性統計。他們對現下的以及完整的個體沒有興趣，感興趣的只是那些容許他們決定潛在的逃逸路線的東西。他們有興趣監視個人檔案、「活動」以及虛擬性，是因為統計數據不會造反；而人們只要不是被鎖定，都可以假裝沒有受到監控。當控制論式治理已根據新邏輯運作，它的主體卻繼續以舊的範式來思考。我們仍相信「個人」資料屬於我們，就好像汽車、鞋子一樣，我們讓谷歌、臉書、蘋果電腦、亞馬遜(Amazon)網路書店或者警察存取我們的資訊只是實踐「個人自由」，而看不到相對於那些拒絕這些的人

因此被視為可疑分子或不正常的人。《新數碼時代》預測：「我們認為在將來，還會有一些人抗拒使用新科技、拒絕擁有虛擬個人檔案、數位電話，或者跟線上數據系統有任何接觸。」對他們來說，政府大可懷疑完全不用這些東西的人，肯定隱瞞著某些東西，以及有可能犯法。如反恐的標準一樣，政府會為這些「隱藏的人」建立檔案。如果你在任何社交網站上沒有任何檔案或者沒有行動電話服務、網路上很難找到你的資料，你很有可能被建立一個檔案。一系列的措施可能會立刻加諸在你身上，包括在機場對你仔細搜查，或者甚至不能前往某些地區。」

3.

安全系統認為臉書個人檔案比藏在後面的個人更可信，這足以表示我們仍稱之為「虛擬」和「真實」之間的孔隙度。世界的加速數據化有效地將以往那種對立的思考方式——連線的世界與物理的世界，數位空間和真實——變得無力。山景城(Mountain View)²⁶的人說：「看看Android、谷歌電郵、地圖、搜尋引擎，都是我們做的。沒有這些產品，人們沒法生活。」好幾年

26 編註：位於美國加州的一座城市，是矽谷的主要一區，總部設於此城的公司包括谷歌、Mozilla等。

來，無處不在的互聯物件，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某種倖存的反射動作。有些酒吧的侍者驅逐了使用谷歌眼鏡的人——但不能不提這些人都很潮。他們發起了定時離線活動（每週一天，一個週末，一個月）以測試對技術物件的依賴程度，以及重新擁有一種「真實」的體驗。這當然注定失敗，關了智慧型手機和家庭在海邊共度週末首先只是一個離線的體驗；也就是說，他們仍等著重新連線和分享到網絡上的那一刻。

然而，長遠來看，當西方人與世界的抽象關係被表達在各種電子玩意中，在虛擬的再生產宇宙中，通往在場（presence）的道路被吊詭地重新打通。如我們和所有一切分離，我們也將與我們的分離。大規模的科技灌輸最後將使我們擁有對一朵沒有像素的金銀花赤裸的存在感動的能力。我們需要各種螢幕介入我們以及世界之間，這些螢幕讓我們藉由對比重新感受這個感性世界裡無法比擬的光澤，和驚嘆眼前的事物。我們需要上百個跟我們不相關的「朋友」在臉書上按讚，讓日後可以嘲笑自己、來重新回味友誼。因為沒法製造出和人類相等的電腦，人們決定削弱人類的體驗，直到生活的吸引力等同於其數位模擬。想像一下，想將社交網絡上的存在變得吸引人，

必須先製造出什麼樣的人類荒漠？同樣的，旅行者必須讓位給觀光客，但觀光客其實只要付錢就可以在家中環遊世界，而一丁點的真實經歷便會使這種虛幻的把戲破滅。最後是控制論的可悲擊敗了自己。對於超個人化的一代（社群網站便是他們基本的社會性），二〇一二年魁北克學生的罷課讓他們強烈地感受到，單單一起集會遊行就具有反抗力量。如果不是反抗的友誼衝擊了警察的徽章，他們將不會互相邂逅。這些捕鼠器不能拿他們怎麼辦，他們變成了一種共同體驗的方法。如佐治奧·斯沙哈努（Giorgio Cesarano）在他的《生存手冊》（*Manuel de survie*）中預測的一樣「自我的結束便是在場的開始。」

駭客的優勢在於，他們認識到了這個被稱為虛擬的宇宙的物質性，如 Telecomix²⁷ 的一名成員所說的，如果駭客比他的時代走得更遠，是因為他「不覺得這個新工具（網際網路）是個虛擬的世界，而是物理現實的延伸。」更明顯的是，現在駭客運動已經走出螢幕到「駭客空間」，人們在那裡可以剖析、改動、修理軟體和硬體。DIY 的延伸以及網路化席捲了多個領域，包括改造物件、街道、城市、社會，甚至生命。其中一些病態的進步

27 以協助敘利亞人繞過國家對網路通訊的控制而著名的組織。

人士熱情地推動一種基於「分享」的新經濟、新文明。只是當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已脫離過往的工業枷鎖將「創造」價值化。經理們鼓吹促進原創的自由化，推動創新計畫、創意、天才，甚至是離經叛道的人——他們說：「未來的企業必須保護離經叛道的人，因為他們有創意以及有能力在不可知中創造出理性。」今天的價值不在於商品的新功能，也不在於它令人渴望或者有意義，而是它給予消費者的體驗。那為什麼不索性將創造的過程——終極的體驗——也給消費者呢？在這方面，駭客空間以及FabLab成為人們可以實現這些「消費者—創新者」的「項目」，以及讓「新市場」出現的空間。舊金山的Techshop公司「想要發展一種新健身俱樂部，人們只要「每週都出現來維持、創造以及發展項目」就可以換取一年合約。

美國軍方在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的「Cyber Fast Track」計畫內贊助類似地方的這個事實並沒有令駭客空間被指責，被指責的其實是它們被吸納進自造者(Maker)運動，這些人們可以一起建造、修理、修改工業物件基本用途的空間，變相投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無數次重組。那些用來建立村莊的工具，如「開源生態學」的五十多部可調節機器——拖拉機、

沖床、混凝土攪拌機等——以及DIY的住宅組件，本來可以有其他的用途，而不是好像為了創辦人夢想建立一個「有現代舒適的小文明」，或者創造「整體經濟」、一個「財經系統」，或者一個「新的治理」，像是其當前精神領袖所夢想的一樣。在大廈天台或者工業廢地的城市農業——例如在底特律的一千二百座社區花園，本來可以有其他目的，而不只是參與復甦經濟或者「恢復廢置區」。匿名者／LulzSec²⁸對警察、銀行社會、多國情報組織或者電訊機構發起的襲擊本來也可以被更佳利用。如一個烏克蘭的黑客所說的「當你必須關心生命的時候，就快點停印3D物件，我們必須生出另一個計畫。」

4.

這裡我們碰上了著名的「技術問題的追問」²⁹，今天革命運動的盲點。一個不用記住名字的人論法國悲劇時寫道：「一個由擁戴技術的精英統治著、對技術恐懼的國家」，如果這一點跟整個國家不符的話，起碼對於某些激進的圈子來說是正確的。大部分的馬克思主義者、後馬克思主義者在霸

28

編註：Lulz Security的簡稱，是一〇一一年成立的駭客團體，曾經成功襲擊美國中情局和參議院。

29

譯註：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在一九五三年發表的文章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權這個隔代遺傳的傾向上，還加上了技術解放人類這個想法；而大部分的無政府主義者或者後無政府主義者舒適地將就於當自己是小眾或者受壓迫的小眾的位置，對「技術」持普遍的敵對的態度。我們可以帶點誇張地描畫這個傾向：相應於擁抱機械化有機體(Cyborg)以及由連結在一起的諸眾發起電子革命的內格里主義者，一些「反工業主義者將對發展以及「技術文明災難」的批判變成為一種有收益的文藝類別，一種小眾的意識形態，足以用來取暖，但想像不到任何革命的可能性。技術愛好者以及技術恐懼者基於一個不真實的說法而變成邪惡的一對：存在著一種東西叫技術，他們以為可以分開什麼是技術的以及不是技術的，事實上不是這樣子，只要看一看剛出生什麼都不會的嬰兒，到他們學會走路和說話，我們就能察覺他跟世界的關係並不是天生賦予的，而是不斷演變的過程。人與世界的關係並不是自然而然的東西，而必然是人工性的，也就是希臘人所說的技術(techné)。每個人類世界都是技術的集合，這包括烹調的、建築的、音樂的、精神的、資訊的、農業的、色情的、戰爭的技術等等。這也解釋為什麼人類沒有基因性的本質：有的只是不同的技術，每種技術構成一個世界，物質化某種與世

界的關係，某種生命的形式。我們沒有「建構」一種生命形式，我們只是把技術跟我們攪合在一起，例如運動或者學習。這也是為何我們很少會覺得我們的世界是「技術的」：因為這些構成它的人工物件已成了我們的一部分，只有我們不認識的東西讓我們覺得是奇怪的人工產品。所以我們所經歷的世界的技術性質只會在兩種情況下被明顯察覺：發明以及「壞掉」。只有當我們有新發現，或者當一個很熟悉的部分突然找不到、壞掉或者不能運作，生活在自然世界的幻覺才會在相反的證據面前破滅。

我們不能只當技術是人類可以使用它而不受它影響的工具。每個工具都構成並具體表現了某種與世界的特定關係，而這些如此打造出來的各個世界彼此並不相同，也不比充塞其中的人類彼此之間更相似。而且，不單是這些世界之間彼此不同，它們之間也沒有等級秩序。不會有一個工具比另外一個「高級」。因為它們都是不同的；它們有不同的成長過程以及歷史。要將世界階級化需要引進一種準則，一種容許將不同技術分類的不明顯的準則。對於發展或進步，每個準則都只是技術可量化的生產力，跟每種技術所帶的倫理，以及它所產生的感性世界沒有關係。這解釋為什麼只有資本主義

的進步，為什麼資本主義是對世界的不斷破壞。同樣不像馬克思所想的，因為技術生產世界以及生命形式，所以人類的本質就是生產。技術愛好者以及技術恐懼者沒見到的是：每種技術的倫理性質。

我們必須附加一句：這個時代的噩夢不是「技術的時代」而是「科技的時代」。科技不是技術的完善，而是人類對不同技術的徵用。科技是將最有效的技術系統化，進而是世界以及每個人與世界的關係的整平。科技是對不斷地自我實現的技術的論述。同樣地，慶祝的意識形態是真正慶祝的死亡，邂逅的意識形態是邂逅的不可能，科技是所有技術的中和。在這個意義來說，資本主義本質上是科技性的；它將最具生產力的技術有效地組織到一個系統裡。它的主要角色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工程師。工程師是專業人士，是技術的主要徵用者，他不受任何技術影響，同時將他自己世界的貧乏散布到各處。工程師是個悲哀以及奴隸性的角色。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便在工程師的文化裡團結。工程師們設計了大部分新古典經濟模式，和當前所用的股票貿易軟體。不要忘了勃列日涅夫(Brejnev)的光榮名號是因為他曾是烏克蘭冶金業的工程師。

駭客的形象在每一點上都與工程師對立，雖然同時各種行業，如藝術、警察、企業也企圖將其中立。工程師尋求使所有技術能更順利運作，並且為系統服務，駭客通過追問「怎樣運作？」來找到缺點，同時也發明其他用途以及實驗。實驗意味著：領會每種技術倫理上所包含的東西。駭客們從技術系統中將技術搶過來以釋放它們。如果我們是技術的奴隸，這恰好是因為我們特別管那些在我們日常生活裡的人工產品叫「技術」，而我們從來沒有想到它們只是黑盒子，而我們是無知的使用者。使用電腦來攻擊 C I A 足以說明控制論並不是計算機科學，就好像天文學不是望遠鏡的科學一樣。明白我們身邊的任何器材怎樣運作立刻增強了我們的力量，讓我們掌握它們不再只是環境，而是一個具某種裝備而我們又可以改造的世界。這就是駭客的世界觀。

近幾年，駭客的圈子走過了一條政治化的道路，敵我開始分明。然而在它成為革命性的過程中有著不少顯著的障礙。在一九八六年，克羅斯博士 (Doctor Crash) 寫道：「無論你知道與否，如果你是個駭客，那你就是一個革命主義者。不要慌，你站在對的一邊。」我們不肯定這種黑白分明是否還

如實。在駭客的圈子有一種根本性的幻覺，它將「資訊自由」、「網路自由」或者「個人自由」跟想控制它們的力量對立。這是個嚴重的誤會。自由以及監視、自由與環形監獄，都來自同一個治理的範式。從歷史上來說，控制的無限延伸是經由個體自由所實現的權力形式的結果。自由主義治理並不是直接施加在主體身上，或者等待著類似子女對父母般的服從。它是躲在後面的力量。相對於直接施加在身體，它更傾向於設置空間、支配利益。這是一個以最低程度進行警戒、監視以及作用的力量，只有當框架受威脅或者主體脫離控制時它才會出動。它只治理自由主體，並且以群眾的形式來治理。個人自由不是我們可以用來要脅政府的東西，因為它只是政府運作的機制而已，它以最微妙的方式進行以便將所有自由集合起來，以達到預期的群眾效果。秩序來自無序 (*Ordo ab chaos*)。政府便是這樣的秩序，人們服從它「好像人們因為餓要吃東西，因為冷要穿衣服一樣」，就連我在追求幸福，實踐「言論自由」時，我也在一起生產這種奴隸性。一名新自由主義的奠基人說：「市場的自由需要一種活躍而且特別警覺性的政治。」對於個體來說，沒有監視便沒有自由。這是幼稚的自由主義者永遠不會明白的；因為這種無

知，不少駭客都受自由主義者的愚昧引誘。對於一個真實自由的存在，我們不會說它是自由的。它是，只是因為它存在，遵從自然的發展。但我們會說成長在一個完全受控制、被圍起來、文明化的環境裡的動物是自由的（在人類規定的公園裡，例如野生動物園，它們可以自由走動）。英語的 friend（朋友）和 free（自由），德文的 Freund 和 frei，來自同一個印歐語系的字根，意為一種增長中的共同力量。自由和連結是同一個東西。我是自由的因為我有所連結，因為我存在於一個比我自身更廣闊的現實。在古羅馬市民的兒童是 liberi：經由他們，羅馬在成長。也就是說「我做我想做的」個人自由是一種諷刺，一種欺騙。如果真的要真的對抗政府，那駭客就要放棄這種盲目的崇拜。提倡個體自由是要防止人們建立更強的群體，發展出超於一系列攻擊的真正策略；也是要使他們不能與其他一切連結在一起，無法成為一股歷史力量。一名 Teleconix 的成員提醒其他同伴「有一點肯定的是，你生活的地區都是由一些你想遇到的人在捍衛。他們都在改變世界，不會等你。」

另一個對於駭客運動的挑戰，如每次混沌計算機俱樂部（Chaos Computer Club）週年大會所發生的，就是在內部劃一條線來分開誰站在政府

那邊以獲得更好治理，以及誰想要廢黜權力。是時候要選擇站哪一邊了。這是阿桑奇(Julian Assange)迴避的基本問題，他說：「我們，這些做高科技的，是一個階級，現在是時候要承認了。」法國最近不知所謂地開了一個大學要培養「有倫理的駭客」，由國內安全總局(DCRI)監督，以教育一些人出來與真正的駭客——那些沒有拒絕駭客倫理的人——對抗。

這兩個問題出現在一個令我們感動的事件：匿名者/LulzSec的駭客發動了許多令人鼓舞的攻擊之後，最終他們被捕時，跟傑洛米·哈蒙德(Jeremy Hammond)一樣獨自受壓迫。2011年聖誕節那天，LulzSec攻陷了一家跨國情報公司Stratfor的網站，在首頁貼上了《革命將至》的英文翻譯，並且在其客戶的帳戶中轉了七十萬美元給慈善機構作聖誕禮物。在他們被捕前或者之後我們都不能做些什麼。當攻擊類似目標時，當然單獨或小組行動比較安全(雖然並不表示能避免警方滲透)，但這一次卻是災難性的，因為這些攻擊是如此政治性，跟我們黨的全球性行動如此接近，但最後卻被警察定義為私人罪案，可能被送進監獄裡坐個幾十年，或者被迫成為政府的告密者。



Disparaissons

第五章

讓我們消失吧！

激進主義者開始與自己的論述和實踐、目標與自我隔離脫節，他們並不是在建立真正的革命力量，而只是在維持良好的自我感覺。這種讓他們僵化的恐懼，讓他們害怕不夠激進就跟不上潮流。但這種姿態不足以創造策略——一個姿態是否具革命性，在於它所產生的影響。真正締造革命者才是革命主義者。

1. 奇怪的失敗

2. 和平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令人受不了的一對

3. 治理作為反起義

4. 本體的不對稱和快樂

1.

經歷過二〇〇八年雅典的運動，就會明白「起義」這個詞在西方的大會意味著什麼。銀行遍地都是碎片，警察局被包圍，整個城市在起義者手中。在高級購物區，人們甚至放棄修補被打爛的玻璃窗，以前他們每天早上都會做。沒有任何警察秩序下的「正常狀態」可以在火與石的浪潮中絲毫無損，起火者、投石者無所不在，而代言者則不存在——人們將火一直起，到憲法廣場(Synagma)的聖誕樹。到了某一刻，維持秩序的力量已消失，因為沒有足夠的催淚彈。很難說到底是誰佔了街道。人們說是「六百歐元的一代」、「中學生」、「無政府主義者」、「激進主義者」、阿爾巴尼亞移民「流氓」，他們都在胡扯。而媒體則一如既往地責怪「穿套頭運動衣的人」

(koukoulophoroï)。無政府主義者早已被這場沒有臉孔的激情浪潮淘汰。他們以前所壟斷的野性的蒙面行動，充滿激情的標誌，甚至是莫洛托夫雞尾酒的特利也已毫不客氣地被搶走。這個他們不敢夢想的暴動就在眼前，但發起的並不是他們。一個不知名的東西，一個 *éregone*³⁰ 已誕生，只有當所有存在物都化為灰燼，它才會平復下來。時間在燃燒，我們以被偷走的未來作為代價粉碎了現在。

之後幾年的希臘教會了我們在一個西方國家，「反起義」這個詞意味著什麼。當浪潮過去，一些在運動期間成立的群體，從城市到小村莊，試著延續十二月份的運動所打開的缺口。有些人搶掠超級市場的收銀機、拍攝燒著戰利品的影片；有些人因為朋友在國外被警察滋擾而襲擊該國領事館。而有些人決心，效法七〇年代的意大利，發動更高層次的襲擊，以炸彈或者武器瞄準了雅典的股市、警察、國家部長或者微軟的總部。如在七〇年代一樣，左派頒布了新的「反恐怖主義者」法令。圍剿、逮捕、起訴暴增。我們的運動一度被簡化為反「鎮壓」。歐盟、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和希臘的社會主義者政府取得同意，要希臘為這場不可饒恕的暴亂付出賠償。我

30 譯註：集體的精神力量。

們永遠不該低估富人對窮人不遜的憎恨。他們決定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措施使整個國家屈膝。這些措施將逐漸展開，其暴力程度並不低於暴亂。

在工會的呼籲下，十幾個針對這些措施的總罷工出現。工人占領了政府總部，市民占領了各區的政府辦事處，大學的一些學系以及被「犧牲」的醫院決定自我組織，然後便有了「廣場運動」。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我們五十萬人走遍了雅典中心。人們多次試圖燒掉國會。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人們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總罷工來反對大型的緊縮計畫。這個星期天，整個希臘，退休者、無政府主義者、工務員、工人以及流浪者都上街遊行，幾近暴亂。雅典市中心又再次起火，這一晚達到了狂喜和疲憊的極點：運動察覺到它的力量，但也不知道應該怎樣運用。過去幾年來，儘管有成千上百次的直接行動，多次的占領，上百萬的希臘人上街，但是在「危機」的當頭棒打下，暴動的醉意已消失。熱量仍潛伏在灰燼中；運動找到了其他的形式，例如合作社、社會中心、「直接（不經中間人的）交易網絡」，甚至是自治的工廠和健康中心；它變得越來越有「建設性」。這只意味著，我們失敗了，我們黨在過去幾十年裡最具攻擊性的行動因為債務、監獄以及破產而被擊

破。那些捐贈的二手衣服不會使希臘人忘記這些反起義的措施曾讓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權力可以搖擺不定，有時給人它即將消失的印象；它可以挪移對壘的陣地，出奇不意地制勝。人們以這個理由來敲詐希臘人：「要政府還是要混亂」；他們既有政府又有混亂。而獎利品是貧困。

相對於其他地區，希臘擁有最強的無政府主義者運動，也有被治理著的停滯不前的人民。希臘是已破產的國家，也是我們起義失敗的研究案例。包圍警察、砸爛銀行以及暫時性地使政府垮台，還不是廢黜權力。希臘教我們：如果不知道什麼是勝利，我們只會被征服。僅有起義的決心是不足夠的；我們有太多的困惑。而研究失敗讓我們起碼能消除一些困惑。

2.

西方四十多年來成功的反起義給我們留下了兩個變生的缺陷：和平主義以及激進主義。它們同樣有害，並組成了冷酷的搭配。和平主義欺人以及自欺，將公共討論以及大會吹捧成理想的政治模式。也因為這個，廣場運動沒有辦法演變成為其他的東西，只能成為無法超越的起點。要掌握政治是什

麼，除了經由希臘之外我們沒有其他選擇，但這次是古希臘。說到底，政治，是古希臘人發明的。和平主義者討厭去記得，古希臘人是為了延續戰爭而發明了政治。城邦大會源自戰士聚會。發言的平等來自面對死亡的平等。雅典的民主是一個重甲兵的民主。人們是市民（但不包括婦女和奴隸）因為他們也是士兵。在一個像希臘一樣爭鬥激烈的文化裡，辯論就好像士兵對峙的情景，上場的是市民，語言是戰場，遊說是武器。希臘文的「Agon」意思是「集會」也是「比賽」。一個完整的希臘市民是以武器以及辯論取得勝利的人。

古希臘人視集會的民主以及有組織的殺戮戰爭為同一姿態，兩者互相肯定。人們只記得古希臘人發明了前者，是因為忽略了它與隊列式戰爭的關係——這種形式的戰爭以單純和簡單的紀律，以及個人對全體的絕對服從，取代了技巧、英勇、功勳、個人的力量 and 天份。當波斯人見到這個戰術如此有效，但同時將步兵的生命視為無物，他們大有理由判斷它為野蠻，後來許多西方軍隊想要粉碎的敵人都作如是想。那些站在隊列前排，在親友眼前被兇狠屠殺的雅典農民，也是在古希臘的城邦立法會議裡活躍的市民

的另一副面孔。鋪滿古戰場的屍體毫無生氣的手臂，是那些在立法會議踴躍舉起的手臂的必要條件。希臘的戰爭模式在西方的想像中根深蒂固，人們幾乎忘了當重裝步兵將勝利判給其中的一方時，重點是誰在這個決定性的衝擊中殺了最多人，而不是誰讓步避免傷亡。中國發明了兵法來減少傷亡，來避免對抗，以「不戰而屈人之兵」——雖然當取勝之後會消滅全體敵人。「戰爭」武裝對抗「殺戮」這個方程式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根本上是西方二千五百年來對戰爭的畸形定義。無論那叫「不規則戰爭」、「心理戰爭」、「小戰爭」或者「遊擊」都是在他處的戰爭標準，只是這個畸形概念的某種面相而已。

誠懇的和平主義者，不單是在合理化自己的懦弱，同時也在他想要鬥爭的現象上犯了兩次愚蠢的錯誤。戰爭非但不是武裝性的對抗或者殺戮，而且也是他口中吹捧的大會政治的模式。老子說：「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兩次世界性的糾紛，以及一個全球性的反恐戰爭，教曉了我們如何以和平之名掀起最血腥的滅絕殺戮。戰爭的號角事實上只是幼稚地或者無力地去拒絕承認他的存在。戰爭不是殺戮，而是支配各種力量

接觸的邏輯。它無處不在，以無數種形式存在，而最常見的形式是和平。如果世界是多樣性的，如果生命形式有無法簡化的差異性，那麼戰爭是它們在地球上共同棲息的律法。沒有什麼能預言它們相遇的結果：對立的事物並不存在於分隔的世界裡。如果我們不是被賦予確定身分的個體（如角色的社會治理所需要的），而是各種力量互相角力的場所，其中相繼的發展只是暫時性的平衡，那麼我們必須認識戰爭便在我們身上——如雷內·杜馬勒（René Daumal）所說的神聖戰爭。和平與其說是可能，不如說是可欲的對象。糾紛是存在的內涵，餘下的是去學習掌握它的方法，那是生活在這些處境下的藝術，了解存在的細膩以及多變性，而不是意圖摧毀異己。

和平主義要麼是一種徹底的虛偽，要麼是一種完全錯誤的信仰。想想就連我們的免疫系統也會區分朋友和敵人，要不然我們會因罹癌或其他自身免疫的疾病而死。再說，我們也真的會因罹癌或者其他自身免疫的疾病而死。策略性地拒絕對抗只是戰爭的計謀，例如，我們明白為何墨西哥瓦哈卡州的公社立刻自稱和平主義。這並不是因為反對戰爭，而是拒絕在與墨西哥政府及其打手的武裝對抗中被擊敗。如開羅的一些同志解釋「不要將

我們唱『非暴力』時所採用的策略跟『非暴力』時所採用的策略的崇拜混淆在一起。」我們要捏造多少歷史來表彰宣揚和平主義的前人！例如已去世的可憐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人們將他的文章《對公民政府的不服從》(*La désobéissance au gouvernement civil*)剪裁成《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讓他變成一個宣揚公民反抗的理論家。梭羅在《為約翰·布朗上校請願》(*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中明確寫道：「當火槍跟左輪在知道如何使用它們的人手中時，是可以為可貴的原因而被使用的。和驅逐聖殿中的不受歡迎者同樣的憤怒會重演。問題不在於知道什麼是武器，而是知道用它們來做什麼。」但在虛偽的系譜中最可笑的，肯定是將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非洲國民大會黨(ANC)武裝組織的發起者變成了世界性的和平標誌。他自己說：「我說消極反抗的時期要結束了，非暴力是沒用的策略，它永遠都不可能戰勝一小撮不惜任何代價要維持權力的白人。我說暴力是唯一可以終止南非種族隔離的武器，我們必須準備好在不久的將來啟用它。群眾都瘋狂了，特別是年輕人都在拍手尖叫。他們如我剛才所說，都準備好了。在這個時候，我唱起了一首關於自由的歌，其中的歌詞

是這樣的：『我們的敵人在這裡，拿起武器，攻擊他們。』我唱著，人群都跟著，最後我指著警察說：『瞧！我們的敵人就在這裡。』」

幾十年來群眾的綏靖政策以及恐懼的擴散使和平主義變成了公民自發的政治意識。在每個運動裡頭，我們都要跟這個令人憂傷的事實糾纏。二〇一一年，我們在加泰隆尼亞廣場看見和平主義者將穿著黑衣的暴動者送到警察手中；同樣在二〇〇一年，熱那亞(Genova)一些「黑色組織」³¹被和平主義者毆打。革命圈子裡分泌出一種抗體作為回應，塑造出一種激進的形象——無論什麼都站在公民的對立面。前者站在道德高地提出廢除暴力，後者則純意識形態地為其提出辯護。面對世界的現狀，和平主義者以不做壞事繼續做好人來寬恕自己，激進主義者則用不妥協的「立場書」包裝輕度不合法性的活動來寬恕自己。兩者都嚮往純粹的東西，後者通過暴力行動，前者則是與之劃清界限。兩者是彼此的惡夢。我們不肯定如果有一方不存在，另一方是否還能繼續下去。就好像激進主義者的存在只是要讓和平主義者顫抖，反之亦然。所以上世紀七〇年代美國市民鬥爭的聖經書名是阿林斯基(Saul Alinski)所寫的《反叛手冊》(*Rules for Radicals*)不是偶然的。因為對世

31

譯註：Black bloc，穿黑色帽衫的行動者。

界的否認，激進主義者以及和平主義者走在一起。他們因為對所有處境都置身事外而從中得到快感。他們超然處之，覺得自己有某種不知從何而來的優越感。他們喜歡生活在外星球——這仍然是大都市生活和他們優越的群落生境暫時容許的舒適。

七〇年代的潰敗開始，激進性的道德問題已不知不覺地取代了革命的策略問題，也就是說，過去的幾十年，革命和其他東西都經歷了同一個下場：被私有化。它變成了對個人的評價，而當中激進性是評核的標準。人們不再根據運動的處境以及它所打開和關閉的可能性來評價「革命性」，而只是根據形式。在此時，以此方式，根據此原因所進行的破壞只是一種破壞而已。破壞作為蓋上革命印章的實踐，謹慎地在分級中占據了這樣的位置：扔汽油彈高於扔石頭，但低於槍擊穿膝蓋，雖然後者並不值得用炸彈。戲劇性的是，這種行動的形式本身都不是革命性的——改良主義者以及納粹主義者也都在搞破壞。一個運動「暴力」的程度跟革命的決心沒有直接關係，人們不會根據遊行之後被打爛的櫥窗數目來量度「激進性」，就算是，也必須將「激進性」的準則留給那些關心量度政治現象，並將它們重新置於道德架構

的行動。

只要開始經常光顧激進主義者的圈子，都會驚覺他們的論述和實踐、目標與自我隔離之間已經脫節，他們好像注定是一種永恆的自我破壞。人們不需要多久便明白他們並不是要建立一種真正的革命力量，而是維持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激進——無論是關於直接行動、女性主義還是生態學。這種統治著每個人、讓他們僵化的恐懼並不是來自布爾什維克政黨，而是潮流。這種恐懼不是由誰施加在誰身上，而是在人們當中影響著所有人。在這些圈子裡，人們害怕自己不夠激進，好像人們擔心自己趕不上趨勢、不夠酷、跟不上潮流，一不留神便會影響名聲。人們避免追根究底，而只是表面地消費理論、遊行示威以及人際關係。群體之間，以及內心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了週期性的爆發。總有一些新來的、年輕的，同時也被濫用的人補償那些耗盡的、損壞的、噁心的、被掏空的人。離開了這些圈子的人事後感到不可思議，人們怎樣可為如此莫測高深的東西，而屈從於殘害性如此大的壓力？好像一個過度操勞的前任主管回想起成為麵包師傅以前的生活時感受到的昏眩一樣。這些圈子的隔絕是結構性的，他們在自己與世界之間插入激進性

來作為量度準則；他們不再感覺到現象，而只是現象的量度而已。在自我消耗過程裡的某一刻，甚至連誰對於圈子的批判最激進也加入競爭，但這絲毫無損於其結構本身。馬拉泰斯塔（Erico Malatesta）寫道：「我們覺得真正剝奪了我們的自由，讓任何主動性變得不可能的，是使人無力的自我孤立。」然後，有一派無政府主義者自稱「虛無主義者」其實是很有邏輯的：虛無主義，就是不能相信自己相信某種東西（如革命）。再者，並沒有什麼虛無主義者，只有無力主義者。

激進主義者定義自己為激進行動以及論述的生產者，最後打造了一個完全量化的革命概念——好像革命是個別反抗者的行動生產過剩的危機。愛美爾·亨利（Emile Henry）早已寫道：「不要忘記，革命只是所有這些個別行動的結果。」歷史揭穿了這個謊言：無論這是法國革命、俄國革命，還是突尼西亞革命，每次革命都是某個特定的行動——監獄動亂，戰爭失敗，一個流動水果攤的小販自殺——以及當時的整體情況之間所產生的衝擊，而不是所有分隔的反抗行動的總和。在等待「革命」的過程中，這個革命的荒謬定義造成了可預見的損害：人們耗費了氣力在沒有連接到什麼東西的行

動主義上，在一種令人精疲力竭的崇拜上。無論是在遊行、愛情還是在論述，無時不刻都要顧全他們激進的身分認同。這持續一段時間直至耗盡、憂鬱或者壓抑。但我們還是什麼都沒有改變。

如果姿態的累積不足以創造一個策略，是因為並沒有所謂絕對的姿態。

一個姿態是否革命性，不是由它的內容決定，而是由它所產生的一連串影響。孫子說：「故善戰者，求之於勢。」在經過一系列的暴力之後，所有的處境都是各種張力、明顯或隱藏的衝突的混合。假設戰爭已在那裡，策略性地行動意味著對處境開放，從內部理解處境，掌握塑造它的各種力量關係，以及對它產生作用的各個極端。一個行動是否具革命性，首先要看它跟這個世界有沒有接觸。扔石頭並不只是簡單地「扔石頭」，它可以凍結某個處境，或者引發一個 *Intifada*³² 有些人以為引入一些知名的激進實踐或者論述之類的累贅雜物就可以激進化鬥爭，其實只是在描述一種屬於外星球的政治。一場運動要經過長時間才能造成一系列改變，它的狀態以及潛能之間永遠都有一個落差。如果它停止運動，或者無法發展潛能，就會死去。決定性的行動必須走在運動狀態前面，找到一個缺口，與現狀決裂，打開潛能

32

譯註：巴勒斯坦青年為反對以色列自一九八七年的占領而通過扔石頭表現的自發的群眾起義。

的出路。這個姿態可以是占領、砸毀、打擊或者是真心交談，都由運動的狀態來決定。真正締造革命者才是革命主義者。如果這只能在事後才知道的話，對歷史的認識所培養的對處境的感知，非常有助於產生對後者的直覺。

讓我們將對激進性的擔憂留給受壓抑的、給自戀狂以及失敗者。革命主義者真正的問題在於要提昇活躍的參與的力量、照顧未來的革命者，以求最終能締造一種革命性的處境。所有那些喜歡教條式地將「激進」與「公民」、「行動派反抗者」以及被動的人群對立的，只是在為各種前景製造障礙。在這一點上，他們其實在做警察的工作。在這個年代，我們需要視有分寸而不是抽象的激進性為基本的革命美德，而「有分寸」指的是謹慎對待未來的革命者。

我們必須留意在意大利蘇薩河谷(Val de Susse)的鬥爭中出現的奇蹟，成功地將強加在許多激進主義者身上的艱難地打造出來的認同拿走，將他們帶回地面，再次接觸真實的處境，讓他們懂得除下意識形態的防護衣，雖然這難免招來了那些仍待在星際無法呼吸的激進主義者的無窮的怨恨。有肯定賴於這場鬥爭發展出來的特別技巧，他們才不被權力所製造出來的

影像所捕獲——無論這個影像是守法公民的生態主義運動或是武裝的暴力前衛主義。時而參加家庭式的遊行，時而襲擊 T A V 的工地，時而參與破壞，時而跟當地的村長合作，將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天主教徒連結在一起，這已是革命性了，因為它起碼杜絕了這對令人受不了的和平主義以及激進主義。一名史達林主義者、紈袴子弟臨死前說：「政治活動，意味著要行動而不是被行動，要搞政治而不是被政治搞或重塑。要發動鬥爭，一系列的鬥爭，一場戰爭，具目的、短期或長期的前景、策略、戰術的戰爭。」

3.

傅柯說：「內戰是所有權力鬥爭、所有權力戰術的陣列，進一步是所有關於權力以及反抗權力的鬥爭的陣列。」他接著說：「內戰不只是將各種集體的元素放到舞台上，而是內戰構成了這些元素。內戰遠非從共和重新淪為個體、從主權重新淪為自然狀態、從集體的秩序重新淪為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內戰是一些前所未見的新的集體的生成過程。」事實上，在這個認識的平面上，一切的政治存在得以展開。無論是已經失敗的和平主義

者，還是只想要失敗的激進主義者都沒看到這點。他們沒看到戰爭根本就不一定跟軍事有關，沒看生活必然是策略性的。這個時代的諷刺在於那些想確定戰爭的去向，從而去揭露治理計畫操作的人，最後發現自己是反革命的。當我們看到在過去半個世紀，不同的非軍事形式不斷排斥戰爭，而同時軍事的戰爭卻發展出一個非軍事的概念，一個戰爭的公民概念，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隨便在幾個當代的書寫裡找到的相應例子：

集體武裝糾紛的地點從戰場擴張到整個地球。同樣的，在時間上展開到無限，既沒有宣戰也沒有休戰。……當代的戰術強調勝利是要征服人們的心，而不只是他們的疆域。要人們屈服是要得到他們的擁戴，而擁戴來自尊重。關鍵是要進入每個人的內裡，也就是人類集體之間建立的社會關係。被世界化剝光，被全球化撫摸，然後被通訊技術強行進入，此前線便在每個成員的良心裡，它們構成了集體。……這種被動支持者的製造可以被歸納成「前線在每個人心中，而不再有人在前線。」……

在一個沒有戰爭也沒有和平的世界裡，杜絕了以往由軍事或者司法來解決糾紛的方式的世界裡，一切政治——策略的挑戰，在於要防止被動的支持者進行任何行動，進入交戰狀態，成為主動的支持者。

羅倫·達內(Laurent Danet)·《戰爭領域》(La Polémosphère)

在戰爭空間已經由陸海空天電延展至社會、政治、經濟、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諸領域的今天，各種因素的交叉互動，已使軍事領域的優勢很難理所當然的成為每一場戰爭的主導領域。戰爭將在非戰爭領域中展開，這樣的觀點說來很奇怪也很難讓人接受，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趨勢就是如此。……生命領域裡沒有什麼東西不能為戰爭服務，而幾乎所有領域都可以代表戰爭侵犯性的一面。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

可能的戰爭不是發生在不同社會「之間」，而是在社會「裡面」……因為目標是人類社會，是它的治理、它的社會契約、它的機構，而不再是

這個省、這條河或這個邊境，不再要有要征服的或者要保護的界線或土地……唯一需要維持不同介入的力量的前線，是人民……贏得戰爭是控制環境……它不再是要部屬坦克隊伍以及確定潛在的目標，而是理解社會環境，行為以及心理。……需要的是有效地調節力量來影響人們的意願……軍事行動是一種真正的「說話的方式」；所有的主要操作都是通訊的操作，所有的行動，無論多細小，比任何句子都要強烈。……操縱戰爭，首先是要操縱全體行動者的感知，無論近還是遠，直接還是間接。

文森特·德波特(Vincent Desportes), 《可能的戰爭》(La Guerre Probable)

後現代的已開發社會變得極端複雜，而且因而非常脆弱。要防止因為「無法運作」而崩潰，它們迫切需要自行去中心化(拯救來自邊緣而不是機構)……它迫切需要依靠本土的力量(自我防衛的戰術、軍事化的團隊、私人的軍事企業)，首先，從務實的角度來看，這是因為它們熟悉環境以及人口，其次，對於國家來說，那是一個讓不同群體聯合以及強

化的信心標誌，最後以及最重要的是，因為它們更適於為這些棘手的處境找到適當而且原創（而不傳統）的解決方法。換句話說，非常規的戰爭所帶來的反應必須首先是市民以及類軍人，而不是警察和軍隊……如果真主黨（Hezbollah）成為一個首要的國際角色，如果新查巴達運動（neo-zapatiste）代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另類選擇，那麼力量更在於要承認，「本土」可以與「國際」互動，而這個互動完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戰略之一……簡短點來說，對於一個本土—國際互動來說，我們必須有能力以本土的元素—市民，而不再由國家機器（外交、軍事）來回應。

貝爾納·維切特（Bernard Wicht）

《走向傾斜的秩序：信息戰爭時代的反遊擊戰》（*Vers l'ordre oblique: la contre-guerrilla à l'âge de*

l'infoquerre）

看了這些之後，我們對於二〇一一年八月在英國暴亂之後的馬路清潔工—市民民兵以及呼籲告密的角色，或者在希臘的政治遊戲中引進「金色黎

明」³³，法西斯主義者的看法會有點改變。姑且不論最近在墨西哥米卻肯州（Michoacán），聯邦政府武裝了民兵，我們可以將當前發生的歸納為：反起義的軍事學說已成為治理的原則。維基解密流出的一段美國外交電報殘酷地見證了這一點：「平息貧民區的計畫運用了不少美國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反暴動的方法以及策略。」時代最終歸結為這種鬥爭：起義的可能性以及反起義的擁護者之間的速度競爭，這是因為「阿拉伯革命」在西方政治所引起的喋喋不休的長篇大論想要掩飾的，掩飾例如他們可以將整個居住區的電訊完全切斷的事實，如穆巴拉克在暴動起初所做的，這並不是氣急敗壞的獨裁者的任性行為，而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OTAN）的報告《二〇二〇年的城市運作》（*Urban Operations in the Year 2020*）的應用。

沒有全球性的治理，只有地區治理機器的全球性網絡，也就是說一個世界性的、網狀的反起義裝置。斯諾登所揭露的充分見證了這一點：情報組織、跨國集團、政治網絡毫無廉恥地合作，這已超過國家規模，因此沒有什麼人理會。不再有中心以及邊緣，內部安全以及外部運作的分別。他們對於遠方人口所做的，遲早也會用在自己人身上：一八四八年六月屠殺了

33 譯註：希臘極右政黨。

巴黎貧民的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時期也插手「街頭戰爭」的圍捕以及 *enfumades*。³⁴ 意大利阿爾卑斯山的獵人士兵剛從阿富汗回來，就被派遣到蘇薩河谷。在西方，當某個地區出現秩序問題就以武裝部隊解決，這不單不是禁忌，而且是得當的做法。無論從衛生危機到恐怖襲擊，這種想法已一早就有條理地就緒。在所有地區，他們都在訓練都市戰鬥、「平息」、「衝突之後的穩定」，他們已準備好對付下次的起義。

我們必須理解反起義的教條作為對付我們的戰爭理論，它編織了我們在這個年代的共同處境。我們必須將它理解為戰爭概念的一個質性的跳躍，要不然我們將沒法為自己定位，而只會看到錯亂的影像。如果反革命戰爭的教條是要對付相應的革命教條，我們不能負面地從反起義的理論中得出任何起義的理論，這是邏輯陷阱。發動「小戰爭」、搔癢式的突襲，或者偷去對手的目標是不足夠的，甚至連這個不對稱也已被吸收。作為戰爭以及策略，要趕上去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走在前面。我們必須發展的策略不是針對敵人，而是敵人的策略，使它逆向自己。也就是說它越相信自己將取得勝利，它越走向失敗。

34

譯註：將囚犯關在地窖裡然後將火放在門口以燒耗所有空氣讓囚犯窒息而死。

反起義將社會變成它行動的劇場，並不表示那是一個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渴望看到的「社會戰爭」。這個看法主要的缺點是，用同一個名字混淆了由「國家與資本」或者由他們的對手所發起的攻擊，顛覆性地將它們放到對稱戰爭的關係上。「為了報復法國航空將沒證件的移民驅回，而將其辦公室櫥窗打爛」叫做「社會性戰爭行動」，相同名字也被用在「反拘留中心行動者的逮捕。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些「社會戰爭」的持份者都有一種不可否認的決心，他們認為必須跟國家迎頭而戰，但這個叫「社會性」的戰場從來都只有他們而沒有其他人的份。不幸的是，當前的力量是非對稱的，他們的失敗是無可避免的。

事實上，社會戰爭只是「階級鬥爭」一個失敗性的更新而已，現在每個人在生產關係裡的位置已不再像福特主義的工廠裡那樣清晰。有時候革命主義者也被指責構成了他們想要反對的模式，例如一八七一年一名國際工人協會成員指出，老闆是因為利益而全球性組織起來的階級，無產階級必須世界性地，作為工人階級以及根據自身的利益，自我組織起來。也正如一名年輕布爾什維克黨員所解釋的，沙皇的統治有賴一套有紀律以及等級性的

政治——軍事組織，布爾什維克也必須以相同的方式自我組織。類似這種對稱的詛咒的歷史例子多不勝數，全都是悲劇性的。好像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線（FLN）因為與它敵對的殖民者運用的方法如此相似，結果他們注定失敗；或者好像紅軍，以為只要推倒五十多名他們認為構成「國家核心」的人，就可以控制了整個機器。今天這種對稱性悲劇大錯特錯的口號出自糊塗的新左派口中：必須反對分散的，以網絡作為結構的帝國，雖然他們也有發號命令的中心；而諸眾，同樣分散，同樣以網絡作為結構，也同樣有個發號命令的中心，而有一天，他們將會占領這些中心。

因為這個對稱性，起義必然失敗——不只是因為它的目標容易達到，前景清晰可見，而是因為它只是抄襲對手而已。要相信一點，讓我們看看大衛·加呂拉（David Galula）的《反起義：理論與實踐》（*Contre-insurrection, théorie et pratique*）。我們可以看到親政權軍隊如何戰勝起義者的詳細分析，「對於起義者來說，最佳目的就是取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同時說服小部分的反對者……問題是否令人填義憤填膺並不重要，雖然在這個情況下起義者的工作會容易一點。如果問題只是潛在性的，起義者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

將起義變得義憤填膺，以透過『提高群眾的政治意識』，將問題變得義憤填膺……起義者不應該將自己局限在一個單一的理由，除非他找到一個全面的理由，如反殖民主義，這本身便已足夠，因為它已經結合了政治、社會、經濟、激進、宗教以及文化問題，否則他可以針對他想獲得支持的不同群體，選擇一系列理由。」

誰是加呂拉口中的「起義者」？那是西方政客、官員或者公關人員的扭曲倒影：除了對控制有無窮的渴望之外，還有犬儒，與所有處境抽離、沒有任何真誠的欲望。加呂拉知道要戰勝的起義者是這個世界的陌生人，也是毫無信仰的人。對他而言，起義從不是來自民眾，他們只渴望安全，並傾向追隨最能保護他們又最不會威脅他們的政黨，他們是精英角力中的一隻棋子，一群被動的人，一個沼澤。這聽起來十分令人驚訝，因為起義者的力量還被理解為介乎狂熱者以及道貌岸然的遊說集體頭領之間——但更令人吃驚的是，有這麼多的起義者都熱情地戴上這些令人不快的面具。最終，只有這個對戰爭的對稱甚至「不對稱」的理解——一些小團體、小派別競爭著要控制民眾，但總跟他們保持距離。這是反起義政策最大的錯誤：它成功地將

遊擊戰策略引進的不對稱性消除，然後它又基於自己本身創造了「恐怖主義者」這個形象，而只要它還拒絕這個形象，我們就還有優勢。所有有效的革命策略都要採納它作為出發點。有見於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敗的策略，反起義政策在「人民」身上產生的反效果，結果歐巴馬政府要如日常一般，像做手術一般，用無人戰機殺害任何看起來像起義者的人。

4.

如果對於起義者來說，目的是要對政府發起一場非對稱性的戰爭，那是因為它們中間有一個本體論的不對稱性，所以對於戰爭的定義、方法以及目的都有不同的理解。我們這些革命主義者是政府的問題也是它持續攻擊的目標。我們是它想要征服的「心臟和靈魂」，我們是它想要「控制」的群眾。我們是政府官員成長以及必須戰勝的環境，而不是他們權力競爭的敵人。我們在群眾中的鬥爭不是「如魚得水」，我們是水本身，而敵人則是涉水而行的泥菩薩。我們沒有像陷阱一樣躲藏在平民階層，因為平民階層也躲藏在我們身上。活力和剝奪，憤怒與狡猾，真理以及詭計來自我們內心的最深處。

沒有什麼要被組織的人。我們是在內部成長的物質，自我組織以及發展。真正的不對稱，以及我們力量的真正位置便在這裡。那些只是基於恐怖或表演欲將他們的信仰變成外銷的東西，而不依處境跟事物連結的人，只是與自我割離，與自己的根基割離罷了。沒有什麼可以從敵人那裡搶走的，無論那是「人民支持」還是自滿的被動性；我們必須指出根本沒有什麼人民。人民在作為政府的目標之前已是它的產物了，當它不再可受統治時它便不存在了。這是在暴動後所有憤怒的聲音消滅的戰爭的問題：消除暴動中形成、集中以及展開的力量。治理永遠都不會是別的，只會是否認人們有任何政治的能力，也就是防止起義。

警察在有影響力的示威遊行後，都會試圖「孤立暴力分子」，將被治理的人的政治行動能力切割。如果要粉碎起義，在起義者內部分裂他們最有效，一方面是無知的或模糊認同的群眾，另一方面是武裝的前衛少數，通常是地下分子，很快會變成恐怖分子。我們可以在英國反革命教父福蘭克·基特生(Frank Kitson)身上找到這個策略最佳的印證。一九六九年八月震盪北愛爾蘭的前所未見的戰火之後的幾年，在暴動期間愛爾蘭共和軍在貝爾

法斯特(Belfast)以及德理(Derry)、聯合愛爾蘭的的天主教地區宣布自治，同時呼籲援助。自由德理、短河濱區(Short Strand)和阿杜尼(Ardoyne)：這些地方被管理成像在種族隔離才見到的「禁止進入地區」，直至今天仍被幾公里的和平線圍著。貧民區冒起，用圍欄將他們和警察和親英派的人隔開。十五歲的小孩早上上學，晚上要在圍欄工作。社區裡最受尊重的一個成員為十人買菜，以及為那些不能自由地出去的人安排地下食品雜貨。雖然一開始被夏天的事件出其不意逮個正著，臨時的愛爾蘭共和軍完全融化在這塊飛地極端濃重的倫理組織裡，處於永久起義的狀態，而這個無法簡化的力量，將什麼都變得可能。一九七二年是取得勝利的一年。

有點令人手措不及的是，反起義的規模如此之大：那是英國自從蘇彝士(Suez)危機以來前所未見的大型軍事行動，他們清空了居民區，突破了飛地(enclaves)，分開「專業的」革命主義者與一九六九年冒起的暴動者，將編織在一起的千百種默契從他們手中奪走。通過這個行動，他們將臨時愛爾蘭共和軍(IRA)貶低為一群武裝分子，非正規軍，雖然有決心以及令人印象深刻，到頭來注定要耗盡，注定要免訴訟便拘禁以及立刻執刑。壓迫的

策略是要製造一個激進的革命主體，將他們與使其成為天主教社區一股活力的東西分開，包括扎根本土、日常生活、青春。但彷彿這還不足夠，他們組織了假的 I R A 襲擊，使那些受驚的人都站在反對 I R A 的一邊。從「反叛亂」到「假旗行動」都是要將 I R A 孤立成棲息在地下的怪獸，在地域上以及政治上使他們不能再成為共和運動的力量：居住區，他們解決問題以及組織的方法，還有暴亂的習慣。一旦被孤立為「非正規軍」，千百種對付他們的例外程序也同時變得平常化，就可以期待這些「麻煩」自行消失。

當盲目的壓迫施加到我們身上，我們要小心不要將它當成我們激進的證明。不要以為他們想將我們摧殘，而是從他們想製造我們的假設出發。將我們製造成政治主體、「無政府主義者」、「黑色組織」、「反體制主義者」，將我們從人民中圈出來，然後打上政治標籤。當壓迫針對我們時不要對號入座，讓我們溶解反起義的理論家辛苦製造出來的狂熱恐怖分子主體；因為這樣的主體，他們也間接地製造了「人民」——政治冷感的一群，不成熟但適合被統治，適合滿足飢餓以及消費的夢想。

革命主義者不需要從外部以所謂的「社會計畫」來改造「人民」。而是必

須由他們的存在、他們生活的地方、他們熟悉的土地，將他們與周圍的東西團結在一起的連結開始。認清敵人以及有效的戰略和策略都來自生活，而不是來自一早就設定的某種信仰。增強力量的邏輯，正好用來對抗被權力操控的邏輯。努力地生活正是要對抗治理範式。我們可以反攻國家機器，但如果贏得的土壤沒有立刻出現一種新生活，政府終將會將它重新奪回。盧爾·茲別奇(Raul Zibechi)在談及二〇〇三年玻利維亞奧爾托的艾馬拉族起義時寫道：「如果有人與人沒有一個很強的關係網，就不可能發生如此規模的行動，而這些關係便是組織的形式。問題是我們並沒有想過，鄰居、朋友、同事、家庭等日常生活中的關係，其實可以跟工會、政黨甚至國家是同一個層次的組織……在西方文化中，由契約產生，經由形式化制定的關係，經常比由情感凝聚而成的忠誠更重要。」我們必須關心日常生活的細節，甚至是共同生活裡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好像我們關心革命一樣。因為起義就是將這個不是組織的組織變成有攻擊力的場所，而又不跟平常的生活脫節。它是在倫理要素中的一個質性的跳躍，而不是與日常的消費性的破裂。茲別奇繼續說：「支持起義的人和 support 日常集體生活的人是同一群人（奧爾托居民

區區議會)。日常生活裡的輪替以及義務以同樣的方式規範著公路及道路上的堵塞。「這樣看，自發以及組織這個沒用的分別會自行消失。存在並不是兩個分開的領域：一個是先於政治的，沒有反思性的，另一個是自發的以及政治的、理性的、組織的。有亂七八糟的關係的人就只會製造亂七八糟的政治。」

這並不意味著勝利性的出擊需要消除我們之間的任何糾紛——我們說的是糾紛，而不是弄虛作假。這主要是因為巴勒斯坦的抗爭並沒有要防止他們內部的不同——就算冒著公開對峙的危險——以便能夠在以色列軍隊面前逞強。無論何時何地，有不同的政治意見是一種不可否認的倫理活力，同時也是那些想要描繪抗爭然後將其消滅的情報機構的惡夢。一個以色列建築師寫道：「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戰鬥方式完全不同。巴勒斯坦的抗爭分裂成許多不同的組織，如哈馬斯的艾茲丁·卡薩姆旅（Ezzedine al-Qassam）、伊斯蘭聖戰的庫茲（Saraya al-Quds）、阿格薩（Al-Aqsa）、Force 17以及法塔赫（Fatah）的坦津（Tanzim al-Fatah），之後再加上獨立的人民抗爭委員會、真主黨，以及阿蓋達（Al Quida）虛擬的或者真實的成員。這些團體之間關係

的不穩定性，時而合作時而敵對，甚至暴力糾紛，使他們的互動很難被簡化描述，同時也增強了他們集體的能力、效率還有韌性。巴勒斯坦抗爭的分散性，由不同的組織分享知識、競爭和軍火——有時組織合作，有時殘暴競爭——大幅減低了以色列軍攻擊所造成的效果。」容許內部有糾紛或者持不同意見跟發展一個具體的起義策略並沒有衝突。相反地，它讓運動保持活力，讓重要的問題敞開，必要時改變方向。但是如果我們接受內戰，包括存在我們之間，不只是因為它構成一個對付帝國攻擊的策略，而且因為它跟真正的生活銜接。事實上，如果作為革命主義者意味著要忠於某種真理，那便是要接受不能簡化的多元性，如此我們的黨將不會是一個和諧的整體。因此，就組織而言，並不存在某種在兄弟之愛的和平與兄弟相殘的戰爭之間的選擇。存在的選擇是在有助於革命或者瓦解它的內部對抗的形式之間。

當被問及：「你認為什麼是幸福時？」馬克思回答：「鬥爭。」而至於「為何鬥爭？」我們回答：因為這正是我們對幸福的看法。

Notre seule patrie:
l'enfance

第六章
我們唯一的故土：童年

「社會」這個概念奸詐的地方在於，它幫助政府「自然化」其行動及成果；資本不再以國家而是地域作為單位來思考，將不同地域依不同價值和功能區分開來。但我們的假設不同：既沒有什麼「自然」的東西，也沒有什麼「社會」，但是有各種世界。建立一個世界，是闡釋一個秩序以及思考這個位置，並在必要時改變它。

1. 沒有要捍衛或者要摧毀的「社會」
2. 需要將選擇變成分裂
3. 沒有「本土的鬥爭」，只有不同世界之間的戰爭

1.

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雅典發生了總罷工，所有人都上了街。我們可以感受到清新以及鬥爭的氣氛，舊城區完全被示威者占據，有工會、毛派、無政府主義者、工務員、退休人員、年輕人和移民。這個國家帶著尚未受損的盛怒，發現了三頭馬車令人難以置信的備忘錄，準備製訂更嚴峻的緊縮政策的國會差點被攻取，退而其次是經濟部，它停止運作並且開始燃燒。一路上，人們掀起鋪路石、砸爛銀行、跟使用震耳欲聾的炮彈和以色列進口催淚氣毫不吝嗇的警察迎戰。無政府主義者一如往常扔擲莫洛托夫雞尾酒以及新式武器，其他人則在旁鼓掌。人們唱起經典的遊行歌曲《警察、豬、殺人犯》，有人喊道：「讓我們燒了國會」、「政府是殺人犯」。類似暴亂開始的景象在當天中午因為一道政府通告而全面氣餒。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嘗試

要燒了體育場大街的伊亞諾思(Janos)書店之後，將火也點在一家沒有跟從罷工的銀行，裡面還有人在上班，其中有三人窒息致死，其中包括一名孕婦。那時候，人們還不知道管理層關閉了緊急通道。馬爾芬(Martin)銀行事件像炸彈的衝擊波震撼了希臘的無政府主義者，殺人犯是他們而不是政府。自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之後，「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虛無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在這個事件中達到了頂點。老問題又出現了，到底是應該為了改變社會而走到社會中間，向社會建議以及示範其他模式的治理，還是將它摧毀而不赦免那些因為被動以及屈服而讓它繼續這樣下去的事物。面對這一點，人們都變得無比糊塗。人們沒有坐著挨罵，而是在警察愜意的笑眼中，互相撕鬥到流血。

這件事中的悲劇可能在於人們被一個不再被質疑的問題所撕裂，這解釋了這個爭論為何如此貧乏。可能根本上就沒有什麼要摧毀或者說服的「社會」：這個在十八世紀末虛構出來，而且吸引了這麼多革命主義者和執政者長達兩個世紀的故事，已經在我們不知不覺中嚙下了最後的一口氣。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哀悼它，同時也要拒絕社會學家哀嘆社會終結的懷舊情懷，以

及新自由主義者厚顏無恥地宣稱「根本就沒有叫社會的東西」。³⁵

十八世紀的「公民社會」與「自然狀態」對立，公民社會是「在同一政府以及同一法律之下團結在一起」的事實。「社會」是文明的一個特定狀態，或者是平民除外的「優良貴族社會」。在十八世紀，自由主義的治理術以及與其相應的「悲傷的科學」逐漸出現，例如象徵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經濟」、「公民社會」等。它不再跟自然狀態對立，而自身變得「自然」，也就是說人們習慣性地以為人表現得像經濟動物是自然的。在這一點上「公民社會」被視為與國家對立。十九世紀的聖西門主義、科學主義、社會主義、實證主義以及殖民主義都要證明「社會」的存在，證明人類在存在的表現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家庭，一個特殊的整體。在十九世紀末期，所有都變成社會性：居所、問題、經濟、改革、科學、衛生、國防、工作甚至戰爭——社會戰爭。這個運動的頂點是，一群熱心的慈善家於一八九四年在巴黎建了一家「社會博物館」用來宣傳以及實驗一切完善、平息以及淨化「社會生活」的技術。十八世紀時人們沒想過要建立如社會學這樣的「科學」，更不要說建基在生物學的模式上。

35 編註：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名言。

「社會」指的其實只是政府相繼的模式所帶著的陰影而已。在利維坦（Leviathan）的絕對國家年代，「社會」是主體的集合，在自由主義國家是經濟人。在福利國家，那是人自身作為權利、需求和勞動力的持有者，並構成社會的基本元素。「社會」這個概念裡奸詐的地方在於，它幫助政府「自然化」其行動、操作以及技術的成果，是先於政府存在被構造出來的東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才敢公開談論「社會工程」。自此社會便公認是建構出來的，有點像人們侵略了伊拉克做的國族打造。而當人們想公開地進行的時候，它就不再運作。

無論哪個時代，捍衛社會都是以冒著與政府本身對幹的危險來捍衛政府的對象。直至今天，革命主義者犯的其中一個錯誤在於，他們鬥爭的陣地是對他們滿懷敵意的人虛構出來的，他們想要找到始因，卻不知道其背後是蒙面前進的政府。而我們黨混亂的部分原因也是政府在一九七〇年代放棄了這個虛構出來的東西。政府已放棄將所有人都納入有序的整體裡——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也只是夠坦率才承認這點。它變得更實用，放棄建構單一化的人類（跟其他創造物完全分離，上有神、天空以及天使，下

有物件以及動物）這個疲累的任务。我們進入永久危機的時代，「賺快錢的時代」，每個人都成為他自己的絕望的企業家，這狠狠地給了理想社會一巴掌，足夠讓它在八〇年代變得搖搖晃晃。接著而來的致命一擊體現在全球化大都市的夢想裡，由電訊業的發展以及全球化規模的生產程序的分工所促發。

人們可以執意要視這個世界為民族以及社會，而後者則被一些無法控制的流穿越。世界呈現為一個龐大的網絡，其中大的鄉鎮，變成大都會，它們只是相互連接的平台，有入口也有出口，就好像車站一樣。自此生活在哪裡都沒有大區別，東京、倫敦、新加坡或紐約，所有大都會都在編織同一世界，當中重要的是移動性而不是在地性。個人身分就好像一張萬用的通行證，容許無論在何處何地都可以跟其他人連結。這些超級大都會處於永久的競爭中，從機場大樓到歐洲之星列車的廁所，這必然不會構成一個社會，更不要說全球性社會。超級資產階級在去里約熱內盧的屋頂聽音樂會之前，先去香榭麗舍簽約，然後再去一趟伊維薩島(Ibiza)平撫一下情緒，這最能體現世界的墮落，意味著要及時行樂，但卻看不到任何未來。記者以及社

會學家不停地哭訴著已逝的「社會」，重複著關於「後社會」的老生常談，加劇化的個人主義、舊機制的解體、方位的迷失、社群主義的上昇，不平等的持續惡化。而事實上，正在消失的是他們的謀生技能。他們需要想想轉行了。

一九六〇以及七〇年代的革命浪潮，給了所有東西都和平地融合在一起的資本社會致命的一擊。作為回應，資本重新地域結構化。因為這個有組織的整體計畫的底部是碎開的，這容許它在底部，一些堅固的、互相連結的底部，以網狀重新建構一種新的價值生產的世界性組織。這不再是我們等待的有生產力的「社會」，而是地域，某些地域。在過去的三十年，資本重組的形式是世界空間的新布置。它的問題是要創造「群」(clusters)，「創新環境」，給那些「有雄厚社會資本的人」最好的條件去創造、創新、執行，特別是一起幹。而其他的人，對不起，生活是不容易的。這個模式的佼佼者是在矽谷，資本的經營者到處致力於建立一個「生態系統」容許個體通過關係的建立，充分地自我實現，以及「將他們的潛力最大化」。這是創意經濟的新皇冠，以前的工程師／競爭性地區這一對概念現在被設計師／士紳化潮流

居民區追擊。根據這個新《聖經》，價值的生產需要依靠創新的能力，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然而，如這些地域管理工作者所熟知的，他們不能發明一個有利用於創作以及互惠的氣氛，一個多產的環境，而只能「找到」，因為它需要在一個有歷史、有認同、可以與創作精神發生共鳴的地方產生。集群不能被強加，它只能在一個「共同體」所處的地域出現。如果你的城市正在衰退，解決方法不是來自投資者或者政府，一名時髦的企業家這樣解釋給我們聽：我們必須自我組織，找到其他的人，互相認識，一起工作，聘請其他有動力的人，組成一個網絡，顛覆現狀。這需要靠高科技的瘋狂競賽以創造一個獨特的市場，然後可以消滅競爭，並在之後幾年靠這個形勢來收益。所有這些背後都是一個全球性的策略邏輯，資本地域性地展開了設置的決疑論。這容許一個壞良心的城市建築師這樣評論蘭得斯聖母鎮建機場的防禦區³⁶，那無疑是「一個像矽谷一樣具有社會性以及生態的地方……矽谷一開始也不是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廉價租金以及一些人的週旋讓它變得獨特及聞名世界」。認為從來只有商人社會的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寫道：「在共同體，雖然有分離但人們是連在一起的，在社會，他

36 譯註：Zone à Défendre，反空間規畫的占領行動。

們雖然是連在一起但其實是分離的」。在資本主義「創意的共同體」，我們是因為分離而連在一起的。我們可以用來分別生活以及價值生產的「外部」已不再存在。死亡在她內裡；她還年輕，有動力，她對著你笑。

2.

要持續激發創新、企業、創作最好是在一堆廢墟上操作，這解釋了過去幾年為何那些很酷的數位企業推出大量的宣傳要將工業廢城底特律變成實驗土地。一名以「創意階級」作為新城市發展計畫賣點的作者寫道：「如果你在找一個接近死亡而又再次擁有新生命的城市，那就是底特律。底特律是一個很多事情發生、很開放的城市。底特律的對象是渴望參與的有趣年輕人、藝術家、創新者、音樂家、設計師、城市製作者。」他談的是一個在過去五十年失去一半人口的城市，美國犯罪率第二高的城市，當中有七萬八千座建議物閒置，有一名前市長被送進監獄，官方的失業率近五成，但亞馬遜網路書店以及推特在那裡開了新辦公室。雖然底特律的命運還沒有被決定，我們已看到如此規模的城市宣傳足以將一個存在了幾十年的後工業災

難，包括失業、蕭條以及犯罪，變成一個由文化以及科技來支持的潮流地區。同樣的魔術棒在二〇〇四年開始將里爾(Lille)改頭換臉，那一年它是「歐洲文化首都」，這當然也意味著整個城市人口將戲劇性地改變。從紐奧良到伊拉克，所謂的「震撼策略」讓他們逐區獲得利益。在這個由「社會」控制的拆除—重建，最不加修飾的破壞以及最咄咄逼人的財富只是同一治理方法的兩面而已。

當我們看「專家」對未來的預測報告時，我們發現如下所述的地理概況：大都會地區互相競以爭取資本以及智慧型人類(smart people)，隸屬第二區的都市則爭取某種專門化，貧窮的農村地區則靠成為「需要大自然和安靜的城市人」的渡假區、農業區(最好是有機的)或者「生物多樣性保護區」來勉強維持，最後是純粹被放棄的地區，遲早會變成關卡，或者用來遙控無人駕駛戰機、直昇飛機、閃電戰，以及大型電話監控的場地。資本，如我們所見，不再是「社會」問題，而是如它很禮貌地說，那是「治理」的問題。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革命主義者早吐了它口水，不要它了；自此它選擇了自己的代表。

資本不再以國家而是地域作為單位來思考。它不再以一致性的方式擴散，而是很在在地以文化來組織這些地域，它不再用進步的棒子逼著世界以同一步伐前進，而是讓它們分開，作為可以榨取高剩餘價值的地區、可放棄的地區、戰爭的劇場，以及「被安定」的空間。例如在意大利的東北部以及坎帕尼亞(Campanie)，後者剛好用來收集前者的垃圾；在法國有索菲亞科技園(Sofia-Antipolis)和維利耶爾勒伯(Villiers-le-Bel)；同樣也有洛杉磯和諾丁山(Noting Hill)；特拉維夫(Tel-Aviv)還有加薩走廊。智慧型城市以及腐敗的市郊(這些形容詞也應用在居住在那裡的人口上)。我們不再有同一類型的「人口」。我們有年輕的「創意階級」，他們以社會、文化和關係資本在智慧大都市裡賺錢，甚至變成「無法僱用的」。那裡有一些重要的生命，也有一些連紀錄也不值得的生命。那裡有不同的人口，部分生活在水深火熱，部分擁有驚人的購買力。

如果社會這個概念還有基石，還有城牆來阻止它的崩潰，那就是滑稽的「中產階級」了。在二十世紀，中產階級不停地延伸，至少是虛擬性地，以至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以及法國人今天還以為自己屬於這個不存在的階

級。然而，現在輪到中產階級被殘忍的選擇過程折磨。虐待狂式競爭的真人秀電視節目倍增，除了以下原因之外還真不能解釋：那是大眾宣傳要使每個人習慣每天總有朋友被謀殺，習慣生活在適者生存的世界。法國國土規劃暨區域政策署（DATAR）是策劃以及協調法國政府空間計畫的組織，它們權威式預言或者吹噓：在二〇四〇年「中產階級數目會減少」、「他們當中較好運的將成為跨國精英的下屬」，我們將看到「他們的生活模式跟普羅大眾越來越接近」，這個即將「為精英服務」的「僕人軍隊」，將生活在墮落的居民區裡，跟「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一起住，等待著與社會階級的高層次整合或者破裂。換句話說，他們看到的將來差不多是這樣的：別墅區荒蕪了，以前住在那裡的人都搬去了貧民區，將這些房子留給「大都市的菜農，他們以短距離為大都市供應新鮮的產品」，以及「大量自然公園」、「生活離線區」、「給想要到野外的市民娛樂」。

這個情景會發生的機會率有多高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想要結合展望以及行動策略的人已領先宣佈了舊社會的死亡。選擇的全球動態與舊的整合辯證（包括社會鬥爭）越來越對立，將有生產力的以及災難性的地域分

開，將智慧型階級以及「白痴的」、「遲鈍的」、「沒有競爭力的」（他們「不願改變的」、有歸屬感的）分開，已經不再是由幾個社會組織或者文化傳統決定，關鍵是要能夠即時仔細地決定價值在哪裡、在那個區域、跟誰、為了什麼。由大都會重新組成的群島不再像「社會」一樣有包括性及階級化的秩序，所有整體化的想法都被拋棄了。法國國土規劃暨區域政策署的報告告訴我們：那些當年有份參與國土規劃、建成戴高樂時期的法國福特主義式統一的人，開始自己將其摧毀，他們毫無表情地宣告了「民族國家的黃昏」。設下的界線，無論是主權的邊境、人與機器、人與自然的分別，都已是過去的事。有界限的世界已經結束。新的大都會「社會」分布在平坦的、開放的、延伸的，但沒有垂涎那麼流動的空間。它滿溢出邊緣，超越輪廓。人們不再輕易地說出，它是誰，它不是誰：在智慧型的世界裡，一個智慧型的垃圾桶比流浪漢或者農民跟社會的關係更密切。「社會」在空間規劃水平的、分割的以及差異化的平面上重新構成，而不是在中世紀神學的垂直階級化的平面上；作為政府遊樂場它擁有模糊、流動、可以容易取消的邊界。為了亞馬遜網路書店、微軟以及波音的僱員，西雅圖的窮人都被趕走

了，現在更提供了免費公共交通的時刻，城市不會要求這些人付錢，因為他們的一生都只是在生產價值，否則，便是缺少感恩了。

這樣子武斷地選擇人口以及地域有它自身的危險。當將人們分成值得活下去以及可以死去的時候，那些自知注定要被送到人類廢品堆填區的人，不曉得還會不會乖乖被治理。治理者只能希望「處理」這殘留下來的的大規模東西——因為同化不太可能而要他們消失，無疑有點過份。這些麻木或者犬儒的空間規劃者，承認「分隔」、「不平等的增加」、「社會等級的延伸」是時代的需要，而不是應該阻止的問題。唯一的問題是分隔可能會成為分裂——「部分人口逃往市郊並且自我組織成自治區」，最後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導的模型破裂」。這是他們要處理的危機，這也是我們要做的。

資本已經造成的分裂，將由我們以自己的方式來承擔。分裂，不是要將國土的一部分割出來，不是要自我孤立、割斷與其它人的溝通，那只是只取滅亡；分裂，不是要從世界的廢棄品中建立反集群（counter-clusters），然後讓那裡另類的社區為自己想像中的自治感到沾沾自喜——這只是法國國土規劃暨區域政策署計畫裡的一部分，它已計算好讓這些社區在沒有攻

擊性的邊緣碌碌無為；分裂，是要占據一方土地，接受我們在世界中的角色、我們居住的方式、生活的形式以及我們所肩負的真理，然後從那裡出發介入糾紛或者共謀。所以那是有策略地連接其他的反對者，與友好地區加強流通，而不會任何邊境。分裂，不是要跟國土分裂，而是跟現存的地理決裂；它是要劃出另一種不連續的、群島式的、有強度的地理——所以就算要跑一萬公里，也要到訪這些跟我們接近的地方和地區。建立里昂(Lyon)——都靈(Turin)鐵路的反對者在他們的一張單張裡寫：「No TAV(不要高鐵)意味著什麼？它的出發點是：『高速火車不會經過蘇薩河谷』，所以他們要組織來確保這點。很多人都是在過去二十年因為這個信念才相遇的。從這一點來看，問題不是要不要讓步，而是所有人都要一起決定怎樣做。在蘇薩河谷的鬥爭是全世界的事情，不是因為它捍衛『公益』，而是因為那是對於『什麼是美好』的共同想法。它要面對其他的看法，抵抗那些想要針對它的，以及和它相近的連接起來。」

3.

一名空間規劃的地理政治家寫道：「在過去二十年間，圍繞空間規劃的糾紛增強到一個地步，我們不得不問，我們是否正面對從社會領域到土地領域的漸進滑動。當社會鬥爭越少，空間鬥爭就越多。」我們幾乎忍不住要他看看，蘇薩河谷的鬥爭怎樣決定了意大利政治爭議的節奏。看看在德國文德蘭(Wendland)越來越多抗議運輸核廢料的Carstorf³⁷；看看人們反對在哈爾基基州(Chalcidique)的耶里索斯(Terissos)礦場以及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凱拉泰阿(Kerarea)垃圾焚化爐的決心，以至有越來越多的革命主義者熱烈地參與他們所謂的「本土鬥爭」，就好像昨天他們參與「社會鬥爭」一樣。

當中不乏有馬克思主義者追問(雖然遲了幾乎一個世紀)，是否應該重新估量這些工廠罷工、鬥爭的空間特徵，而這意味著問題不再只是工人而是整個地域，不再是簡單的受薪關係而是生命本身。這些革命主義者的錯誤在於他們看待本土好像他們看待工人階級一樣，好像是存在於鬥爭之前的現實。他們很自然地以為是時候建立一個新國際來反抗「沒用的、強加上來的大計畫」，這會讓他們變得更強以及更有感染力。他們沒有認識到，鬥爭本身為了重新形成空間的日常性，從而建立了本土的穩定性，在此之前它完

37 譯註：裝載核廢料的金屬箱子。

全是暫時性的。一些 TAV 的反對者指出他們的「運動並不滿足於捍衛現狀的『領土』，而是以它可以成為的方式來改變它……讓它存在、建立它、給它一致性。」傅里奧·杰西(Furio Jesi)指出：「比起小孩時在街上玩，或者長大了跟一個女孩在街上散步，在叛亂中通過添加或者去除某些東西，人們其實更能重新了解城市」。同樣如果蘇薩河谷的居民沒有跟這個歐盟的骯髒計畫鬥爭了三十年，他們不可能對峽谷有如此細緻的認識，以及有如此的歸屬感。

這些核心問題不是土地的鬥爭連結起來的，不是與資本主義的重組對疊，而是在糾紛過程中發明或者重新發現生活的方式。連接這些鬥爭的是抗爭行動——堵塞、占領、暴動、破壞，以此作為攻擊，針對通過資訊與商品的流通，通過「創新空間」的連結來進行的價值生產。要擺脫它的力量不是為了勝利而動員，而是勝利本身；在這個條件下，力量會逐步增強。「播種你的防禦區」(Sème ta ZAD)這個運動是名副其實的，它呼籲占領了蘭德斯聖母鎮機場規劃用地的居民重新在那裡農耕。這個行動有效地讓人們想得更長遠，無論如何都比傳統的社會運動長遠，同時引起對防禦區的生命與

前景的反思。這種願景將在蘭得斯聖母鎮以外散布。

如果我們將本土與全球對立，我們將注定失敗。本土不是全球化的一個安全的另類可能，而只是它普遍的產品而已：在世界還沒有全球化時，我住的地方只是一個我熟悉的環境，我並不視之為「本土」。本土只是全球的背面，它的殘渣，它的分泌物，而不是能消滅它的東西。當人們能夠因為專業、醫療或者假期理由而一直連結在上面之前，沒有東西是本土的。本土是分享的可能性的名字，與剝奪的分享結合。它是全球的一個矛盾，我們可以賦予或者不賦予它一致性。每個獨特的世界都為自身所呈現：它是這個世界裡的一個褶皺，而不是獨立於其外。將蘇薩河谷、哈爾基季基州或者馬普切（Mapuche）這些重新創造了有全球性光環的土地以及人民，被冠以可被忽視的「本土鬥爭」的名字，好像那裡有令人賞心悅目的民間「本土色彩」，其實是很經典的中立化操作。國家可以推說這些地區都處於邊緣，然後在政治上將它們邊緣化。除了墨西哥政府之外，有誰會想要叫查巴達的起義以及跟著發生的運動為「本土鬥爭」？然而有什麼比這個反新自由主義擴散，而又激發了全世界反「全球化」運動的武裝起義更本土的呢？查巴達成功的反抗行

動很快地便從國家的框架以及「本土鬥爭」這個次等的狀態抽離，並跟全世界的其它力量結合；他們也成功地同時在國境內以及邊境之外鉗制了墨西哥政府。這個運動是無法抵擋，同時也是可以複製的。

所有——包括全球——都是本土的，但我們仍需要將它本土化。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浮於空氣中，並且經無數不明顯的渠道擴散。因為我們無法定位，所以它看起來好像不可戰勝。我們不要將華爾街視為天上的猛禽，好像昨天的神一樣主導了世界，我們只要在地化它的物質以及關係網絡，從交易所追蹤到最後一根光纖，我們就可以有不少的勝算。我們要明白證券交易員都是蠢蛋，他們不值得擁有惡魔這個名聲——雖然在這個世界愚蠢是一種力量。我們要琢磨泛歐證交所（Euronext）或者明訊銀行（Clearstream）之類的票據交換所的黑洞式存在，這對國家也是同樣的，如一名人類學家所說，它可能只是一個個人忠誠的系統。國家是戰勝了所有其他黑道的黑社會，因此它贏得了將他們當成罪犯的權利。識別這個系統，將它勾勒出來，察覺它的向量，是將它拉到地面，還原它的真身，這也是唯一可以將這個霸權的光環拿走的調查研究工作。

還有另一個危險窺伺著所謂的「本土鬥爭」。那些經由日常組織而發現政府是多餘的人，可能總結出一個下層的、前政治性（*pré-politique*）的社會的存在，那裡互相合作是很平常的，他們很邏輯地會以「公民社會」之名來反對政府。在這些正面的憧憬中很難沒有一種對於人性的穩定、和平、單純假設，它來自一種根本的基督教傾向：互助、善良、憐憫。一名美國記者討論二〇〇一年的阿根廷起義時寫道：「在勝利的一刻，革命看來已經達成承諾：所有人都是兄弟，誰都可以暢所欲言，心是滿足的，所有人都很團結。歷史上當一個新政府形成時，卻將這種力量給了政府而不是公民社會。……兩個政權的交接期間最像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心目中沒有政府的社會，當社會還在逐步成形時，所有人都可以參與，而沒有人持最終權威。」太陽在充滿善意的、負責任的人性中升起，那裡人們通過互相尊重以及充滿智慧的協商過程自治中自給自足。人們以為鬥爭可以於讓一種善的人性出現，事實上是鬥爭的條件製造了這種人性。為公民社會辯解只是以國際規模來重演成為成年人的理想，我們可以最終脫離我們的監護人——國家，因為我們終於懂事了；我們最終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了。這個嘮叨意味著要自

已承擔成為大人所帶來悲傷的東西：事事都要負責任的無聊，特意表現出來的善良，對孩童才有的情感的壓抑——也就是要準備好進入權力和糾紛的遊戲。內裡的錯誤無疑是這樣的：公民社會的持份者至少自約翰·洛克(John Locke)³⁸開始，向來是將「政治」等同於由政府腐敗及大意引起的憂患，因為對他們來說社會的基石是自然而且沒有歷史的。歷史準確地來說，是一連串錯誤以及不明確因素，它們拖延了理想社會的到來。「人類追求的偉大結局是當他們進入社會時，可以安定無憂地享受他們的財產」，那些以「社會」之名反對政府的，無論他們想法有多激進，他們所能要求的是歷史及政治的終結，也就是說糾紛的可能性的終結，也就是說生活，活著的生命的終結。

我們的假設完全不同：即沒有什麼「自然」的東西，也沒有什麼「社會」。非人類的存在物編織了一個對所有存在都熟悉的世界，而將人類從非人類的存在中抽離，然後以「社會」之名將被這些已截肢的生命團結在一起，是一個持續了足夠久的可怕事情。在歐洲各處，有些「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建議一個處理危機的全國性方案：退出歐元並重新建立一個有

38 譯註：英國哲學家。

限制、單純以及有秩序的美好整體，這對他們才是解決方案。這些被截肢的人不能自制地迷戀著他們鬼魂般的肢體。更別說講到有秩序的美好整體時，法西斯主義者總是占了上風。

沒有社會，但是有各種世界，也不再有任何反社會的戰爭，向虛構的故事宣戰是給它血肉。我們頭上沒有一個天空叫「社會」，只有我們，以及我們經歷的連結、友誼、非友誼、相近、距離的集合。那裡只有我們，只有一些全然因處境產生的力量，以及它們在社會不停解體和重構的遺體內延伸的分裂能力。簇擁的世界，一個由一堆世界組成的世界，貫穿著糾紛，有吸力也有斥力。建立一個世界，是闡釋一個秩序，要不要給每個東西、每個存在、每個傾向一個位置，以及思考這個位置，在必要時改變它。我們黨的每次出現，無論那是占領廣場，暴動潮，還是在塗在牆上的反動句子，都是在向所有我們沒有去過的地方擴散著一種感覺——那是「我們」的一分子。那是為何革命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關心他們組成的世界。如查巴達所證明的，每個有獨特處境的世界不單不會阻止運動通向普遍，還會為它鋪設這條通道。如一名詩人所說的，普遍是沒有牆的本土。普遍化的能力連接著自身內

在的深化，以及所經歷的世界的強度化。我們不需要在關心所建立的世界及政治的衝擊能力之間做選擇。我們衝擊的力量是由我們生活的強度，四處散發著的快樂，我們發明的表達形式，以及通過考驗的集體能力構成。在社會關係普遍的不一致性中，革命主義者必須經由他們的思考、情感、細緻與組織的密度來自我獨特化，而不是經由分裂的傾向、毫無目的的不讓步，或者基於狂熱的激進性的惡性競爭。通過對現象的注意力，通過它們感性的力量，而不只是意識形態的一致性，革命主義者才能成功地成為一股真正的力量。缺乏理解、沒耐性以及疏忽都是敵人。而真實則反抗。



Omnia sunt communia

第七章
一切歸於所有人

成立公社就是互相連結，它自身的力量便是自由的來源。經濟社群在公社之間彼此流通，公社也克制著這些社群自我中心化的傾向。公社注定無法與外部切割，它必須透過內化周遭的東西成長，關心與它者的關係便能增強自身的力量。

1 · 公社重臨

2 · 好像革命主義者般生活

3 · 告別經濟

4 · 形成共同力量

1.

一個埃及作家，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在離解放廣場一段長時間之後寫道：「這些我在解放廣場所見到的人都好像新的生物，跟我平日所接觸的人完全不同，好像革命製造了新的、品質更為優秀的埃及人……這好像讓埃及人對革命不再恐懼，同時也糾正了社會歪風……解放廣場成了可與巴黎公社比擬的地方。人們將政權顛覆，在那裡建立了人民的權力。人們自己分配了各種各樣的任務，比如清潔、或者建廁所及浴室，義務醫生也在那設立了流動醫院。」在奧克蘭，占領運動在奧斯卡·格蘭特(Oskar Grant)廣場設立了「奧克蘭公社」。在伊斯坦堡，自一開始人們就找不到有什麼比用「塔克辛公社」來命名它更好的。雖然有說塔克辛不會達成革命，

但革命已在行動裡，它激昂而且無所不在。在二〇一二年九月，在一個位於尼羅河三角洲的小村塔星(Tarin)的三千個居民宣布獨立於埃及政府。一些居民說「我們不再交稅，我們也不再交學費。學校我們自己搞。我們自己處理廢物和道路。如果有政府人員踏進村子不是為了幫助我們而是為了其他事情，我們會將他趕出去。」在瓦哈卡州的高山裡，八〇年代初印第安人嘗試理論化他們的生活形式為何如此特別，最後他們找到了這個字「公社性」(communalité)。共同存在對於這些印第安人來說，作為「人民倫理的重建」，既是保衛傳統，也是反資本主義。我們也見到在過去幾年，庫德斯坦工人黨(PKK)轉化成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自由共產主義，發展成由多個公社組成的聯合體，而不是建立一個國家。

公社不只沒有消失，它回來了。它的回歸並非偶然，亦不發生在任意的時刻。它回來的時刻，正好是當國家以及資產階級不再是歷史力量的時刻。國家以及資產階級為十一到十三世紀動搖了法國的公社主義者運動劃上了句號。公社，不是免費城市，不是一個有自治機制的集體。人們通常以為在戰爭之後要根據這個或那個權威來辨認公社，事實上它並不需要權威來

存在。公社甚至不需要基本法，當需要的時候，也很罕見公社會制定什麼政治或行政的憲章。公社可以有社長，也可以沒有。公社的基礎是城市或者村莊居民互相遵守的誓言，這讓他們團結起來。在法國十一世紀的混亂時期，公社互相許諾協助，互相關照，以及一起對抗壓迫者。這可以說是叛逆(*conjuratio*)，如果皇室的立法者幾百年來沒有將它們歸類為陰謀以殲滅，這些謀反仍會被視為一種光榮。一位被遺忘的歷史學家總結：「如果沒有由誓言來連結，就不會有公社，而有連結，公社就會出現。公社跟共同誓言是同一個意義。」公社是共同面對世界的協定。它自身的力量便是自由的來源。它不是一個要達成的東西：它是一種連結以及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當資產階級獨攬所有事務以及財富，以及國家霸權的不斷擴展，這個協定只能在內部破裂。公社在中古時期的原初意義失落已久，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中卻不知為何讓聯邦主義者給找到了。這個意義週期性地出現，從蘇維埃公社運動(這是被遺忘了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源頭，它最後被史達林的官僚階級消滅)，到一九八〇年代南韓的光洲公社，再到休伊·牛頓(Huey P. Newton)的「革命聯盟公社主義」(*intercommunalisme révolutionnaire*)。每次

宣布成立公社，都是跟歷史時間脫鉤，在連續屈從中，在無意義的日子消逝中，在每人掙扎求生、沮喪的鬥爭中找到缺口。宣布成立公社，是同意要互相連結。所有東西將改變。

2.

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 Landauer)寫道：「在人們的共同體生活裡面，只有一種對空間來說適合的結構：公社以及公社的聯盟。公社的邊界有很多意義（它雖然排斥出格的行為及將其隔絕，但沒有排斥不理性以及不幸）：它們劃出來的區域在該終止的地方終止」。政治現實必然是空間性這一點挑戰了現代的理解。一方面，因為我們習慣了將政治當成抽象的維度，有左有右，有立場有論述。另一方面，因為我們繼承了現代對於空間的觀念，它是空的、有規律的、可測量的延展，當中占據著物件、生物、風景。但感知的世界並非如此呈現在我們面前，空間不是中立的，東西跟存在物並不占據幾何位置，而是影響空間或者被空間影響，這些地點都不可簡化地乘載著歷史、印象、情緒。公社的出現有特定的地點，它不是一個行

政個體，也沒有簡單的地理劃分，它所表達的毋寧是一種地域內共享的經歷。它在地域上所加上的深刻維度，任何參謀總部都不能將它歸納在地圖上。它通過自身的存在將空間網絡化的理性打碎，同時使「空間規劃」的妄想落空。

公社的領土是物理性的，那是因為它是存在性的：占領它的力量視空間作為集群不間斷的網絡，不同的品牌操作讓網絡看起來很多元化；公社則視自身作為跟全球秩序具體的、處境性的破裂。公社成長在具體的地域，也是說公社塑造了土地，而土地為公社提供了棲息以及庇護的地方。公社在那裡編織了必要的連結，以自身的記憶為營養，找到了與土地之間的意義與語言。在墨西哥，一個印第安人類學家，他也是其中一個捍衛「公社性」作為政治指導原則的人，在談及阿約克(Ayujik)公社時宣告：「人們用這些字nax(土地)和kajp(人民)將社區描述成物理上的存在。土地(nax)使人民(kajp)的存在變得可能，另一方面人民(kajp)賦予了土地(nax)意義。」一個有生命力的地域最終成為生活在那裡的事物的一個肯定、一種解釋以及表達。我們見到博魯魯(Bororo)村的布置讓人與神的關係彰顯，就好像

緊隨暴亂、廣場占領之後牆上盛放的標語，人民重新創造了都市空間。

經由土地公社獲得了身體，找到了聲音，抵達了存在。二十年代末，一些自治公社成員(Comuneros)拿起武器，在米卻肯的一群小地產業主手中重新奪回了奧斯圖拉(Ostula)的公社土地，並宣布了聖地牙哥哈耶克蘭(San Diego Xayakalan)自治公社的成立。一名納華(Nahua)印第安人，其中一個公社成員說道：「這片地域是我們生活的空間，我們在夜裡見到的星空，熱或冷，水、沙、礫、森林，我們存在、生活的模式，我們的音樂，我們說話的方式」。在世界上無論多微小的存在都需要土地，無論是在塞納聖丹尼(Seine-Saint-Denis)還是澳大利亞土著的土地。居住是與土地之間的書寫以及敘述，這正是地理學(Géographie)本來的意義。地域對於公社，正如字詞對於語意，也就是說它從來就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手段或者工具。在這個根本意義上，公社與對商業操作的無限空間對立：公社的地域所顯示的是意義，而不是由幾個空間規劃專家所分配的生產功能。居住空間以及活動區域的差異好像親密的日記和冰冷的時程一樣。兩種對土地的使用，兩種對墨水以及紙的應用，完全沒有相似之處。

作為與世界對立的決定，所有的公社都將世界置於其中心。當一名公社的理論家說公社是「原住民的生活與精神所具有的東西，如互利、集體、系譜、原初的忠心、團結、互助、集體義務勞動、集會、共識、溝通、一視同仁、自給自足、捍衛土地、自治以及對土地母親的尊重」，他忘了說這個理論化的需求來自於與時代的對立。權力操作自治的必要性並不是來自對自給自足的永恆的憧憬，而是對被奪走的政治自由的珍惜。公社不自滿於這樣說自己：它的建立想要彰顯的不是一種認同，或者自我成全，而是它創造了生活。公社只能經由外部成長，好像生物一樣將周遭的東西內化。正因為公社想要成長，必須吸收不是自己的東西。當與外部切割，它會衰退，吞噬自己，自我撕裂，變得遲鈍，或者好像希臘人所稱的全國規模的「社會的食人主義」，因為它覺得與世界隔絕。對於公社來說，自身力量的增強就是關心與他者的關係。歷史上來說，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巴黎，還有利摩日(Limoges)、佩里格(Périgueux)、里昂、馬賽(Marseille)、格勒諾布爾(Grenoble)、勒克勒佐(Le Creusot)、聖埃蒂安(Saint-Etienne)、魯昂(Rouen)，以及中古時期的公社都是因為隔絕而失敗。總的來說，通過平息

外省，梯也爾(Thiers)可以在一八七一年輕易打敗了巴黎的無產階級，同樣的這也是土耳其警方的策略，他們有效地阻止了加其(Gazi)、貝西克塔斯(Besiktas)或者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e)另一邊的居民區與塔克辛集合與連結。公社面對的悖論如下：它必須成功創造一個不同於「全球秩序」的地域現實，以及在本土的層面互相連結，也就是擺脫它自設的枷鎖。如果這兩個目標中有一個沒有達成，要麼包裹在自身地域中的公社會慢慢與外界隔絕直至最終被消滅，要麼它變成遊離的一群，離地，跟自身的處境格格不入，對所走的道路感到不信任。這是我們在一九三四年的長征所見到的，三分之二的紅軍因此而死掉。

3.

公社的核心正是逃離公社的東西，穿越它而又不讓它占有的東西，這正是羅馬法所稱的*res communes*(共同的東西)。「共同的東西」是海洋、空氣、廟宇；人們不能占有它：人們可以在海裡或河裡打水，拿廟宇的石頭，但是人們不能將大海或者神聖的地點當成自己的東西。吊詭的是，拉丁

文的 *res communes* 正是要反抗物化，反抗將它變成一個物件，也就是 *res*。這是以公法來命名公法無法包括的東西，公共使用的東西不能被簡化為法律範疇。語言，正是典型的「共同」：因為它，經由它，我們可以自我表達，但是沒有人能占有它。我們只能使用它。

一些經濟學家最近幾年致力於發展一個關於「共同」的新理論。「共同」是一些市場無法價值的東西，而沒有它們，市場將無法運作：環境、精神以及生理健康、海洋、教育、文化、大湖等等，也包括大型的基礎建設（公路、國際網路、電話網絡或者衛生等）。根據這些既擔心全球狀況惡化而又致力改進市場功能的經濟學家，有必要發明一種對於「共同」的新「治理」。這種治理不是完全基於市場。《治理共同》（*Governing the Commons*）是二〇〇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一本暢銷書的標題，她在這本書定義了「治理共同」的八條原則。內格里以及他的同夥明白「共同的治理」這個題目還有發展空間，於是發展了一套完全基於自由主義的理論。他們甚至視資本主義所生產的所有東西為共同，爭辯說因為它們最終來自人類的合作生產，而且只能由一種奇特的「共同的民主」

來重新奪取。這些永久的行動者常常缺乏主意，總急著拾人牙慧。他們現在宣稱「健康、住宅、移民、保健、教育、紡織工業的工作環境」都是必需擁有的共同。如果他們繼續這樣下去，遲早會提倡核電廠或者甚至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自我管理，因為網際網路是屬於大家的。一些更為過度講究的理論家則提倡將「共同」當作從西方的魔術帽裡掏來的最後的形而上學原則。他們稱之為「原則」(arcs)，因為它「安排、命令以及支配所有的政治活動」，它是一個新的「開始」，它必須創造新的機構以及新的世界政府。所有這一切當中的災難是，除了這個由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以及第二國際沉悶的想像而啟發的對人及物的行政管理之外，他們無法想像其他革命性的世界。當代的公社沒有呼籲要獲得或者奪取某種「共同」，而是建立一種共同的生活形式，也就是說從這個世界出發跟與他們不能占有的東西發展出一種的共同關係。

就算這些「共同」淪入一班新品種的官僚主義者手中，殺害我們的東西並不會有根本的改變。大都市中社會生活的操作就好像一個去道德的巨型企業，人們生活的每一面向完全由整個商業系統的組織所支配。人們可以活躍

於這個或那個組織，跟一班「夥伴」進進出出，最後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沒有理由去相信可以共同進出。所有社會運動，所有真正的邂逅，所有的暴動，所有的罷工，所有占領，都在這個生活的假象打開了缺口，展示一種共同生活是可能的，可取的，而且可以是豐裕和快樂的。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所有東西都在密謀要勸說我們不要去相信這個，要去消除其他生活形式的痕跡——包括那些已熄滅的以及那些即將中止的。那些絕望的舵手最怕遇到不像他們那麼虛無的乘客。事實上，這個世界的組織方式讓我們對它完全依靠，實際上是對所有其他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日復一日否認。

隨著社會光環褪色，建立力量的迫切性隱蔽但感性地漫延開來。自從廣場運動結束之後，我們見到大量城市出現了防止驅逐住客的互助網絡、罷工委員會、居民委員會以及各式各樣的合作社。生產、消費、居住、教育、信用合作社，甚至是想覆蓋生活所有面向的「整合合作社」。這些以往只是存在於貧民區的實踐突然之間延伸出去，並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及成效。人們舒了口氣，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人們一起面對金錢問題，有些人通過自我組織來找錢，有些乾脆不理它。一個合作社式的細木工場或工具間，如果

只是被當作用來賺錢而不是人們的共同媒介，那麼經營這些就會像打工一樣痛苦。如果公社沒有揭露經濟實體的不完整性，所有經濟單位都注定要消失，或已經消失。公社指的是在所有公社之間讓經濟社群有所流通、穿透以及超越這些經濟社群的一切事物；公社是連結，克制這些社群自我中心化的傾向。二十世紀初，巴塞隆納工人運動的倫理可以應用於當前的實驗，其革命性並不在於無政府主義學校，不在於私印了有CNT-FAI³⁹字樣鈔票的小老闆，不在於工會、工人合作社，也不在於受僱槍手⁴⁰。所有這一切的連結，生命在它們之間盛放，不能被簡化為其中的一個運動，或者一個單位，這是它不可動搖的根基。我們另外要留意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的起義中，能夠將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不同單位有攻擊性地連結在一起的是Zosutos：一班被運動視為「無政府布爾什維克主義」而被邊緣化的人，他們在一個月之前剛被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公開審訊，而且幾乎被開除。

在不少受「危機」影響的歐洲國家，我們見到大量社會團結的經濟（*économique sociale et solidaire*）的回歸，以及伴隨著它的合作社主義以及互助主義的意識形態。一種要藉此創造「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想法在四周漫延。

39 譯註：全國勞工聯合會／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

40 譯註：Fascinos，西班牙內戰時期被僱用去殺害工會領袖的殺手。

我們見到的卻是一種有別於鬥爭，有別於公社的東西。要確信這點，只需要看看社會團結的經濟如何被世界銀行利用，特別是在南美洲，在過去的二十年被用作平息社會的政治技術。我們知道借錢資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這個計畫出現在一九六〇年代，來自勞勃·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的反起義意識。純粹的加呂拉。麥納馬拉是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八年的美國國防部長，越戰、橙劑計畫（Agent Orange）和滾雷計畫（Rolling Thunder）的關鍵人物。這個「經濟計畫」的核心跟經濟一點關係也沒有，它是純政治性的，原則也很簡單。為了確保美國的「安全」，也就是說消滅共產主義者的起義，必須剝奪他們最有力的抗爭理由：過度貧窮。沒有貧窮就沒有起義。麥納馬拉在一九六八年寫道：「共和國的安全並不只也不特別依靠軍事力量，而是在我國以及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制訂穩定、經濟及政治的系統」。如此看來，反貧窮有不少好處：首先，它遮掩了問題的所在，問題不是貧困而是富有——也就是說某些人以權力占有了主要的生產工具。進而，它將事情變成社會工程的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那些取笑世界銀行自從一九七〇年代起的減貧計畫幾乎是系統性失敗的人，或者可以留意一下對於它的真正目

的來說——防止起義，它其實取得很大的成功，這個美好的計畫一直持續到一九九四年。

一九九四年，在墨西哥發起的國家團結計劃（PRONASOL），依靠十七萬個本土的「團結委員會」來減輕因為與美國自由貿易所引起的暴力性社會影響，這合理地最終導致查巴達的起義，從此之後世界銀行所能做的只是提倡微信用來「加強窮人的自治以及賦予他們力量」（世界銀行二〇〇一年的報告），以及合作社和互助等，簡單來說，就是社會團結的經濟。同一份報告寫道：「有利在本土的組織中動員窮人，以便他們可以控制國家機關，參與本地決策，以及合作來確保法律在日常生活的首要性」。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本地網絡中自行遴選領導，中和反對的群體，提高「人力資本」的價值，將那些邊緣及逃逸的都吸納進商業流通裡。將成千上萬合作社，甚至重生的工廠，納入「阿根廷開工計畫」（Argentina Trabaja）裡面，是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內爾（Cristina Kirchner）的反起義傑作，是她對二〇〇一年暴亂的有計畫反應。巴西也不平靜，國家經濟團結部在二〇〇五年清算了一萬五千家企業，並令人欽佩地將自己納入當地資本主義的「成功故事」。「公民

社會動員」及「另一種經濟」的發展不是針對「震撼策略」的反應——如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天真地一廂情願——而是整個裝置的頷骨。有了合作社(它本身也是種企業形式)，新自由主義的根本(alpha et omega)就以擴散，我們不能好像某些希臘的左翼一樣天真慶祝，過去兩年在他們國家出現的自我組織合作社，因為世界銀行在其他地方也在做同樣的事情，結果也同樣滿意。存在某種邊緣經濟的部門信奉社會團結的經濟，並不能動搖政治以及經濟權力的集中，前者的存在甚至對後者有保護作用。在這樣的防衛坡後面，希臘的船主、國家的軍隊以及大企業可以照常營業。一點民族主義，再加上一點社會團結經濟，起義可以慢慢等著。

如果經濟想要作為「行為科學」，甚至是「應用心理學」，那麼它必須在地球上遍布經濟生物——有需求的存在。有需求的存在，辛勤勞動而得到微薄的報酬，這些並不是自然的東西。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人們談的只是生活的方法，而不是需求。那時，人類占據了世界的某些角落，他們知道怎樣餵飽自己、穿戴、娛樂、造屋頂。需求是歷史產品，它將世界從人類手中奪走。這到底是靠掠奪、徵用、圈地，或者殖民並不重要。需求是經濟剝奪

了人類的世界之後而補償給他們的東西。這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但是如果公社也要應付需求，那不是對自給自足的經濟憂慮，而是因為這個世界的經濟依賴不只是持續敗壞的政治因素也是存在因素。公社回應的方式是要消滅在我們之間需求的存在，最基本的做法是，每當人們缺乏什麼，無論出現多少次，都要找途徑讓這種缺乏消失。有些人有「房子需求」？人們不急著為他們建一個房子，而是先建立一個工作間讓任何人都可以快速地自己建房子；有人有需要找一個地方來聚會、討論或吃喝玩樂？人們就占領或者建立一個地方，讓「不屬於公社的人」也可以使用。如我們所見，這不是充裕與否的問題，而是需求的消失，也就是說通過集體的力量來消除要獨自面對世界的感受。僅陶醉於運動並不足夠，這需要大量的手段。我們有必要區別最近在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que)奪回維氏工廠(Vienne)的事件，以及啟發了它的不少阿根廷災難性自我組織的嘗試。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奪回工廠首先是一種聯合希臘「運動」裡其他單位的政治攻勢，而不是一種另類經濟的簡單嘗試。這個工廠將本來用來生產鋪磚膠水的機器，改用來生產消毒凝膠，供應給由「運動」操作的診所。在「運動」的不同層面之間造成迴

響，正是公社的特徵之一。如果公社「生產」，這只能是附帶性的；如果它滿足我們的「需求」，是因為它提高了對共同生活的欲望，而不是將生產以及需求當成客體來處理。基於對這個世界公開的攻勢，公社將找到成長所需要的同盟。公社的成長是經濟真正的危機，也是它重要的衰退。

4.

公社可以在各種處境、圍繞各種「問題」形成。利哈喬夫汽車廠（AMO）的工人，布爾什維克公社制度的先鋒，開設了蘇聯的第一個集體住所，因為經過長年的內戰和革命之後，他們難以忍受缺乏一個可以度假的地方。一個公社成員在一九三〇年寫道：「秋季長時期的雨水開始在集體住房屋頂上咚咚作響，我們做了以下決定：在冬天繼續我們的實驗。」如果公社的出現沒有一個特殊的起點，那是因為這個時代沒有特別的入口，只要我們有投入，所有的處境都會將我們帶到這個世界，並且跟它連接，無論是它困難的地方還是它所呈現的斷層和缺口。每個存在的細節總跟整個生活形式相連，因為公社最終目標是世界，它必須小心不要讓這個任務、問

題或者處境來完全決定它，雖然它們在公社的構成當中扮演重要的位置，但也只呈現為一種聚合的時機。在公社的發展中，當在一起的欲望以及擺脫束縛的力量超過它成立的原因時，一個有益的門檻便被打破了。

如果街道在剛過去的暴亂中有教導我們一些東西，除了暴亂戰術以及防護面罩之外——這個時代的符號已變得使人難以喘息——就是享受快樂，等同全部的政治教育。在過去幾年中，所有人，包括凡爾賽那些後腦剃光了的混蛋，都享受了狂野的遊行以及跟警察打架。每次這些緊急、暴亂、占領的處境所產生出來的東西，都比一開始所關注的要求、策略或者希望都要多。那些走到塔克辛廣場阻止六百棵樹被砍掉的人，最後在那裡找到其他要捍衛的東西：廣場本身，經歷了十年的政治閹割以及對任何集體性組織的阻止和破壞，廣場是人們重新尋獲力量的陣列和表達。

在解放廣場、太陽門廣場以及一些美國占領運動的公社中，或者在蘇薩河谷的拉馬達萊納(La Maddalena)自由共和國令人難忘的四十天裡，重要的是發現人們能夠大規模地自我組織，而沒有人能總體化運動。使我們覺得飄然的是，參與以及經歷創造共同力量的感覺，這種力量是不可言喻、牢

不可破的。牢不可破是因為每一刻、每次行動、每個邂逅所洋溢著的快樂將永不會從我們身上被拿走。誰煮飯給一千人吃？誰建了電台？誰寫了通訊？誰向警察發射石頭？誰建了房子？誰砍了柴？誰在大會裡講話？我們不知道，我們也不在乎：所有這些，都是沒有名字的力量，好像一個西班牙的布羅姆⁴¹所說的——他不知道這其實來自十四世紀提倡「自由精神」的異教徒。我們所做及所經歷的感受，具有一種精神、一股力量、一種共同的富有，它容許我們告別經濟，也就是說告別計算、測量、估價，以及無處不在的機心，這無論在哪都是怨恨的記號，是不論在愛，還是在工作坊裡。當我們問一名長期留在憲法廣場的朋友，如果他們燒了國會然後經濟又持續低迷，希臘人如何組織食物供應來生存，他感到震驚並回答說：「一千萬人不會讓自己死於饑荒。可能會有一些小吵小鬧，但是比起所謂正常時期的社會糾紛，這算不了什麼。」

公社所面對的處境的本質是，當我們全心投入的時候，我們永遠會找到比我們帶去或者所尋找的更多的東西：我們驚奇地找到了它的力量，一種我們前所未見的持久力和創造力，以及策略性地、日復一日地生活在一個

41 譯註：Bloom，一種新的革命主體，但有別於西方傳統哲學裡主體和實質，它是一種情緒或氣氛（Stimmung），見 Tiquin 的《布羅姆理論》（*Theorie du Bloom*）。

例外處境的幸福。在這個意義上，公社是多產的組織。它所生產的比它要求的永遠都要多，正是這點導致伊斯坦堡的群眾走到廣場以及大街的騷亂變得無法逆轉。人們被迫花幾個星期自己處理重要的問題，如糧食供應、建設、醫療、葬禮或者武裝，他們不只學會怎樣自我組織，而且學到了大部分被忽略了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能夠自我組織，而這個力量的本質是快樂。那些口口聲聲要「奪回公共空間」的民主評論員並沒有留意這個街頭的生產力，這足以說明它的危險性。這些日夜的記憶令大都市規律化的日常生活變得無法忍受，虛浮也暴露無遺。



Today Libya,
Tomorrow Wall Street

第八章
今日利比亞

明日華爾街

當人類否定自我組織的能力，便會發現自發性，但我們不能依賴自發性，而是必須維持注意力和紀律。我們不可混淆自由放任和隨心而為，也要留意不能以分享當作藉口。唯有確保所有革命力量都同時在各個方位前進，力量才會增長，如果停留在攻擊的層面，將無法充分利用資源。我們也不能停止理論的前進，否則將會被資本捕獲，同時失去思考生命的能力。

1. 十五年歷史

2. 撕裂當地景點

3. 建立不是組織的力量

4. 關懷力量

1.

二〇一一年七月三日，回應拉馬達萊納的驅逐行動，成千上萬人以多個隊伍包圍了被警察和軍隊占據的工地，這一天是蘇薩河谷的真正的決戰。一個想冒險的士兵在樹林裡被示威者捉住，並被解除武裝。不管是理髮師傅或老奶奶，幾乎每個人都戴著防毒口罩。那些年紀太大不能出去的人則站在門檻打氣：「殺了他們！」占領的力量最後並沒有被趕走。第二天，所有意大利報章以同一口吻重複警察的謊言：「氫氧化鎂混合物和胺基：黑色組織的游擊戰。」為了回應這個弄虛作假的宣傳，人們召開了記者招待會，運動回應：「好吧，如果侵襲工地就叫黑色組織，那我們都是黑色組織。」十年前，幾乎每一天親政府的報紙都這樣解釋熱那亞決戰：那是來歷不明的黑

色組織，他們混進了運動在城市四處縱火造成流血。輿論有兩邊，一邊是示威的組織者，他們辯稱黑色組織裡其實有不少便衣警察，另一邊則視他們為總部設在外國的恐怖分子。我們至少能說：如果警察的修辭一如往昔，那真實的運動開闢了道路。

從我們黨的角度來看，一個十五年的策略分析不可避免地要從反全球化運動，最後一個全球性、有組織性地對資本的攻擊開始。至於從一九九七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反馬斯垂克(Maastricht)條約，一九九八年五月日內瓦的反世貿暴動，一九九九年六月倫敦的「反資本嘉年華」，還是同一年在西雅圖的運動，不論我們從哪一場開始都不重要。同樣，說運動在熱那亞已到達頂點，說它二〇〇七年在海利根達姆(Helligendam)或二〇一〇年在多倫多仍有生命力也不重要。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一九九〇年代末出現了一個針對跨國以及世界性治理組織的全球性批判運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盟、G8、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我們可以理解以九一一事件為由而展開的全球性反革命運動，其實是對反全球化運動的一個政治性回應。在熱那亞之後，「西方社會」內部所出現的裂縫必須由各種手段來遮蓋。邏輯上

來說，二〇〇八年秋天的「危機」來自資本主義系統核心，來自「反全球化運動」攻擊的首要目標所在：金融系統。反革命行動，無論規模多大，都只能凍結這些矛盾，但不能消除它們。同樣邏輯的是，重新回來的正是過去七年被殘酷地壓抑的。一名希臘的同志總結說：「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是熱那亞運動的重現，現在則是以整個國家的規模並歷時一個月。」在這期間矛盾在冰底下醞釀。

歷史上來說，反全球化運動只是全球的小資產階級預見了將臨的無產階級化，而對資本的搔癢式的、微不足道的攻擊。所有小資產階級的歷史功能，如醫生、記者、律師、藝術家或者教師，都有一個相應的行動者版本：街頭醫護、獨立媒體記者、律師團隊，或者團結的經濟的專家。在這些反峰會的暴動中，在空中揚起的警棍便足以使群眾好像燕雀一樣驚起，搖搖欲墜的反全球化運動重新迎向資產階級的虛浮——好像處於兩個階級之間的非階級性空白，迎向它歷史性的優柔寡斷，迎向它政治上的無力感。對現實的不了解意味抗爭的薄弱，只要反革命的冬天寒風持續幾季便足以粉碎運動。

如果反全球化運動的靈魂是對於世界性治理機器的批判，那麼我們可以說「危機」將這些受托人——抗爭者以及行動主義者——的批判剝奪。那些本來只限於政治魔人的小圈子內的事情現在是令所有人不滿的東西。自從二〇〇八年秋天開始，像砸爛銀行這樣的行動從未曾如此廣被接受過，但相應地，要組織一小群專業的暴動者也變得如此沒有意義。自從二〇〇八年起，反全球化運動好像在現實中完全消失。它消失的原因是它已被實現了。構成其基本詞彙的東西已進入公共領域：厚顏無恥的「金融獨裁」，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重組的政治功能，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對「環境的蹂躪」，核能遊說集團愚蠢的傲慢，不知羞恥的人滿口謊言的統治，領導們毫不掩飾的貪污，誰還會懷疑這一些？誰不會因為新自由主義為彌補自己的失敗而單方面加冕感到震驚？我們必須記得今天我們的共同信念在十年前還只局限在抗爭者的圈子裡。

反全球化運動的戰略操作早已被「人們」抄襲。太陽門廣場有律師團、醫療隊、資訊處、駭客及野營帳篷，就好像昨天的任何一個反峰會、「跨越國界」(No Border)的運動。在西班牙首都，很多人心目中的大會形式，以

鄰里以及委員會為基礎的組織，以至某些可笑的規則全都是來自反全球化運動。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巴塞隆納有幾千名「露營者」嘗試包圍加泰隆尼亞的國會以制止「緊縮政策」的投票——就好像幾年前人們嘗試制止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各國代表到達會場一樣。二〇一一年英國的學生運動中的書本組織（Book Bloc）就是效法在熱那亞反峰會的「白衫黨」。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南特，反對興建機場示威中人們分成蒙面的機動小組行動，說他們是黑色組織，只是一種將全新的事物簡化成已知事物的方法，但這並不只是內政部長的話語。警察則聲稱那是部分「激進分子」的行動，我們不難看到他們想要遮掩普遍的激進化。

2.

我們黨無處不在，但它停頓了。隨著反全球化運動的消失，一個好像資本一樣滿布全球而且可以與之抗衡的運動的前景也跟著迷失了。我們必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讓相應處境而成長的所有力量成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這些公社如何組成歷史政黨呢？換句話說：在某一點上，必須拋棄反

峰會的儀式、專業的行動主義者、壓迫性的傀儡師、可預見的暴動、鋪天蓋地而又沒有意義的標語，才可以與我們生活的地域聯繫上——跟全球的抽象化切割。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與本土的吸引力切割？傳統上，革命主義者因為有共同敵人而團結政黨，這是他們永遠都醫不好的辯證毛病。傅柯說：「辯證邏輯是一個在同質的單一要素中玩弄矛盾的邏輯。我建議盡快以策略的邏輯來取代辯證的邏輯。策略的邏輯跟辯證的邏輯不同，它不將矛盾均質化以求解決問題，從而得到統一性。策略的邏輯是要在不一致、不對稱的事物（它們會繼續保持一致）之中建立可能的連結。策略的邏輯是將異質的事物連結起來的邏輯，而不是將矛盾均質化的邏輯。」

在公社之間，與處境相應的異質力量之間，沒有什麼有效連結是來自於對共同的敵人的指認。如果在過去四十年的爭論當中，抗爭者一直沒有能夠決定到底敵人是異化、剝削、資本主義、性別主義、種族主義、文明還是整體的存在本身，那是因為問錯了問題。這個問題是毫無用處的。不要以為只要將自己與所有決定（determination）抽離，或者設想自己置身某政治或哲學平面之上，敵人就會現身。如此抽離之後，所有的牛都是灰色。我們受

創，真實也蒙上詭異的光環。所有東西都是敵對、冰冷、沒有差異的。抗爭者可以發動反對這個或者那個的運動，但這只是反對一種空白的形式，一種來自他們自身的空白的形式——無力以及弱不禁風。對於那些由自身所發出發，由他常光顧的圈子、所住的地區、工作所在的企業出發，鬥爭的前線會在經歷以及接觸中呈現出來。誰在為混蛋工作？誰不敢弄濕自己？誰為自己的信仰冒險？敵對的政黨可以走多遠？它在什麼東西前面退縮了？它依靠什麼？這不是單方面的決定，而是從一個處境到另一個處境，從一個處境到另一個處境這些問題的經驗。敵人不再是我們可以指名道姓的東西，敵人會自己呈現。它顯示給所有那些沒有抽象化地指出它是什麼、來自那裡，然後將它過度簡化並投射在抽象的政治荒漠的人，它也只會顯示給有足夠活力而在糾紛前面不退縮的人。

所有宣稱是公社的都曾在周圍有時甚至遠距離產生二種新的地理，在以前只有規範化的地域，所有東西都可以交換的平原，普遍等價的陰霾中，公社勾劃出連疊的山脈，那裡山巒起伏，有山口，有頂峰，有朋友相傳令人驚奇的山徑，也有敵人之間難以通往的絕壁。所有這些都不再簡單，或者

具不同意義的簡單。公社創造了一個逐漸延伸以及開枝的政治地域。在這個運動中，那些它繪畫出來通往其它公社的小徑，以及編織出來的線和連結，組成了我們的黨。我們的力量不從指出誰是敵人而來，而是來自為了可以進入彼此的地理的努力。

在我們的時代，世界被錯認劃份為資本主義的幫凶和敵人，而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孤兒。自從蘇維埃的誘餌消失之後，連用來分析地緣政治的尺規也迷失了。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容許從遠處分開朋友和敵人——包括那些絕望的嘗試，想重新放置可靠的尺規來理解新的局勢，在那裡伊朗、中國、委內瑞拉，或者巴沙爾·阿薩德(Bachar El-Assad)成為反帝國主義的英雄。誰能從這裡說出利比亞起義的真實性質？誰能在塔克辛廣場的占領中辯出舊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e)和對新世界的憧憬？還有烏克蘭基輔的獨立廣場？誰能說什麼？我們必須親身去看，與那裡的人碰面，才能在運動的複雜性中認出共同的朋友，可能的盟友，必要的衝突。根據策略的邏輯而不是辯證的邏輯。

我們的同志德勒茲(G. Deleuze)在四十年前已經寫過：「我們必須在一

開始就比中央集權者還要更中央集權。很明顯一個革命機器不能自滿於本土以及局部的鬥爭：它必須同時具有高度欲望及高度集中化。所以問題的所在是縱橫地貫穿多樣性的統一，而不是垂直地消滅欲望的多樣性的統一。」雖然我們之間的連結鬆散，我們黨的地理分散，這不一定是弱點；而相反，這讓它避免成為眾矢之的。如同一個開羅的朋友在二〇一〇年夏天所說：

「我相信埃及革命至今的成功是因為沒有領袖，這使警察、國家以及政府措手不及，因為他們不能砍了某個人的腦袋來中止運動。好像一個病毒不斷地靠突變來保存自己，我們也是這樣來保存這個沒有等級、完全平坦的、有機、擴散的人民組織。」如果不想像國家或者組織一樣結構化，那就只有保存分散及零碎，在這個格局中找到擴散的動力。我們要在本土的層面組織會面、通訊、相互理解以及密謀。革命的工作已部分成為翻譯的工作，沒有起義的世界語，反抗者不是要學會無政府主義者的語言，而是無政府主義者要通曉多種語言。

3.

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困難，是如何建立起一個非組織的力量？打從一個世紀以來，我們爭論著「自發或組織」，這個問題必定是問錯了才一直都沒有好的答案。這個錯誤問題是基於一種盲目，沒有能力察覺到隱藏在我們所說的「自發」底下的組織形式。所有的生活，姑且勿論共同的生活，都有自己存在、說話、生產、相愛、鬥爭的方式，以及習慣和語言的規率性——也就是各種形式。只是我們習慣了不去察覺當中的形式。因為，形式對我們來說如同雕塑、結構或者骷髏，它不會死、不進食、不跳舞、不歌唱、不會暴動。然而，真正的形式是內在於生命的，而且只有在運動中才能被捉摸。一名埃及的同志告訴我們：「開羅從不曾像解放廣場開始的時候一樣有活力。因為沒有正常運作的東西，每個人都要關心自己周圍的東西。人們要清理垃圾、清掃人行道，有時候重新油漆、在牆上畫畫、互相關照。雖然沒有錢，物件的流動卻出奇地順暢。我們突然之間明白，在我們之間的一些簡單姿態一直都被剝奪了，它們讓這個城市成為我們的，而我們屬於這個城市。當人們到達解放廣場時，自發地互相詢問有什麼可以幫助的，他們跑去廚房幫忙，用擔架送受傷的人，準備橫幅標語、盾牌、投石器，討論，創

作歌曲。我們明白，國家組織其實是最沒有組織的，因為它是基於對人類自我組織能力的否定。在解放廣場沒有人發號司令，如果有人這樣做，那一切一定立刻混亂起來。」我們記得庫爾貝（Gustave Courbet）⁴²在公社期間寫的著名信件：「巴黎是一個真正的天堂：沒有警察，沒有蠢事，沒有任何搶劫，也沒有糾紛。巴黎好像在滑冰一樣自己在前進，它必須保持現狀。一句話，那是真正的陶醉。」從一九三六年在亞拉岡自治區（Aragon）的集體化（collectivisations）到剛過去幾年的占領，歷史響徹地這種陶醉的見證：不是一沒有國家，就會發生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相反的，是國家熟練地把混亂製造出來。

認識到生活自發產生的形式，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要依賴某種自發性就可以維持和促進形式的成長、製造必需的蛻變。相反的，它需要一種持續的注意力以及紀律。那不是行動主義者和管理先鋒們共有的反應式的、控制論式的、即時的注意力，它崇拜網絡、暢順程度、反饋（Feed-back）以及水平狀態，它從外面管理所有東西卻完全不理解任何東西。那也不是來自工人運動的古舊組織，軍事化的外部紀律，它們幾乎都已經全部成為國家的延伸。我

們所說的注意力及紀律也可應用到力量的狀態以及增長，注意力及紀律偵察著會傷害它訊號，也揣度那些可以讓它增長的可能。它們不混淆自由放任（那是公社的災難）以及隨心而為，留意不會以分享為藉口而混淆一切。它們不是某些人的財產，而是所有人的，它們既是真正分享的條件和物件，也是微妙性的量度，它們是我們對非正式專制的防禦，它們是我們黨的質地。在 newfound 自由主義四十年的反革命中，被忘記的正是這個紀律與快樂之間的連接。我們現在重新發現它：真正的紀律不是為了組織外部的特徵，而是為了力量內部的發展。

4.

革命傳統被打上好像先天缺陷一樣的唯一志論標籤，繃緊地為明天而活，走向勝利是現在忍受恐懼無處可藏的僅有的方式之一。犬儒主義是另一個選擇，但它是最壞的、最庸俗的選擇。這個時代革命性的力量耐心地留意著自身的增長。這個問題一直被奪取權力這個陳舊的主題所壓抑，當要靠近它的時候，我們都感到相對地乏力。總有一些官僚主義者知道可以怎樣

利用我們運動的力量，也就是說他們計算好怎樣將它發展成一種手段，一種為他們目的服務的手段。然而，我們並不習慣怎樣照顧好這種力量，我們模糊地感到它的存在，我們察覺到它的起伏，但是我們用好像對待「存在性」的那種灑脫處理它們。這種「文盲」對激進小圈子來說並不陌生：每個小群體都愚蠢地相信，當他們反對政治市場裡一些微乎其微的東西時他們是在進行悲壯的鬥爭，當他們中傷敵人就可以削弱敵人同時壯大自己。這是個錯誤：人們通過和敵人的戰鬥而不是削弱他們而得到力量。吃人肉者比這個更高明，吃自己的敵人是因為估計那可以補充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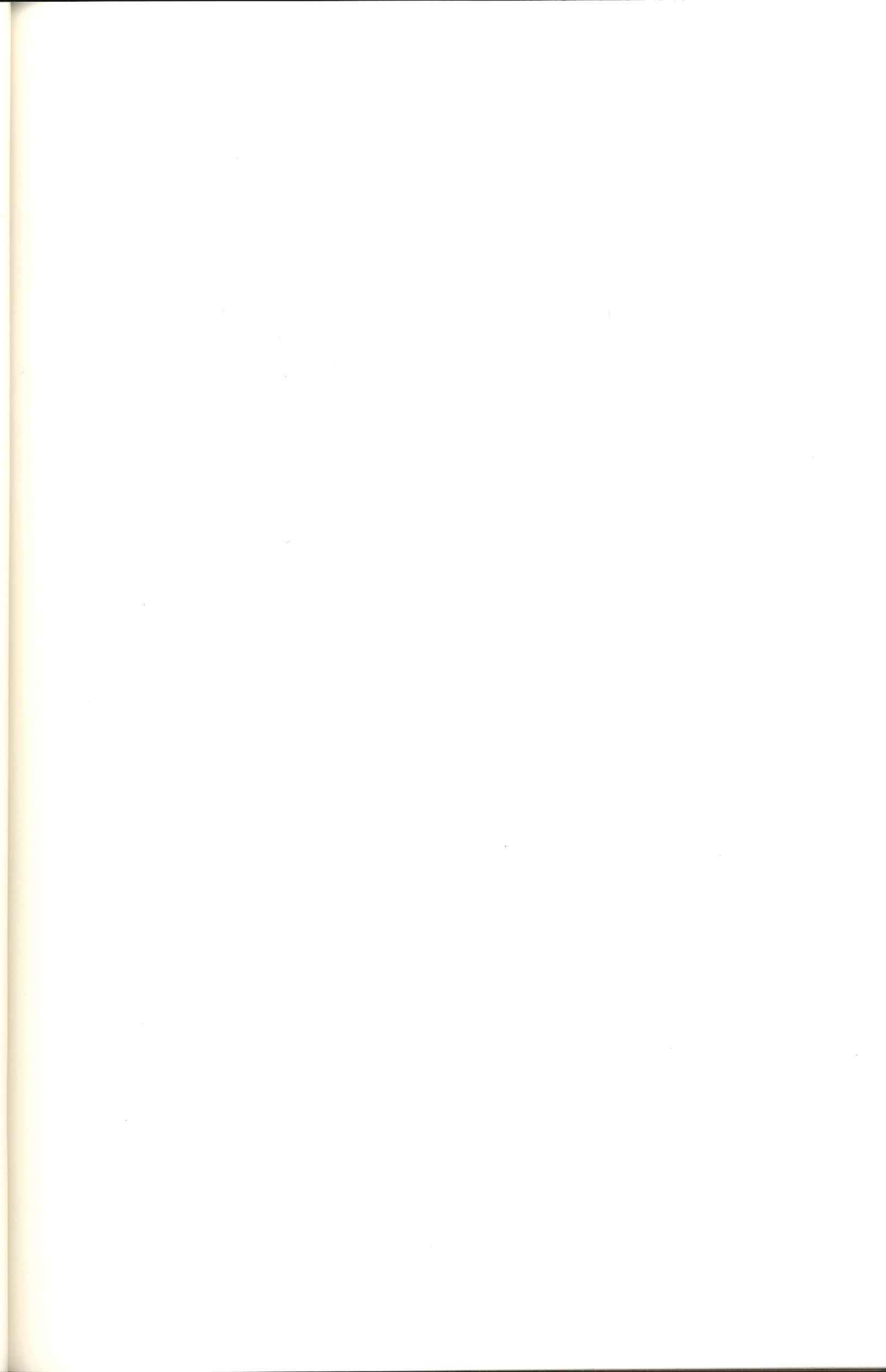
當革命傳統在這一點上無法提供養分時，人們可以重新回到比較神話。我們知道杜梅齊勒(Georges Duménil)在他對於印歐神話的研究中，發展了著名的三等分：「除了祭司、戰士以及生產者之外，還有等級化的『功能』，包括司法以及魔法統治權，物理和主要是戰鬥的力量，平靜和多產的充裕。」讓我們先忽略「功能」之間的階級性，而只談維度。我們認為，所有力量都有三種維度：精神、力量及富有。它增長的條件是要掌握這三個條件。作為歷史力量，一個革命運動正是精神的擴展——它以理論、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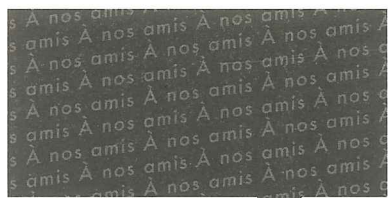
藝術或者形而上學的形式出現，一種戰士的力量——無論那是襲擊還是自衛，以及一種物質以及場所的充裕。這三個維度在空間和時間中以不同形式結合，同時誕生了獨特的形式、夢想、力量及歷史。每當其中一個維度想要獨立而與其它的維度失去連繫，運動便會退化，墮落成武裝的前鋒主義者、理論家的小派別或另類企業。紅軍、情境主義者，以及不服從者⁴³的夜店——對不起，「社會中心」——都是革命的標準失敗配方。確保力量的增長需要所有的革命力量同時在各個方位前進，如果只停留在攻擊的層面，那是因為最終缺乏洞見，同時無法充分利用資源。如果停止在理論上前進，那注定會出奇不意地被資本的運動所捕獲，同時失去了在我們場所中思考生命的能力。放棄用雙手建設世界則是將自己獻給幽靈。

有一個朋友寫道：「什麼是幸福？那是感到力量的增強——障礙正在被克服。」

成為革命主義者，是給自己一個困難但即時的幸福。

43 譯註：Les Döcolobissans，法國一個提倡公民不服從的組織。





結語

我們想要簡要。因此省去了
系譜學、詞源學、引用。一首詩，
一首歌足矣。

我們想要在牆上寫滿

「革命」

讓街道可以接吻。

但必須梳理此刻的錯綜複雜，以及

逐點清算累積了上千年的

錯誤。

必須嘗試消化七年的

歷史動亂

以及理解一個世界，哪裡混淆在

誤解的枝頭上開花。

我們用心書寫，希望

其他人用心閱讀。

書寫是虛榮，如果不是
為朋友的話。

也為我們不認識的朋友。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會出現，

在任何有火花的地方。

在暫息的日子裡，不難

找到我們。

我們將努力解釋清楚

從這開始。

將會有日子和地方，我們的力量集結

反抗邏輯的目標。

將會有日子和地方，讓我們相遇以及

辯論。

我們不知道，起義將會是

英雄式的攻擊，還是

全球性的哭泣的

恐慌——一種殘忍的感覺，在

數十年的麻醉，悲傷以愚昧之後。

沒有東西保證，法西斯主義將不會

比革命更吸引人。

我們將竭盡所能

思考，攻擊，建設——這是精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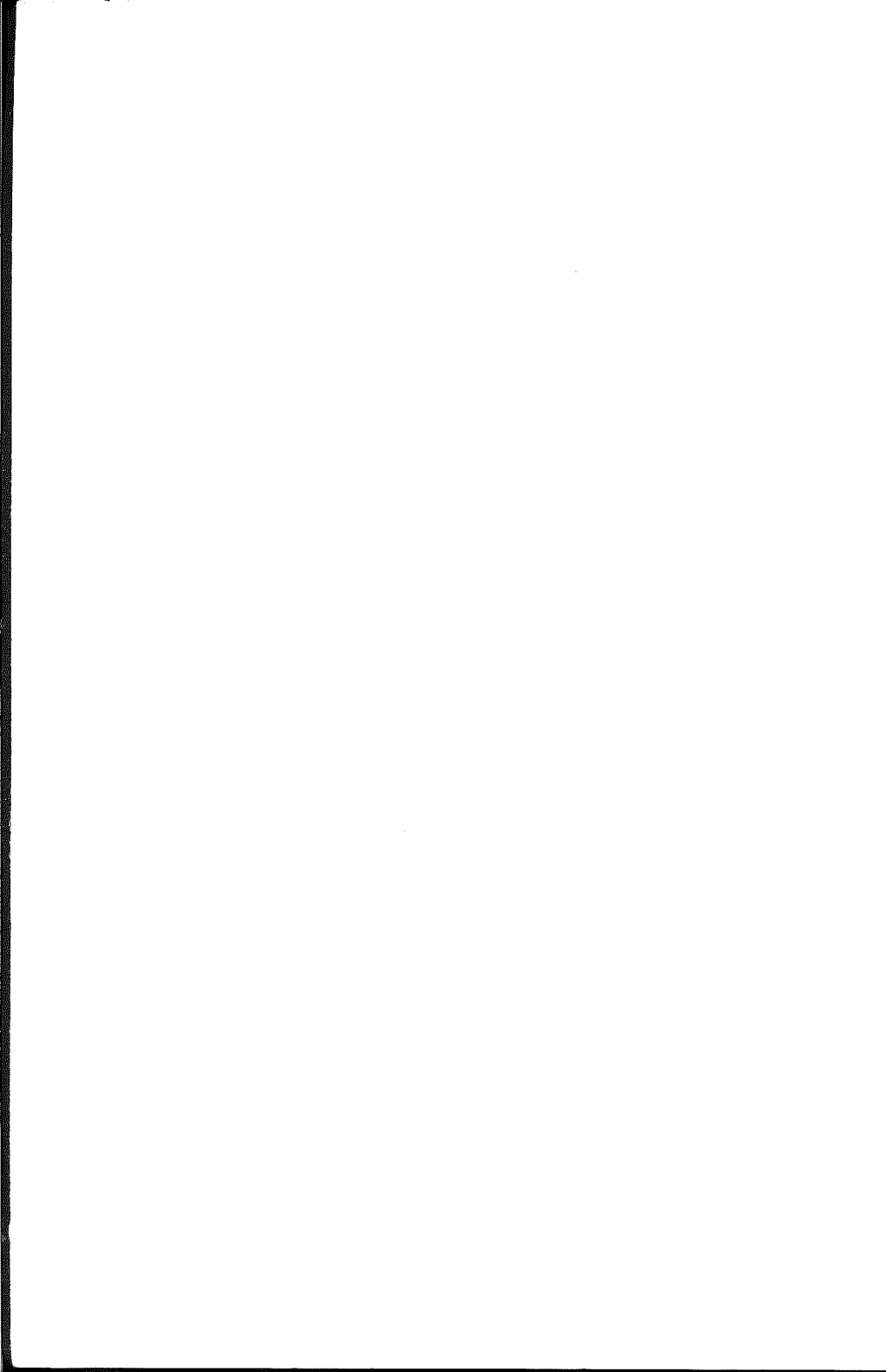
線路。

這本書是計畫的開端。

很快見！

隱形委員會

二〇一四年十月



作者 隱形委員會
譯者 鄧逸晴
責任編輯 陳敬淳
封面設計 黃子欽
內頁美編 黃鈺茹
行銷業務 華郁芳、許雅琇
印刷 崎威彩藝

定價 320 元
ISBN 978-986-92539-1-8
出版日期 2016年3月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 行人文化實驗室
發行人 廖美立
總編輯 周易正
地址 10049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0號10樓
電話 +886-2-2395-8665
傳真 +886-2-2395-8579
郵政劃撥 50137426
網址 <http://flaneur.tw>

總經銷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886-2-8990-2588

À NOS AMIS

Copyright © 2014 by Comité Invisible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Flaneur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致我們的朋友／隱形委員會 Comité invisible 作；鄧逸晴譯．—

初版．—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6.03

224面；14.8 x 21公分

譯自：À nos amis

ISBN 978-986-92539-1-8 (平裝)

1. 社會運動

541.45

105000718



致我們的朋友
À nos amis

